

胸懷祖國

香港「愛國左派」運動

趙永佳 呂大樂 容世誠
合編

OXFORD

本書包含了兩個「熱門」題目：一是關於「六七暴動」，另一則是有關「左派」工會。

葉健民所寫的「六七暴動的罪與罰」，乃以收藏於香港及倫敦的檔案文件為研究材料，重新瞭解當年抗爭的暴力程度，並反思殖民政府那種寧枉勿縱的處理手法。梁寶霖和梁寶龍寫「愛國工會：香港工會聯合會」，是從社會政治生態的環境來看工聯會的發展歷程。

在這兩個較為「熱門」的題目以外，我們選取了幾個較少人研究的界別和團體。這很大程度上是呼應前文所提到「左派」作為一個社會系統的觀點。在體育界，趙永佳、呂大樂和梁懿剛以愉園足球會為例以說明，這類社會團體在香港戰後歷史扮演的角色。在文學界，張詠梅以《文匯報》中一個「長壽」小說專欄《港Q正傳》來勾畫「左派」如何「想像」戰後香港的殖民與資本主義。而李少恩更以「南國粵劇團」和「左派」工人的業餘劇團運動來描述文藝活動對戰後「左派」運動開展、團結群眾的重要性。

趙永佳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教授，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暨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興趣為東亞社會比較研究、社會分層、社會運動及全球化與發展社會學。

呂大樂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近著包括《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家長焦慮症》、《中產心事》、《四代香港人》等。

容世誠 廣東中山人，現職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研究興趣包括晚明戲曲、粵曲社會史、香港戲曲史、五十年代香港文學與電影文化等。出版專著《尋覓粵劇聲影：從紅船到水銀燈》、《戲曲人類學初探》、《粵韻留聲：唱片工業與廣東曲藝》。）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學出版社

www.oupchina.com.hk

ISBN 978-0-19-944522-6



9 780199 445226

胸懷祖國

香港「愛國左派」運動

編者

趙永佳 呂大樂 容世誠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the UK and in certain other countrie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asserte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by licence,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at the address above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work in any other form
and you must impose this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ISBN: 978-0-19-944522-6

1 3 5 7 9 10 8 6 4 2

胸懷祖國

香港「愛國左派」運動

趙永佳、呂大樂、容世誠合編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目 錄

- 1 導言：「左派」運動在香港
趙永佳、呂大樂
- 13 「六七暴動」的罪與罰：緊急法令與國家暴力
葉健民
- 33 國家權力與教育
——戰後至回歸前親共愛國學校在香港的發展
劉翠珊
- 49 愛國工會：香港工會聯合會
梁寶霖、梁寶龍
- 83 愛國足球滄桑
——愉園60年
趙永佳、呂大樂、梁懿剛
- 115 香港左派工人的粵劇運動(1950-1970年代)
李少恩
- 141 批判與同情
——試論《文匯報》副刊連載小說《港Q自傳》
的「香港」想像
張詠梅
- 169 兩岸三地的政治差異與文化經濟的融合
——銀都在華語電影產業鏈的角色
趙永佳、冼基樺

導言：「左派」運動在香港

趙永佳、呂大樂

「左」的定義

「左派」一詞源於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後來廣泛應用於政治派別的分類之上。在政治分析用語中，「左派」指的是倡議改變現狀，鼓吹革命或激進的行動，通常站在反對派的立場來表達其社會、政治主張的一種意識形態或政治力量。而在十九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正面挑戰資本主義的過程中，「左派」或「左翼」通常又用以泛指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陣營中的政黨、社會運動及它們的支持者。

但當然，所謂的「左」是相對而言的。當左翼政黨革命成功，正式執政之後，它就成為了建制，而其意識形態也就變為了建制的一部份。而在這個發展過程之中，在原來「左派」的左方，通常會出現另一種「左派」，以左翼的角度來批判或挑戰「左派」。所以，所謂「左」的，還是「右」的，其實質意義要視乎具體的政治狀況而定。說到底，無論是「左」的還是「右」的，基本上都是一個標籤而已。

香港「左派」

以香港的情況而言，以上所講的就更為明顯了。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共產黨人及其支持者便有在英國殖民管治的香港有所活動，跟當時掌中國政權的國民政府進行鬥爭。而這種國共之間的政治鬥爭並未有因為中共於1949年取得政權而停止。事實上，剛好相反，於當時的國際政治局勢底下，在香港這處殖民地的土地上所進行的國共鬥爭，不單只更為激烈，而且更具政治上的含義。對中共而言，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既有團結廣大同胞、抗衡國民黨在香港建立反共勢力的意思，同時亦是反冷戰期間的圍堵的重要策略一環。而對已遷台的國民黨來說，香港這個華人社會是兵家必爭之地，是防止中共勢力進一步擴張的前線。在二戰後初期，親中共並且跟親國民黨陣營對抗的，稱為「左派」，而親國民黨或國民政府的，則稱為「右派」。

基於他們的意識形態及政治思想，「左派」除擁護新中國之外，還時常跟港英殖民政府唱對台，嘗試團結勞工階層，批判資本主義和殖民制度。而最大規模的動員與鬥爭，是1967年因所謂的「五月風暴」而起的武力反抗殖民統治的行動。「左派」稱那一場鬥爭為反英抗暴，換言之，他們的武力反抗是反抗殖民政府的暴力鎮壓。至於沒有參與其中的香港市民，則稱當年所發生的狀況為暴動。暴動過後，隨着政治形勢與需要的變化，「左派」調整了他們的路線和角色。首先，在反霸權的鬥爭中，港英殖民政府不是主要的鬥爭對象；盡量將群眾團結在愛國的旗幟底下，較諸反資反殖更為重要。而再發展下來，現狀不變的香港更是應該充份發揮其積極角色，協助中國從文化大革命恢復過來，進行四個現代化，逐漸對外開放。於是，「左派」一詞逐漸為「愛國人士」所代替，而這多少反映出他們自我定位的一些改變。

本書沿用慣常用語，稱呼這股社會力量為香港的「左派」。此舉既無貶意，亦沒有將他們視為激進政治、思潮的意思。這跟當時及後來另一些如「土共」、「港共」、「左仔」等包含某種否定或鄙視的稱呼並不相同。不過，我們亦希望指出，如上文已略有討論到的，稱他們為香港「左派」，並不就等於視之為政治思潮中的「左翼」。在目前香港社會的環境裏，愛國的「左派」其實都支持維持現狀，循序漸進，跟激進左翼思想大不相同，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時的傳統香港「左派」也不一樣。對於香港「左派」的分析，必須把他們放到具體的歷史環境裏，才能瞭解其思想及政治取向的意義。抽離於歷史來看香港「左派」，便很難明白究竟他們的言論、思想、行動，有些甚麼意思了。

感性經驗中的香港「左派」

香港大部份戰後出生的所謂「嬰兒潮世代」，相信在其成長期，都會對「左派」運動有一些經驗和印象。趙永佳於六十年代在灣仔堅拿道居住，「左派」組織、團體是他的成長回憶中一個重要部份。他的外婆在戰前從東莞來港，成為「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捲煙女工。戰後公司被納入「左派」系統，而她也加入了愛國工聯會陣營中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工會。公司舊址就改建成後來的南洋戲院，是他小時候看電影常到的地方。

後來他外婆自煙草公司退休，到銅鑼灣一家西餐廳做「洗大餅」的洗碗工作，又輾轉加入了「洋務工會」。洋務工會所組織的乃是在西式企業(多是服務業)中工作的職工。五、

六十年代，工聯會的組織工作做得很細緻，每年春節都有工會幹部來向他外婆這位老會員拜年。因此，在他的成長經驗中，「左派」組織是平常生活中的一個部份。例如羅素街(時代廣場現址)旁是電車車廠，電車掛上回廠的牌子，就是經波斯富街轉入這個車廠。而附近不遠，就是電車工會的會址。工會處於街上的舊樓之中，而當年那些樓宇的天台都是相通的，話說電車大罷工之時(所謂「羅素街血案」事件)，工人就是在工會天台上集會。他還記得曾在工會的天台上踢球，但卻完全不知道那個「球場」，原來曾發生工人運動中的重大歷史事件。

從他家向銅鑼灣方向走幾分鐘，就是波斯富街。現在的軒尼詩大廈，當年是一家「國貨公司」(應該是中國國貨公司)。而在國貨公司樓上，是工聯會屬下的「工人診療所」。六十年代的公共醫療系統非常落後，灣仔區由政府診所位於現在修頓球場旁邊的「貝夫人診療所」，由堅拿道過去路程比較遠，而且輪候的人又多，所以當他生病時，外婆通常都會帶他往「工人診療所」看病。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進入診所大堂，就有一幅毛主席的肖像及一塊大橫額，寫上「為人民服務」。外婆當年覺得「工人診療所」比政府診所還要好，常常告訴他說，診所的針藥很便宜，所以到那裏扎一針，很快便會痊癒。當然他是不太喜歡打針的，但小時候的病都是在「工人診療所」治好，卻是事實。

當然，對「左派」的記憶也不全是「和風細雨」的。到了1967年，「五月風暴」爆發後，他正在慶幸不用如常回校上課之際，當時分租家中「頭房」的一位在灣仔消防局對面店舖打工的店員，就曾被一枚消防局門外放置的炸彈所傷。外

婆在之後的大半月每天都要為他「煲湯」療傷。「為人民服務」的「左派」，同時也會傷及無辜。

對一部份人來說，跟「愛國組織」有所接觸，是很生活化的事情。

但對另一部份的人來說，則「左派」完全屬於另一個生活世界，既不瞭解，亦無接觸。

呂大樂在北角碼頭旁邊的「廉租屋」長大，住在同一層的鄰居之中，只有一戶是明顯地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他們家裏掛有毛像，日常生活亦似乎略有別於其他街坊，十分低調，彼此沒有甚麼往來。而在該社區內的家庭，基本上不談政治。但寧靜的日子不能避免的受到「六七暴動」的衝擊。屋邨的升降機內外都被人寫上「黃皮狗」、「打倒帝國主義」(是用簡體字寫的，當時是小二學生，看不懂當中的意思)。英皇道的僑冠大廈(華豐國貨公司所在地點)上空出現直升機，而同時就是因為戒嚴而不敢外出，但亦可嗅到催淚彈的氣味。從成年人的表情知道事態嚴重，但小孩子卻只是一知半解。他就讀的是聖猶達小學，後門靠近蘇浙小學。某天發生炸彈爆炸，有人命傷亡，而二年級班房窗口的玻璃都震碎了，結果特別休假一週。

在往後的日子裏，每天上學及放學例必經過國貨公司和「左派書店」，對於櫥窗上所展示大陸政治、經濟、社會近貌的照片，總是半信半疑。而事實上他亦沒有興趣去查個究竟。畢竟，對一名小學生來說，文革這個題目似乎太過沉重了。在日常的生活層次上，奉一般成年人勸喻，跟大陸有密切關係的，還是保持距離為妙——但有一點除外。對普羅大眾來說，他們日常生活中所享用的消費品，不少都是大陸國

貨。從英雄牌墨水筆、回力牌帆布運動鞋，到零食大白兔糖，統統均由國貨公司供應。對很多跟「左派」系統沒有甚麼聯繫的人而言，國貨公司就差不多是唯一的接觸點了。

在呂大樂眼中，「左派」是神秘的。在北角長大的他，可以說不可能沒有察覺到他們的存在，但彼此之間卻鮮有接觸；兩者各有他們的生活世界，在一般情況底下，互不相干。小時候讀的報紙是《星島日報》，每年10月隨報附送青天白日旗，年份是以民國的年曆為準。雖然他跟國民黨的、「右派」的系統沒有任何連繫，但在成長過程中所接觸到的主流，是以中華民國為中心的。一切有關「左派」的事情，均屬於主流以外。

可是，當他於香港大學讀一年級的時候，卻無意中經一位補習學生的介紹，成為了某間「愛國學校」的兼職教師。當時「四人幫」已倒台，而中國正從「毛時代」轉變過來。而香港的「左派」在追隨大陸於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方面的轉變時，思想出現頗多矛盾和混亂的地方。昔日批判與否定的事物、價值，重新獲得肯定，有時甚至成為新的目標。而在更具體的安排上，「左派」逐步開始先接觸、後投入於港英殖民政府所建立的制度、主流。以前(粗略地指1950至1978期間)「左派」差不多是一個完全自成一體、自給自足的社會系統，裏面有它的學校、活躍於不同行業的企業單位、報刊、文化機構及團體、街坊組織、工會、商會、體育團體等等，基本上可以完全獨立於殖民政府所建構的主流制度而運作。舉一個例，當時作為這個社會系統裏的青年學生，基本上可以跟建制無涉，毋須參與殖民教育及其公開考試制度，可以繼續升學，而日後到了就業和投入勞動市場之時，

亦有不同的僱傭單位可以配對。簡單的說，這個社會系統頗自覺的跟殖民制度保持距離，並以一種很不一樣的邏輯(例如有別於香港社會普遍以市場掛帥的做法，重視意識形態)來運作。那樣的一個社會系統曾經是殖民制度以外的一種選擇，並且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例如對殖民地的批判，又或者被視為進步文化的代表)。對來自於系統以外，對其文化完全陌生的呂大樂而言，那一年的兼職教學生涯，可謂大開眼界。

開眼界的地方是，那次觀察提醒任何對戰後香港社會的分析，都不可以低估冷戰的政治環境的影響——在殖民建制以外，還存在「左派」和「右派」兩股重大的社會政治力量。以上對「左派」的描述某程度上亦可應用到「右派」系統之上。要認識香港社會，必須瞭解左右兩派。

「左派」在社會分析中的位置

基於生活圈子和經驗上的差異，香港人對「左派」運動的認識，多來自新聞媒體，尤其是報刊。當然，我們可以想像有些人是自覺和主動的親近某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意見，那是一個自我選擇的過程。也有一些是自覺的跟「左派」和「右派」保持距離，嘗試尋找第三類觀點。但也有不少人會像趙永佳一樣，外婆是愛國工會老會員，但爸爸卻是「右派」集賢起落貨工會(曾參加省港大罷工)的「醫事顧問」；他家中讀的是《香港時報》，(除熟讀體育版的本地波經之外)對來自所謂「自由陣營」的論述最清楚。

有趣的是，在舊日冷戰底下的政治環境裏，親台的、屬於建制的言論往往可以中立、客觀的形象示人。我們不是說

「左派」沒有他們的問題(例如對毛近乎盲目的崇拜明顯地是個大問題)，而是想指出，當時不少從港英或親國民黨陣營的角度出發，來記錄和演繹「左派」的活動，當中存在政治上的偏見，而並非平衡的理解。這種情況在1967年暴動之後尤其明顯。整個「左派」的系統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理念，一是很簡單地視為別有用心，破壞香港的社會秩序、自由、安寧之輩，不然就根本不將「左派」放入當代香港社會發展和歷史當中，假設他們的存在最多也只不過是個小集團，而並無更重要之社會、政治含義。

而在學術界的社會政治分析中，亦有相似的問題。其中劉兆佳先生的重要著作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是香港社會學最早和最有系統的關於香港社會及政治發展的理論分析和模型。¹ 但他當時(七十年代末)撰作該書時的基本命題——為甚麼香港政治在快速現代化的過程中是如此「穩定」？——卻可說是忽略了戰後香港社會一片「昇平」的景象。殖民政府大大調整其管治策略，而當時國共之間的鬥爭亦開始未能回應社會上新的訴求，正是「左派」處於低潮的時候。以這樣的背景作為他的分析的參照，他形容香港政治為一個「低度整合的社會政治系統」(minimally-integrated social-political system)，顯然是缺少對冷戰政治環境所起的作用的分析，再而大大低估了之前國、共、港英三方纏鬥的政治意義。他所講的政治穩定，大致上是把國共政治鬥爭及相關的政治動員不包括在內的。他只是輕輕的提到那些衝擊殖民政府的政治行動未有動搖政治穩定，便不再作深究了。

1 Lau Siu-kai (1982),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我們念大學時，正是很多本地社會學家、政治科學家不約而同地以政治穩定為解釋對象的時期。但在當時我們幾個對香港歷史甚有興趣的研究生的眼中，對這套把「左派」運動「清洗」掉的論述有點摸不着頭腦。好像劉當時提出「功利家庭主義」(utilitarian familism)來解釋香港人的政治冷感，因為戰後南來移民普遍有「難民心態」(refugee mentality)，都抱着「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態度，遠離政治，埋首「搵食」，希望讓家人過一點好日子。但本書各篇文章的作者，正想指出忽視了「左派」運動的歷史位置，便很難全面瞭解戰後香港的社會、政治發展。香港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前的25年間的歷史，部份是一群愛國群眾懷抱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跟港英殖民政府和「右派」對抗的鬥爭史。缺少了「左派」這一頁，香港戰後的歷史便會顯得不夠完整。

如果忽視「左派」運動是一個問題，那麼眼中只有「左派」也是一種不足。周奕先生的著作《香港工運史》、《香港左派鬥爭史》可以說是「鬥爭史」的代表作。²他曾在戰後初期參加愛國青年和工人運動，後來到香港《文匯報》工作至退休。他的左派歷史充滿愛國感情，除了本身是當事人並身臨其境外，亦搜集了大量文獻資料，對很多事件有細緻描寫，一定程度上填補了香港歷史的空白，平衡了以往從國民黨或港英角度出發的記事。不過，他的局限亦正正在於他幾乎完全從左派的角度出發，而且行文及史料來源的處理，都跟學術研究所要求的客觀有一定距離(當然，他亦沒有宣稱他寫的是歷史學術著作)。

2 周奕(2009)《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出版社；周奕(2002)《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文出版社，頁287。

再者，他集中在戰後至1967年「五月風暴」期間「左派」群眾和團體面對親國民黨右派及港英的抗爭，著墨於事件的再現，而非分析。還有他的著作對「五月風暴」後，尤其是中英談判以來左派組織的「轉型」也沒有太多篇幅。

對「左派」的論述，當然還有是「左派」組織所撰寫的組織歷史。大部份「左派」工會均曾出版紀念特刊，其中多數都有大事記錄；而個別「左派」組織更有比較詳盡的發展史的書寫，如洋務工會的《工在家國》，銀都集團的《銀都六十》，和最近工聯會所出版的《工聯會與您同行》³。對有興趣瞭解更多「左派」歷史的讀者，均屬有一定參考價值的刊物。

但畢竟那些刊物難以擺脫「正史」的寫法，對於以客觀態度重新建構「左派」歷史，並把「左派」運動的人和事放回香港歷史發展脈絡中並進行分析，仍嫌有所不足。⁴有見於此，本書各位作者辦了一個小型研討會，會上作過報告和交流之後，各自撰寫文章，促成此書。

本書的結構

在選題方面，本書包含了兩個「熱門」題目：一是關於「六七暴動」，另一則是有關「左派」工會。關於前者，葉

3 周文港、方慧賢、黃曉嵐(2011)《工在家國—香港洋務工會九十年史》，香港：和平圖書；銀都機構編，《銀都六十》，香港：三聯書店(香港)；香港工會聯合會(2013)《工聯會與您同行》，香港：中華書局(香港)。

4 一些研究生曾嘗試以「左派」機構、團體作為論文題目，並提出具學術意義和參考價值的分析。例如馮惠卿(1999)《一個理想社區的追尋：培僑中學46-97年文化社會學探索》，香港中文大學，未出版碩士論文。

健民所寫的「六七暴動的罪與罰」，乃以收藏於香港及倫敦的檔案文件為研究材料，重新瞭解當年抗爭的暴力程度，並反思殖民政府那種寧枉勿縱的處理手法。那些所謂在緊急狀態下所採用的非常手段，是否完全合乎法治精神，有其值得商榷之處。梁寶霖和梁寶龍寫「愛國工會：香港工會聯合會」，是從社會政治生態的環境來看工聯會的發展歷程。他們既看工聯會如何在急劇轉變中的環境裏尋找定位，回應勞工訴求，同時也嘗試分析它如何在政治夾縫中扮演一個頗為矛盾的角色。

在這兩個較為「熱門」的題目以外，我們選取了幾個較少人研究的界別和團體。這很大程度上是呼應前文所提到「左派」作為一個社會系統的觀點。在體育界，趙永佳、呂大樂和梁懿剛以愉園足球會為例以說明，這類社會團體在香港戰後歷史扮演的角色。在文學界，張詠梅以《文匯報》中一個「長壽」小說專欄《港Q正傳》來勾畫「左派」如何「想像」戰後香港的殖民與資本主義。而李少恩更以「南國粵劇團」和「左派」工人的業餘劇團運動來描述文藝活動對戰後「左派」運動開展、團結群眾的重要性。

一般有關香港「左派」的歷史討論，都集中在戰後五、六十年代的「社會主義建設期」至文革的階段。當然，對文革和「五月風暴」時期有較多關注，這不難理解，事關當時的政治形勢，對很多「左派」組織都有決定性的影響。如《港Q正傳》在「五月風暴」前便結束，而南國粵劇團在七十年代也開始淡出。但也有左派組織是堅持下去，並在組織、策略和活動上進行了轉型，因此本書也對六七之後個別「左派」組織的轉變加以分析。例如工聯會在八十年代初回歸大

局確定之後的重新參與社會、政治事務，又或者好像愉園如何蛻變成商業化經營以和其他球隊競爭，都更全面補充了對香港「左派」的分析。此外，還有劉翠珊對愛國學校怎樣和教育界主流結合，並在港英及特區政府支持下，完成「主流化」、「正常化」的分析，以及趙永佳和冼基樺討論於電影界銀都電影如何擺脫以往愛國電影界的鬥爭性格，並成為串連中、港、台電影產業鏈的推手，也是有助進一步探討這個社會系統在轉變中的生態環境裏如何演變。

對於香港「左派」的歷史研究，本書還只是初起步。我們暫時能夠瞭解的，只是該社會系統的某些方面而已。儘管有所不足，我們仍希望此文集能在傳統建制和「左派」革命論述之間走出另一條路，並發掘更多不同「左派」團體的歷史，以豐富我們對香港「左派」運動的認識，藉此為戰後香港歷史補上一筆。

最後，我們也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南中國研究計劃贊助本研究計劃，尤其是愉園、南國粵劇團、及《文匯報》之個案研究。亦感謝陳喜萍小姐為本書校對文稿，和亞太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支援本書編撰工作。

「六七暴動」的罪與罰：緊急法令與國家暴力

葉健民

「六七暴動」被不少人視為殖民管治的轉捩點，部份意見甚至認為它直接促成麥理浩時期的社會改革。「六七暴動」的而且確令英國人對治港策略重新思考，也令它開始認真檢視九七問題。但七十年代的連串社會改革，還有其他內外因素促成。首先，七十年代的社會改革很大程度上有着政策的延續性因素：港英自五十年代後期開始意識到現有的公共服務，已不足以應付二次大戰後快速增長的人口需求及公眾期望，並已啟動了連串對勞工、教育、房屋以至醫療服務等問題的研究和討論。另一方面，麥理浩的改革也與英國本土政治發展有着莫大的關係。左翼政黨工黨於1974年上台，令倫敦對香港的勞工權益、民生等狀況更為敏感，而英國工業界面對着價廉物美的港貨的挑戰，也從本身利益考慮去批判香港「血汗工廠」的生產模式。英商向英國政府表示對香港勞工福祉表示關注，表面上是要保障勞工權益，真正目的是要增加港商生產成本，從而減低港貨的競爭力。¹

但姑勿論「六七暴動」是否直接促成日後的社會改革，這場風波確實對殖民地政府構成一次極為嚴峻的挑戰。事實上，在衝突爆發的早期，倫敦初步評估風險時，也曾作過最

1 Ray Yep & Tai-Lok Lui, "Revisiting the Golden Era of MacLehose and the Dynamics of Social Reforms," in Ray Yep (ed.) (2013) *Negotiating Autonomy in Greater China* (Amsterdam: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Press), pp. 110–144.

壞的打算，責成港方研究從香港撤退的可行方案。不過當時港督戴麟趾認為所牽涉的人數太廣，而且一旦有關消息外洩，香港社會的信心必然會馬上崩潰，有關的討論才不了了之。²但這些事實，正好說明當年的情況，並非如個別殖民地官員事後所言，只是「茶杯裏的風波」。

事件的嚴重性，也反映在它對社會秩序的衝擊。「遍地菠蘿」是上一代人對「六七暴動」的集體回憶，而據官方的統計，這場歷時近一載的衝突，最終導致51人死亡和848人受傷，而其間共發現7,340枚「真假炸彈」。然而，這場衝突對港英的挑戰不單是如何防止暴力擴散和怎樣維持社會秩序，殖民地政府也面對另一個更為嚴峻的考驗，就是在維持社會治安的同時，如何兼顧尊重法制秉持公義的原則。殖民地政府在處理這場風波時，有沒有堅持自己一直所強調的法治精神，抑或只是以法律之名濫施國家暴力，是本文的關注所在。這篇文章是基於在香港和英國已公開的官方檔案，去重塑當年的衝突情況，試圖為大家從法律和執法角度理解1967年所發生的事情。³

五月工潮：左派借機總動員

源起於1967年初夏新蒲崗塑膠花廠的工潮迅速政治化，

2 英國國家檔案館,檔案DEFE13/857,Galsworthy to Seville Garner: The Possibility of a British Withdrawal from Hong Kong, No.263, 31/5/1967.

3 本文是基於我的另一篇學術文章撮寫而成，如有興趣參閱原文，可參考Ray Yep (2012), "Cultural Revolution in Hong Kong: Emergency Powers,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the Turbulent Year of 1967", *Modern Asia Studies* 46 (4): 1007-1032.

北京的高調介入也令事件火速升溫。5月15日中國外交部向北京的英國代辦處提出抗議，表明支持香港工人立場，而之後的《人民日報》相關社論和在廣州出現的群眾聲援大會，也令人覺得北京正在背後高度參與。而本地的親共勢力，也把握時機馬上成立「香港各界同胞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動員所有力量向港英宣戰。倫敦初時顯得手足無措，對抗爭活動也採取比較忍讓的態度，未有即時以強力鎮壓方式回應。事實上，英方內部就如何處理局面也存在着不同觀點。當中的主要分歧，在於怎樣判斷這場動亂是否由北京背後全力策動，抑或只是土共奉承中央的所為。對於香港，中共一直以來的官方口徑是絕不承認英國在港的管治權，但是會按「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彈性原則處理香港主權問題。就是說，北京短期內並沒有收回香港的打算，反而會從國家利益去考慮，充份利用這個殖民地的窗口作用，以保持中國對外的政治和經濟聯繫。然而，雖然英方相信這仍是中方對港的基本態度，但在文革的極左思潮下，卻沒有人能百分百肯定這種務實的態度會否延續下去。身處文革風暴中心的北京代辦處的英國外交官員，每天親身耳聞目睹各種文宣武鬥，自然與身處十萬八千里以外的港英官員對紅衛兵和四人幫的殺傷力和影響力，有着很不一樣的評估。

兩者的分歧，還在於各自對自身職責的不同演繹。就代辦處的外交人員而言，他們的主要責任就是要維持中英關係，首要任務是要避免兩國關係全面崩潰。但對港英政府而言，他們所理解的英國利益，就是如何保持殖民地的有效管治，不能令代表宗主國的殖民地政府權威掃地。所以對後者而言，面對社會動亂、土共公然挑戰，沒有可能坐以待斃，

必須對搞事份子予以回擊，盡快恢復社會秩序。但對前者來說，港英對土共強力鎮壓，可能只會進一步刺激國內勢不可擋的激進派，促使他們把香港問題無限上綱。倘如此，更很可能會損害中英兩國關係。倫敦方面，便在這些不同意見中間扮演仲裁者，就每次在香港爆發的衝突的影響和回應方案逐一評估，見招拆招。但當眼前危機已明顯不可能在短期內得以解決，而示威者的聲勢和氣焰不斷升溫的情況下，殖民地政府主張以強硬手段回應動亂的意見，便在1967年7月初開始明顯佔了上風，而港英對示威者的全面鎮壓遂掀開了序幕。⁴

港英態度轉為強硬的第一個主要訊號，是警務處長的換馬。原來的處長戴磊華 (Edward Tyrer) 由於未能令港府相信他有決心以強硬手段處理抗爭行動，於7月初被撤職。事實上，戴磊華在暴動初期正在外地休假，但他對情況不以為然，甚至認為假如馬上銷假回港反而會助長土共氣焰，結果這段期間警務處長一職由副手伊達善 (Edward Eates) 署任。伊達善在署任期間表現出色，更令港英相信即使換人，也不會令警隊效率受損，故此便果斷地以伊達善替代戴磊華，這也正式象徵強硬路線的開始。⁵ 而7月8日導致6名警務人員殉職的沙頭角警署槍擊事件，也為港英轉守為攻提供了一個契機。⁶

4 Ray Yep (2008), "The 1967 Riots in Hong Kong: The Diplomatic and Domestic Fronts of the Colonial Governor", *The China Quarterly*, 193: 122–139.

5 英國國家檔案館、檔案FCO 40 /112, No. 1046, 16/7/1967。

6 何家騏、朱耀光(2011)《香港警察：歷史見證與執法生涯》香港：聯合出版社、頁 164–166。

暴力風潮：印像與真相

在討論港英的強硬回應手法是否合理前，我們也許先要探究當年的暴力情況究竟有多嚴重。正如前述，「遍地菠蘿」是當代人的集體回憶，而我們父輩對1967年的土製炸彈、「同胞勿近」等情景的感受，也可以從大多數人傾向以「暴動」來形容當年的事件經過，看出主流意見對這段日子的厭惡和不安。這裏，我嘗試從公開的政府檔案重新整理當年抗爭的暴力程度，以提出一個比較全面的分析，以供大眾參考。據官方統計，「六七暴動」共有2,077人被判刑。我在香港歷史檔案館所找到634份相關紀錄，亦即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一。這些資料對了解當時情況，相信有一定參考作用。

表一 參與「六七暴動」被判囚人士罪行分佈

罪案分類	佔總數比例(%)	平均刑期(月)	平均年齡
(一) 藏有武器	24.6	33.9	24.9
(二) 參與動亂	11.2	20.4	27.3
(三) 與爆炸有關	11.2	45.1	25.9
(四) 與警務人員有關	11.5	14.0	30.6
(五) 煽動性演說或藏有煽動性物資	13.6	13.0	30.3
(六) 蔑視法庭	2.6	4.5	27.1
(七) 非法集會	18.3	17.1	28.3
(八) 其他	7.0	16.9	21.4

資料來源：香港歷史檔案館：HKRS179-1-19 (第一、二部份), HKRS179-1-23, HKRS292-2-1 (第二部份), HKRS292-2-1 (第三部份), HKRS41-2-726 (第一、二、三部份)

從表一來看，近半數暴動期間的被困人士（第四至七項）（46%）所觸犯的罪行，其實並不涉及嚴重暴力，當中11.5%是與警務人員相關（第四項）（例如不服從警方指示、侮辱警務人員），13.6%是因進行煽動性的演說或藏有煽動性的物資（第五項），而少數是涉及蔑視法庭（第六項）（2.6%）（如在法庭中辱罵法官）等輕微罪行。此外，有18.3%人士是因參與非法集會（第七項）而入獄，但值得注意的是，與第二項「參與動亂」相比，前者大部份人士在參與集會時並未有做出搶掠搗亂或嚴重的破壞秩序行為。事實上，當年其中一位被控參與非法集會的人士的辯方律師，便曾作過以下抗辯：

我的當事人如很多人一樣，都只是羊群。這些人很可能是因為恐懼、不經意地跟隨着人群走進了這些集會之中，而身處人群時，他們又害怕假如不表現得積極投入，人身安全便可能會受到威脅（因此便要全情參與抗議行動）。⁷

然而，當年的輿論大多均主張港府必須以強硬手段回應事件。《南華早報》在1967年5月23日便以下的社評：

只有一種方法去處理滋事份子，就是必須要他們為社會帶來的麻煩付出三倍代價。中環是貿易與工業活動的心臟地帶，那些試圖堵塞它的大動脈的人對其他市民而言並非善類。這些人必須受到嚴懲，以儆效尤，即使他們永遠被禁絕於社會，大家都不會覺得有甚麼損失。

7 香港歷史檔案館·HKRS70-1-313E·《南華早報》，16/6/1967。

當時的法庭也普遍同意這種從嚴治亂的原則，一位法官曾對上述的抗辯理由有以下的回應：

假如對這些聲稱是在壓力下參加抗議活動的人從輕發落，當他們日後再被命令或受恐嚇去參與危害公共秩序的行動時，便無可避免地會出現一種危險，就是他們可能會相信這些破壞行為的法律後果，會較眼前面對的自身安全威嚇為輕（因此便會繼續參與這些行為）。⁸

但即使我們再仔細分析較為嚴重的與藏有攻擊性武器及爆炸品相關的罪行，也會發現「六七」期間各種抗爭活動的暴力程度，實際較諸公眾的印象為低。從表二的數字來看，有近三成涉及與放置炸彈的罪案相關而被判刑人士（第四與第七項），其實並未能被證實有直接參與這些犯罪行為。事實上，警方只是在他們的同行者身上或者他們曾出入的場所內，發現藏有相關物品並以此而把他們定罪。同樣，表三也顯示出在與藏有攻擊性武器的罪案中，也有類似的情況，而且這種「間接」參與的比例也更高（第二、三項），高達六成以上。換言之，「六七」期間有直接參與一些嚴重暴力行為而入獄的人士，其實只是少數，大部份參與者所干犯的事項都是比較輕微的。但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直接或間接參與這些嚴重罪行的人士，也同樣會被判較長的刑期。例如藏有攻擊性武器平均刑期為五年左右，但因同伴藏有攻擊性武器而被判刑人士的平均刑期也達三年。而在與爆炸品相關的判刑中，直接或間接牽涉其中的人士刑期基本一樣，平均都在五年以上。

8 同上。

表二 與爆炸相關的罪行

罪案分類	佔總數比例(%)	平均刑期(月)
(一) 放置爆炸品	2.6	終身監禁
(二) 引爆爆炸品	2.0	終身監禁
(三) 製造爆炸品	0.7	120
(四) 被發現與藏有爆炸品人士同行	6.6	76.8
(五) 試圖引爆爆炸品	12.0	76
(六) 藏有爆炸品/腐蝕性物品	13.8	69.8
(七) 出入貯有爆炸品/腐蝕性物品場所	27.1	37.0
(八) 藏有軍火	2.6	67.5
(九) 未有舉報有人藏有爆炸品/軍火	6.6	36.6
(十) 藏有假炸彈	25.8	23.0
(十一) 其他	0.2	不詳

資料來源：與表一相同

表三 與藏有武器相關罪案

罪案分類	佔總數比例(%)	平均刑期(月)
(一) 攜帶攻擊性武器/足以用作攻擊性武器的物品	27.1	59.4
(二) 與非法藏有武器人士同行	26.0	33.3
(三) 經常出入或被發現在藏有攻擊性武器場所	34.1	10.2
(四) 未有舉報藏有武器罪行	12.8	11.8

資料來源：與表一相同

港英：寧枉毋縱

可以看出，在「六七」期間港英是採取一種寧枉勿縱的檢控態度，要以從嚴治罪的方法去震懾搞事份子。但這種策略之所以得以落實，很大程度上皆因殖民地政府拿着的尚方寶劍——《緊急措施條例》(Emergency Regulations)。

《緊急措施條例》於1922年通過，賦予港督極大權力。港督會同行政局，可以在任何情況之下，假如認為香港已處於一個緊急狀態或公眾安全受到嚴重危害的情況，便可以製訂任何他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必須法例。而在引用這項權力時，殖民地政府所受到的制約，更低於英國政府行使類似權力時要面對的局限。首先，港督在行使緊急權力時，毋須正式宣佈香港已進入緊急狀態 (a state of emergency)。同時，立法機關——立法局在整個過程中並沒有任何監督、把關以至評議角色，港督實際上可以隨時行使這些全無制約的權力。相反，英國政府假如要行使相關權力，必須要由君主宣佈國家已進入緊急狀態，而國會必須於五日內討論有關問題。同時，由於英國於1950年所簽署的《歐洲人權公約》，也不適用於香港，所以倫敦便是防止香港政府濫用權力的唯一把關者。

《緊急措施條例》多年來不斷修改，而港英也在暴動期間作出多項修訂，務求令政府能更有效去打擊各種抗爭活動，這當中包括授權警方更大權力去沒收武器、封閉場所、要求市民提供姓名及住址資料、禁止藏有及散播煽動性資料及作煽動性演說和處理非法集會等。這當然也包括前面提到的，容許警方即使未能明確證明被告有直接參與嚴重暴力罪行(如製造或放置炸彈、藏有攻擊性武器)，也可以因為同行人士干

犯有關罪行，或被發現經常出入藏有危險品的場所而予以檢控的權力。這些修訂，大大有利檢控工作。很多從前沒有足夠證據的個案，現在也可以輕易把有關人士入罪，這確實能產生很大的阻嚇作用。

然而，港英還有一項更具殺傷力、更具爭議性的權力——長期拘禁與遞解出境的權力。根據相關法律，港府有權因保安及治安理由拘留任何人士(包括合資格申請英籍的人)，期限為一年。更甚的是，這些被拘留人士毋須事先經法庭定罪。事實上，港府一直辯稱這些具情報價值的人士，由於案情大多涉及敏感資料，很多相關證據都不能在法庭上披露，又或者有關人士大多與犯罪集團有密切關係，也因此沒有人敢出庭頂證，故此假如堅持要先經正常司法程序處理，便等如白白放過這批關鍵人物。所以，簡單來說，只要倫敦方面同意，港英便可以未經審訊，任意拘留任何人士。「六七」期間，殖民地政府也充份利用這種手段，拘留了大批左派骨幹，特別是把鬥委會的主要成員，拘留在摩星嶺的「藍屋」之內，以進行進一步的盤問。鬥委會成員之一的蔡渭衡，便對「摩星嶺集中營」的牢獄生活，有過以下的記述：

……監倉是一個4' × 6' 的密封囚室。除了門上有小門窗之外，三邊牆壁都裝有小如黃豆的門窺鏡，換言之，警衛可以從任何一個方面監視囚徒。頭頂裝有一盞耀眼的射燈，還有一部強力風扇，即使是盛夏都感到寒意迫人。強光照明和嗡嗡作響的風扇24小時不停，加上單獨囚禁，這是精神與肉體的折磨。有的獲得「優待」者住進冷氣房，盛夏會冷得直打哆嗦，有時關機令你汗流浹背，然後是呼吸困

難，頭昏腦脹，這個時候就會把你叫出去問話。問話是採取疲勞審訊的方式，不分日夜，隨時叫去問半天，回到房間，剛剛瞌睡又被叫去。⁹

在拘留期限屆滿後，港英對於那些不具申請英籍資格人士，還可以選擇把他們遞解出境。事實上，自開埠以來，殖民地政府便經常以這種方法處理滋事份子和罪犯。這些早年用來專門應付三合會份子、國共人物和罪犯的方法，在二戰後更被變本加厲，單在1946年至1961年期間，港英便一共發出23,462張遞解令。¹⁰ 而在「六七」期間，港英也繼續沿用這個辦法去處理滋事份子。

表四記錄了我在香港歷史檔案館找到的「六七」期間，由港府發出的221份建議遞解令分析而成的資料。由於未能找到所有相關資料，所以也不能知道這些個案有多少代表性，但從這有限的資料中，也可以大致看到當年港英的強硬態度。

從表四中看到，過半數被建議遞解出境人士所觸犯的均非嚴重罪行(如非法集會、煽動性演說、蔑視法庭)。即使是涉及暴力的個案(如爆炸、藏有武器)，從少於兩年的平均刑期來看，相信也應該是案情較輕的罪行。資料也顯示當中96%人士之前並沒有任何犯罪紀錄，而很多早已在香港成家立業。遞解出境，對他們來說就是終身被流放外地，與家人永久分離。這種嚴刑，是否與他們所犯的罪行合乎比例，值得深思。

9 周奕(2002)《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文出版社，頁287。

10 Carol Jones & Jon Vagg (2007), *Criminal Justice in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Cavendish), pp.317-318.

表四 部份被建議遞解出境人士干犯罪行分類

罪案分類	佔總數比例(%)	平均刑期(月)	年齡(歲)
(一) 非法集會	14.7	14.7	30.0
(二) 藏有武器	29.9	14.1	31.9
(三) 參與動亂	16.7	13.1	30.6
(四) 與爆炸品有關	2.9	21.5	23.8
(五) 與警務人員相關	14.2	13.2	31.1
(六) 煽動性資料/演說	11.3	16.2	25.5
(七) 蔑視法庭	4.4	1.9	26.0
(八) 其他	5.9	16.0	23.6

資料來源：香港歷史檔案館HKRS41-2-276 (第一、二、三部份)

但港英要執行遞解令，卻碰上一個很大的阻力，就是中方的拒絕合作。北京一直拒絕承認關於香港地位的不平等條約的合法性，認為英國無權統治香港。既然香港仍然是中國的一部份，港英便無權把身居香港的中國人驅逐出境。這種態度，便成為港英政府執行遞解令的攔路虎，「六七」期間傅奇和石慧在兩地政府邊境對峙的戲劇性一幕，正是中港雙方在此問題上角力糾纏的明證。

但遞解出境不成卻並不意味有關人士可以重獲自由，恢復正常生活。港英決意不讓這群「滋事份子」重返社會，所以《緊急措施條例》及相關的出入境管制條例，同時賦予政府權力，如無法執行遞解出境令時，可以繼續拘留有關人士。至於拘留時間，可以視乎具體情況決定而毋須有一個明確期限。在1946至1960年間，便有曾四萬人因此被拘留。¹¹ 這種由

11 同上。

行政部門全面控制遞解出境和拘留制度，也曾引起本地法律界以至倫敦方面的批評，認為港府在這方面的權力過大，制約不足。但港方卻一直堅持有關做法的必要性。1947至1958年間擔任港督的葛量洪 (Alexander Grantham) 便認為必須維持這種安排，因為「這裏有數以千計無視法紀鋌而走險的人聯群糾黨，組幫結社，假如有機會的話，他們會毫不猶疑去使用暴力。」¹²

同期的警務處伊輔 (Henry Heath) 也有着類似的觀點。他說：

我不是主張要把所有罪犯都遞解出境，但我認為這是我們對付三合會成員的最有效武器。假如一早取消了這種制度，我們就沒法有今天擁有的對這些犯罪集團和壞份子的認識和掌握。¹³

但在壓力之下，港英也在1962年作出讓步，設立由一名法官和兩名社會人士組成的仲裁委員會，每年重新檢視每個因無法執行遞解令而被拘留的個案，向港督會同行政局提出拘留期限的建議。但即使如此，港督也有權不接受委員會建議而毋須作出任何解釋，假如他認為個別個案屬「政治敏感」，也可以不容許委員會檢討有關案件。同時，即使在修例以後，拘留期限仍然不設上限。也因為這個原因，遞解出境和相應的拘留依然是港英政府在「六七」期間打擊示威者的重要手段。

12 英國國家檔案館，CO 1030 /6, 839 號電報，24/10/1954.

13 同註 10，頁 328。

政治考慮凌駕法制尊嚴

最諷刺的是，雖然港英一直強調維護法治的重要性，但到了後來對法制尊嚴的最大挑戰，卻並非來自左派群眾，而是倫敦。

「六七」的暴力抗爭高峰期大約在1967年底左右，到了1968年初，大型的衝突以至炸彈威脅已大為減少。這種改變，很大程度上與國內的政治形勢有關。文化大革命在1967年夏天進入派系武裝衝突的階段，全國差不多陷入內戰邊緣，在長沙、重慶、瀋陽和南京等主要城市也爆發了嚴重的派系武鬥，情況接近失控。這種情況，令毛澤東意識到必須調整策略以穩住局面，溫和派於是得到一個喘息的機會，暫且把激進力量遏止下來。眼見北京立場上有所改變，倫敦方面也希望把握機會化解危局，便要求香港政府予以配合，以減低與內地政權的張力。倫敦的其中一個要求，就是要港府盡快釋放因參與暴動而入獄的囚犯。港督戴麟趾卻對此不以為然，認為當時左派氣焰仍然囂張，還未到講和的時候，兼且所有囚犯都是經過本地司法程序而被判刑的，沒有理由輕率地把他們提早釋放，損害本地司法制度的尊嚴。然而，倫敦對香港在這個問題上的施壓卻與日俱增。1969年4月，中共中央召開第七次全體會議，決定重新外派大使出國，向外清楚表示中國外交政策重回軌道的訊息，意欲與北京重修舊好的倫敦，也決心不能讓香港成為中英關係的絆腳石。戴麟趾在壓力之下，也引用了《皇室訓令》賦予港督的權力，把刑期覆檢委員會原本只能檢討刑期超過六年的個案的權限，擴展到可以處理4年或以上的案件。這種改變，令這個委員會可

以有權就更多個案向政府提出減刑建議。其中一個受益人，就是「六七」期間被捕的《大公報》記者黃澤。港府欣然接受委員會的建議，把他的刑期由五年減為三年，令他可於1969年提前出獄。事有湊巧，黃澤出獄後不久，自1967年起被內地政府拘留的路透社英國記者格雷(Anthony Grey)亦被釋放。但戴麟趾的讓步，仍未能完全滿足倫敦。英聯邦及外交事務部官員對「六七」囚犯的問題，也顯得愈來愈不耐煩。有關官員一再要求港府以犯人的健康狀況、性別以及其他恩恤理由予以減刑，以求盡快釋放所有相關人士。但戴麟趾對此始終有所保留，不願意全面配合，因而與倫敦鬧得不太愉快。當年的港府政治顧問，曾對這種緊張關係有以下描述：

在我來看，港督(戴麟趾)對倫敦要求改善中英關係的欲望已顯得煩厭甚至過敏，這差不多已成為了他的禁忌。所以，愈多英國官員對他說明這方面的重要性，那怕只是很籠統地提出來，他就愈會覺得這是一種要犧牲香港利益以換取倫敦利益的不合理做法。¹⁴

但倫敦官員的態度也是明確的，他們甚至提出即使行政局議員反對提前釋放所有囚犯，但按照香港的憲制框架，港督也不一定要接受他們的意見。部份觀點，甚至引用另一個英國屬地塞浦路斯五十年代的情況，來說明減刑的合理性。當年，塞浦路斯政府為了平息動亂，以重刑圖產生殺雞儆猴的示範作用，但在秩序大致恢復後，當地政府在英國政府的

14 曾銳生訪問 Arthur Maddock 紀錄，頁 64-65，牛津大學羅德學院(Rhodes House)圖書館，MSS Ind. Ocn.s.340.

同意下，釋放了大批因政治主張而不涉及人身傷害罪行的重犯。這就是說，在殖民地政府風波平息後從寬覆檢於非常時期為懾服滋事份子所用的重刑，也是有先例可援的。¹⁵

事情一直處於膠着狀態，「六七」囚犯也沒有如倫敦所期望，全數在1971年內釋放。直至戴麟趾1971年底離任，事情才出現突破。外交官出身的繼任人麥理浩，與倫敦方面明顯較有默契，也希望盡快解決有關問題。麥理浩明言，這個問題如不早日解決，大有可能影響到他整個任期的工作。¹⁶故此，在他上任一年之期，再有17名囚犯被減刑，令他們可以在1972年底前出獄。但最為棘手的，是餘下來的最後四名涉及殺警和嚴重傷害罪行的重犯。由於案情嚴重，要找到一個令人信服理由大幅減刑，難度甚高。然而在中英兩國關係進一步恢復的大勢下，港府的迴旋空間也所剩無幾。1972年底，周恩來在北京接見英國外交大臣時，宣佈中國政府會釋放所有被拘留在境內的英國人，也同時表明雖然此舉不會和香港「六七」囚犯一事混為一談，但他也希望後者能早日重獲自由。到了這一刻，港方再沒有甚麼空間向倫敦說不了。1973年1月，兩名被判終身監禁的囚犯刑期被大幅減至八年。到了1973年5月3日，所有1967年間被囚人士全部「服刑期滿」，重獲自由。

15 英國國家檔案館·FCO 40 /262, no. 41, 6/7/1970.

16 英國國家檔案館·FCO 40 /329, Guidelines for the Governor Designate, Hong Kong; Paper C, 18/10/1971.

結語：歷史可會重覆？

毫無疑問，「六七暴動」確實是殖民管治上的一次嚴峻考驗。面對這場本地親共勢力的總動員和內地政權近在咫尺的政治和軍事威脅，港英動用了一切政治、行政、武力和法律手段以求自保，是意料之中。事實上，當時的社會輿論也大致支持政府治亂世用重典的手法，即使是一直對港府頗多批評的人士，如時任市政局議員的貝勒奇 (Bernacchi) 在這個時候也站在政府的一邊。他表示：「我們(香港市民)第一次要做出選擇，第一次要在危急關頭下選擇我們的效忠對象，而大部份香港市民選擇了支持一個不容忍不管是由左派或右派、本地或外地發起的動亂的香港政府。基本上，我們選擇了支持當前維護治安秩序的香港政府。」¹⁷ 在這個亂局之中，港英以維護秩序之名以嚴刑峻法回應挑戰確實能穩住局面，也取得民心，但過程中是否所有以法之名的行徑都是合乎法治精神本義，卻值得探究。法治不單講求政府行事有法律依據和按法定程序辦事，關鍵也在於法律本身是否合理和司法過程是否合乎公義原則。但「六七」期間，刑罰與罪行往往不成正比，行政部門行使權力又不受制約以至剝奪公民個人自由，又不一定經過正常的審訊程序等情況，確實與法治的精神有所偏離。而後來關於囚犯的減刑期爭議，更反映出倫敦對法治堅持的偽善。治亂世可能真的要用重典，但假如任由政治考慮輕易凌駕於法治精神之上，卻是十分危險的事。在大英帝國的歷史上，類似「六七暴動」的衝突場面並不罕見，而殖民地政府往往也會採取強硬手段回應，極端例子便

17 香港市政局會議紀錄，4/7/1967，頁 131-132。

是五十年代肯雅的茅茅之亂 (Mau Mau Rebellion)。當年肯雅在緊急法令之下變成一個人間地獄，國家機械成為任意蹂躪人民的猛獸。情勢危急是否就可以把所有惡法合理化？在研判位處中非的殖民地尼西薩蘭 (Nyasaland) 1959年的動亂處理手法時，英國政府委託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便對當地政府有以下的批評：「在緊急狀態下，政府被賦予很大的立法空間。在正常時期，立法者必須在政府權力與公民自由中尋找平衡，但緊急狀態的出現，並不意味立法者可以完全推卸這種責任。」¹⁸ 對人權法治的尊重，往往是在困難時期體現出來。「六七暴動」期間，港英即使有法可依去以嚴刑治亂世，有民情可恃以強硬手段回應抗爭，但過程中確實有失分寸，也為自己百多年的管治上留下了污點。

鑑古知今，不少朋友眼見今天民心躁動，管治失衡的局面，心中都有着一個疑問，就是「六七」式的暴動會否再度爆發，歷史會否重複？「六七暴動」是在特殊的歷史時空下的產物，由多個獨特的政治因素共同孕育出來的群眾事件。首先，六十年代的中期，當時的港英政府對自身的管治責任及對社會介入的程度，仍抱有一種模稜兩可舉棋不定的態度，無論在政府規模以至心態上都無足夠能量去爭取群眾的支持回應社會的需要，為反社會的情緒提供滋長溫床。同時，當年的冷戰局面也在暴亂初期為港英以強硬手段提供了很重要的氛圍。國際輿論與及長期以來對共產主義的批判宣傳和教育，令港英可以輕易利用群眾的恐共心理為各種國家暴力合理化，但這種「以暴易暴」的手法也反過來刺激左派

18 Brain Simpson (2002), "The Devlin Commission (1959): Colonialism Emergencies, and the Rule of Law",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2 (3):36.

以更激進的手法去回應，形成一種惡性循環。最後，文革為本地親中群眾提供了廣闊的想像空間，也令身處香港的共產黨相關組織感受到「起義」的壓力，兩地的激情互動結果便是本地左派的總動員。可以斷言，沒有這個深入本地各階級的中共組織網絡統籌調動、沒有它全情投入的人力物力動員、沒有北京在背後有意無意的推波助瀾和國際環境，1967年的動亂也沒有可能是最後所見的曠日持久歷時近一年的官民衝突。當然，這並不是說今天社會天下太平。在種種社會問題不斷積累，中港矛盾日盛，人心躁動的今天，發生各種各樣的騷動，恐怕只是早晚之事。但「六七」當年近乎不受約制的國家暴力的程度，和左派機器總動員的條件已不復存在的情況下，「六七暴動」式的群眾事件重現的可能性，大概是微乎其微。

但在政治不斷升溫的今天，極端政見逐漸擴散，暴力行徑也開始萌芽，各個陣營劍拔弩張，官民之間的張力大有可能最終會演變為衝突場面，出現騷動的可能性絕對不可以低估，那麼1967年的歷史教訓又可以給我們甚麼啟示呢？用盡辦法務求迅速回復社會秩序，相信是任何政府的本能反應。但「六七」的經驗告訴我們，為求效果而置法治人權原則不顧的做法，往往會帶來更大的危機。實情是，毫無節制地以國家暴力去回應動亂，實行以暴制暴以牙還牙，結果只會帶來一個惡性循環，情況就如1967年的左派便以「先鎮後暴」為自辯，強調放炸彈等暴力行為只是對港英殘暴鎮壓的回應。但本地左派嘗試把自己的暴力行徑合理化的論述，並未得到大眾輿論所認同，當年的主流意見甚至認為港英治下的社會情況即使不太理想，但尚算能保持一個安定的局面，以

極端手法鎮壓動亂大致可以接受的。這箇中很大原因，是當時左派所推崇和代表的一套價值——共產主義、一黨專政、階級鬥爭、反英反殖等，並未為本地群眾普遍接受。換言之，公眾對種種不合乎人權法治的鎮壓手法視若無睹，是因為大家默許這是為了保持另一個相對可取的秩序的代價。當天，大家選擇了冷漠疏離但相對自由、安穩的殖民統治，拒絕了近乎瘋狂的文革思潮。但在今天，回歸後群眾對本地的政治經濟秩序愈來愈質疑抗拒的情況下，捍衛現狀的口號大概已失去了道德力量。又或者對不少人來說，除了法治精神和自由傳統外，我們的政治制度還剩下甚麼足以令公眾尊崇珍惜的內容呢？在權威崩壞認受不足的殘局下，特區政府假如還以平亂之名不顧一切去求平息社會紛爭動亂，甚至不惜如當年港英一樣肆無忌憚濫用刑法處理群眾衝突，恐怕只會徹徹底底破壞當前這個本已殘破不堪的政治體制的最後支柱，令自己陷入更險惡的萬丈深淵。

國家權力與教育

——戰後至回歸前親共愛國學校在香港的發展

劉翠珊

前言

在過往香港教育史的研究中，有相當多數量集中於英國及港英政府相關的教育政策，譬如，吳倫霓霞介紹了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早期在港英政府發展公共教育中的東西方文化互動。¹史域庭(Sweeting)主力以教育社會學分析戰後香港的教育政策。²陸鴻基(1991)探討了殖民地政府在課程中使用中國文化的政治。³Edward Vickers⁴，Paul Morris⁵及簡麗芳⁶以歷史科及中國歷史科的官方課程分析親英領導階層(政府和本地教育

- 1 Ngai-Ha Ng Lun (1984),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develop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Luk, Hung-kay (1991) "Chinese culture in the Hong Kong Curriculum: Heritage and Colonialism".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35 (4) 650-668.
- 2 Anthony E Sweeting (1993), *A Phoenix Transform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in post-war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3 Wong, Ting Hong (2003). "Educa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Reconsidered: Chinese School Identity in Postwar Singapore".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16 (Jun), 237-265.
- 4 Edward Vickers (2003), *In Search of An Identity: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as a School Subject in Hong Kong, 1960s-2002* (New York: Routledge) ; Edward Vickers, Flora Kan & Paul Morris (2003), "Coloni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History" in Hong Kong's schools",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29: 95-111.
- 5 同上: Vickers (2003).
- 6 同註5; Flora Kan (2007), *Hong Kong's Chinese History Curriculum from 19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精英)的統治策略。黃庭康(2002, 2003, 2007)探究了在新加坡和香港教育發展和國家建設中的衝突和矛盾及折衷。⁷他們或以教育史學觀點，或以教育社會學分析，同樣利用及整理了大量政府教育歷史檔案資料、報紙資料及政府文獻，對香港教育歷史拼圖作出不少原創的分析及補充。

可是在國家權力形構與教育的研究與論述中，往往只集中於當權政體與教育的關係，而忽略潛在國家勢力的經營。香港的教育歷史研究過往主力分析港英政府與教育的互動，只有十分少數的學術研究涉及中國(中共)這股在殖民地時潛在的國家勢力與教育的關係，實際上，除了港英政府的管治可視為一種政權，中國共產黨政府及台灣國民黨政府均曾為香港潛在而活躍的政權。台灣國民黨政權在香港的活動當然可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下審視，不過由於個人能力、資料來源及時間所限，是次的研究重點只能限於後來取得香港主權的中國共產黨政府。

在香港回歸後，愛國親共力量不斷在香港政壇上、統治層上顯露，他們的存在與活動不只頻繁及公開(當然也有不公開及半公開的)，其影響力更不容輕視。政界、文化界、學術界及大學出版社開始出現有關其活動的專書。不過，迄今只有少數中文、學術著作就親共愛國教育在香港的活動作出不偏不倚的記錄、討論和分析。本文正正為了填補此部份的缺漏以闡明其政治和教育之間的互動。

7 Ting-Hong Wong (2002), *Hegemonies Compared*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Falmer); Ting-Hong Wong (2007), "Educa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Reappraised – Chinese School Identity in Postwar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7: 63–78.

本文介紹的是戰後至回歸前，即二戰之後至1997年前出現的親共愛國教育政策與實踐。選擇戰後作為起點，是因為當年正是二次大戰後百業待興、人口急增、香港社會重塑的關鍵歷史時期，也因為不少親共愛國學校是自這段歷史時期建立。至於中國政權重掌香港的回歸歷史則是另一段歷史關鍵時期。故此，本文以戰後為始，以回歸前為結，企為香港親共愛國教育歷史作一綜合的資料組織和討論。

縱觀此段時期，香港社會、教育及其經濟體系經受巨變。在此可再分為兩半：(一)戰後至文化大革命後；(二)中國經濟開放至香港回歸前。前段歷史反映了愛國愛黨學校的建基及早期發展；後段歷史則記錄了其轉變及力量重整的政策與實施。

香港親共愛國學校發展的歷史背景

1946至1976年間，香港人口膨脹八倍，學校學位供應大為不足。⁸眾所週知，香港九年免費普及教育(或稱義務教育)是從1978年施行，在此之前，教育既非免費，亦不普及。在社會福利不足，(低收費/免費)教育需求大幅增長，和感情層面聯繫等因素影響下，親共愛國學校本應該受到普羅大眾歡迎，並得以擴大中國政府在香港的影響，然而，學校的歷史發展卻並非如此一帆風順。

不少學術研究已指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不少中國社會主義者、共產黨人士已進駐或進出香港。他們以香港進出便利以進行宣傳和貿易，希望在香港建立據點，一方面為解放戰爭作後勤基地、聯絡站，另

8 同註2。

一方面，亦有一個撤退的後方。他們在當時為反建制、反主流社會的左翼份子，對於中國內地及殖民地的政權都是一股潛在威脅。故此在殖民地時期，港英政府視他們為中共的代表、反殖民的力量，他們在香港進行的活動亦隨着中央勢力的增長而備受當局注視。

除了進行商業、政治及社會活動，他們亦重視教育。二十世紀四十至五十年代，香港約有數十間親共愛國學校，其中比較有名及規模較大的有香島、旺角勞工子弟學校、漁民子弟中學、漢華中學、中華學校、福建中學、中業學校、南方學院和培僑中學等；另外，也有為數甚多由不同親共工會組織的學校。它們多數都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建校，一般都是私立學校。嚴格來說，當時這些學校又可分為共產黨學校(communist schools)及親共愛國學校(communist-affiliated schools)，前者由共產黨人主事，其政治功能明確；後者則由權力邊緣甚至以外的親共愛國人士創立和主理，有其政治立場，但其政治功能不明確。不過隨着時代的變遷、學校數目的下降，其間的分野亦在1970、1980年代變得含混。

這些親共愛國學校的辦學目的都是為本地培育愛國愛黨的親共中國青年，故此在香港殖民地時期一直堅持以中文(廣東話)為主要教學語言，少數學校由於師生都曾一度有為數不少的福建人、客家人，故此亦選擇性地輔以福建話、客家話教學。雖然不同的學校或就着其政治策略、條件、位置及有關人士背景，有針對不同的族群、階級，例如工人階級、華僑、福建人等，不過他們一般都以本地大眾為服務對象。戰後內地移居香港的人口數字龐大，政府發展教育亦欠積極，固有的學校學位遠遠未能滿足社會的需求。單以1948年在學

的中、小學生人數為112,611，官方估計失學兒童數目高達45,500。⁹ 加上親共學校學費廉宜，只及官校的三分之二，以勞工子弟學校為例，在1950年的學費為每月四元，而一般官立小學學費則為每月六元¹⁰，故此生源甚足。雖然有其政治立場，愛國愛黨學校的確為戰後社會提供了不少學位；其廉宜學費、純樸校風亦甚得部份中國家庭喜愛。

親共愛國學校的老師當然以親共愛國人士為主，他們與中國共產黨都有緊密聯繫，在《吳康民口述歷史》即記錄了此位培僑中學前校長在戰後應聘及1949年前途去向的人生經歷：

「我被動員來到香港的培僑中學任教，介紹人是連貫——當年香港地下黨的負責人，說是『革命需要』。」「培僑有很多老師都是來自大後方、游擊隊的老革命……1949年共產黨在華南大局已定，解放前夕，學校很多主任、老師『不辭而別』，據說他們有更重要的任務，要回去加入新中國的建設行列。我呢，沒有人叫我回去……我想，如果以自己的學科本事，還有父兄輩『紅底』的幫助，回到本行肯定前途無量……華嘉(另一位培僑老師)對我曉以大義，因為我是有學位的註冊教師，對穩定學校很有作用，要我以大局為重，應聽從分配。」¹¹

9 黃庭康(2010)〈國家權力形構與教育：戰後香港黑市學校的歷史個案〉，《台灣社會學刊》，第44期，頁107-154。

10 香港教育資料中心(2004)《香港教育發展歷程大事記, 1075-2003》，香港：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

11 吳康民、方銳敏(2011)《吳康民口述歷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頁30-31。

在戰後重建時期，學校老師的薪金甚低，任教高年級的教師月薪僅得200元左右，低年級的甚至只有120元。相較同期的官校及補助學校教員月薪則分別更為明顯：甲等800-1480元；乙等450-760元；丙等300-425元；丁等150元。¹² 一般親共學校老師的確欠缺嚴謹的師訓或學院學歷，不過亦有由內地而來客居的著名親共愛國學者。

以中共建立的其中一間學術專上學院達德學院為例，即有胡繩、鍾敬文、千家駒、許滌新、黃藥眠、陸怡、陶大鏞、章乃器等著名學者組成師資隊伍。並邀請馬敘倫、馮乃超、喬冠華、何香凝、茅盾、林默涵、周而復、郭沫若、夏衍、臧克家等社會名流講學。¹³ 達德學院建於1946年。該校是「根據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的指示，由中共南方分局領導」創辦的大專學院。¹⁴ 其創校校長陳其瑗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採礦冶金工程科，先後做過北京政府農林秘書、交通銀行秘書長，廣東省公署秘書、財政廳秘書、工藝局實業司科長、鐵路局總務處處長、機務處處長等職。隨後受孫中山委託，擔任大元帥府財政部總務廳廳長一職，後來還擔任過廣州市財政局局長、廣東省財政廳廳長、中國銀行監理官。1926年，參與組建中山大學，並在1946年創辦香港達德學院，該校在1946年9月收生，10月開學。學院董事會由李濟深、蔡廷鍇等人組成。在1946年10月至1949年2月，達德學院一共招收學生740多人，其中絕大部份都回到南方各省的中共根據地參加工

12 同註10。

13 曹直(2004)《文化青山：香港達德學院概況》，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14 吳倫寬霞、余炎光(1997)《中國名人在香港-30、40年代在香港活動紀實》，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出版社，頁192。

作，為中共輸送了一批革命人才。事實上，除了達德學院，其他親共愛國學校亦為新中國的成立，輸送學生；有些甚至成為國內的骨幹幹部(不少已退休)。達德學院在1949年2月即被教育司奉港督命令，取消其註冊資格，¹⁵ 因為港督認為有充分的證據證明該院利用學校以達政治活動之目的，違反本港及其他地方之治安利益。

三、戰後至文化大革命後親共愛國學校的發展 (一)

如前文所述，戰後親共愛國學校曾在華人社會中建立相當的網絡，透過教育既可收容南來的共產黨人；更為新中國培育愛國愛黨的熱血青年。不過到了1950至1970年代親共愛國學校即進入困難的時期。如史域庭研究所言，政府的確曾針對具政治威脅、企圖顛覆政府的學校(包括親共、親國民黨愛國學校)作出打擊。¹⁶

為了避免學校被政治勢力滲透危害學生發展，在此時段訂定了相當嚴厲的法則以管制私立學校的發展；政府在1947年公佈多項《學校應守規則》以加強對學校的管理。例如嚴格控制私校的學費，學費標準須經教育署長審核，並要在獲批後刊登在《憲報》(Gazette)，不得隨意更改。又禁止在校內捐款，要求學校將全年收費均攤十次繳交。¹⁷ 新令亦要求學校負

15 同註 13。

16 同註 2。

17 黃庭康(2010)，〈國家權力形構與教育：戰後香港黑市學校的歷史個案〉，《台灣社會學刊》，第 44 期，頁 107-154；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HKED) (1948), Annual Report, 1947-8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pp.12.；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HKLC) (1947a), Hansard (Hong

責人及教師在教育司署註冊，¹⁸並在1952年訂明教師的最低學歷及專業資格。¹⁹加上當時「租務管制委員會」(Rent Control Committee)在1952年建議撤銷戰後實行的租務管制政策，並在隨即數年建議批准商用建築物把租金上漲上限擴至50%。商戶(學校)在1949至1955年即可能要繳交四倍租金。²⁰1958年政府修改了「教育則例」(Education Ordinance)，亦要求學校負責人要向教育署長提供由工務局(Department of Public Works)及消防處(The Fire Brigade)發出的證明書，保證校舍符合安全規定。²¹雖然最後當局選擇地放寬對校舍結構及防火安全標準，也開辦六個月到一年的課程幫助教師取得註冊所需的專業資格，不過親共愛國學校及其成員則多未能受惠。²²

個別學校亦因其政治活動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壓，例如，香島中學的創校校長盧動，他一直參與社會工作，並擔任領導，例如「港九各界勞軍籌委會」(第一個支持共產黨的跨行業組織)的副主席；加上盧動在學校掛國旗唱國歌，故政府即根據《驅逐不良份子出境條例》在1950年1月5日將盧動強行遞解出境。²³1950年6月13日，教育司署又以漢華中學校舍防火設備不足為由，通知一個月內取消其註冊，並發信致校內

Kong Government Printers), pp.266-7. Session on August 21, 1947. ;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HKLC) (1947b), Hansard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s), pp. 277. Session on September 4, 1947.

18 同註 2 ; 同註 17HKED (1948)。

19 同註 2 ; 同註 9 。

20 同註 9，頁 123 。

21 同註 9，頁 123 。

22 同註 9，頁 129-132 。

23 周奕 (2002)《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文出版社。

的註冊教師，提醒他們在取消註冊的漢華任教即屬違法；²⁴ 另外，1951年港府宣佈接管香港仔漁民學校，改辦官立小學；停止對勞校的津貼；3月9日下令封閉南方學院。²⁵

在1967年代之後，公眾對親北京陣營的支持降到了歷史最低點。1967年的社會騷動，在當時參與及支持者稱之為「反英抗暴」，不過不少民眾卻認為「六七暴動」乃是香港親共人士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作出的極端社會行動。當時社會低下階層和工人階級的生活的確困苦，可是事件終究由最初的勞資糾紛、罷工、示威，發展至放炸彈、殺人等暴力行為。²⁶ 在這個時期，公眾對香港政府的支持是顯而易見的：數百萬計對警察福利基金的捐款，以及不同社會團體在報紙上的支持廣告。最後，本土親北京陣營的信譽受到極大損害。隨着領導階層和成員日漸年老，財政困難和孤立社會的問題困擾着當時親共愛國人士，學校亦無例外。

這些愛國學校聲稱「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是為讓民眾順服資本主義的剝削壓迫而服務」。²⁷ 因此，愛國學校的教育，「是要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灌輸給新一代，並使他們獲得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必要知識。」這樣做的目的，「是令學生反對剝削體系，保衛社會主義體系，熱忱地去建設沒有階級差別的共產主義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講，愛國教育必須建立在一種新的教育理論和方法之上，從根本上有別於

24 同註 10，頁 71。

25 同註 10，頁 72。

26 Robert Bickers & Ray Yep (eds.) (2009), *May Day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7 Ting-Hong Wong (2002), *Hegemonies Compared*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Falmer); 培僑中學校刊，1967。

殖民地和資本主義的教育理論和方法，並有全新的內容。愛國主義教育實踐和內容也表明，在不同時期，「社會主義者視教育為政治鬥爭的支持力量，用以推翻資本主義殖民者，建設親共的社會主義社會。」例如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中期，不少愛國學校退出公開考試，除了少數學術成績特別優秀的學生，學校不鼓勵大部份學生應試。愛國學校教學成員在《文匯》表示，香港的公開考試是控制學校知識的一種方式，²⁸ 也是政府「奴役化教育體系」的一部份。²⁹ 學生從公開考試中撤離，是愛國學校政治立場的表態，並表明個人利益服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整體利益。不參加當地的公開考試，這些學校的許多學生在畢業後，繼續在中國內地學習，並留在內地工作。在1959年大躍進失敗和三年自然災害之後，中共政府不再鼓勵學生去大陸，不少學生結果在香港親中企業就業。

在選用教材上，愛國學校亦有採用內地教材。1958年4月18日，培僑中學圖書館遭到突擊檢查。³⁰ 香港島教育督查組負責官員攜同五名助手抵達該校。他們拿走19本書，在5月13日致校監的警告信中將四本作為「學校管理不善」的證據。³¹ 在這些和其他指控的基礎上，諸如僱傭非註冊教師、在校會上討論政治問題，8月6日培僑中學校長被遣送至羅湖，並被取消教師註冊和資格。³² 在《培僑中學五十週年校慶特刊》中，印有1967和1968年兩幅畢業生的照片，上面的學生手持「紅

28 同上Wong (2002), p. 217–219。

29 同上Wong (2002), p. 218。

30 同註 23。

31 同註 23。

32 《培僑中學五十週年校慶特刊》，1996。

寶書」(《毛主席語錄》)站在照相機前拍照留念，³³那時學生學習「紅寶書」並將其視為生活的指示。儘管政府教育條例有明文限制，但這些規章中條款的執行往往視情況而定。那些推行和操縱愛國主義教育者，經常有被起訴、逮捕、取消資格和驅逐出境的危險。然而，愛國學校仍然舉行早會，談論當代中國的成就、新中國的官方新聞資料。

平情而論，除了打壓政黨在學校的發展，政府亦有回應社會的需求。香港人口在戰後持續增長，由接近200萬人增至七十年代中後期的400萬人，中小學生則由10多萬銳增至90多萬，³⁴教育壓力很大。為了應付此情況，政府先後完成了《菲沙報告書》(Fisher Report)(1951年)，建議發展小學、鼓勵開辦私校、擴充工業學校、擴大師範教育、加強英文教學、加強對教育的控制及管理。政府因應形勢，在1955年開始推行《小學擴展的七年計劃》，包括建立五間官立小學，大量增加小學學位；1963年港府又發表《教育委員會馬殊－森遜報告書》(Marsh-Sampson Report 1965)，落實取消小學入學試、擬定資助則例、擴展新界中學學位、減低師生比例等措施。政府隨後在此報告書的基礎上，於1965年6月發表《香港教育政策白皮書》，建議讓80%兒童入讀由政府資助的小學，及讓約15%的小學畢業生能升讀官立中學、資助中學及若干選定的私立中學。這份報告書奠定了以後十多年的政策走向，即以學位數量為政策發展的目標和以發展由政府資助的學校為主線。

1970年《施政報告》宣佈翌年起實施強迫小學義務教育，

33 同註 32。

34 陸鴻基、鄧健靈(1983)《香港戰後的教育：統計圖表》，香港：華風書局有限公司。

並制定《入學令》，規定對不送子女上學的家長之刑罰。1973年，教育委員會發表《教育委員會對香港未來十年內中等教育擴展計劃報告書》，目標在1981年能讓80%少年獲得資助初中學位。但港督麥理浩對報告書提出的步伐不甚滿意，於是立法局成立專責小組，最後於1974年10月完成《香港未來十年之中學教育》報告書，計劃逐步推行九年免費教育、推行浮動班制和買位制，以及建議取消中學入學試。

政府擴大對質素較佳的學校的補助，減少失學學童的數字，間接令親共愛國學校承受更大的競爭，而當其競爭私校紛紛受到政府間接或直接資助時，它們的形勢則更惡劣。資源不足令學校在師資、設備、備課空間、課外活動等各方受到限制，加上其明顯的政治立場，對一般剛由內地逃難而來的家長和學生吸引力大減。

中國經濟改革開放至香港回歸前親共愛國學校的發展 (二)

中國在文化大革命後，國家財政赤字嚴重。改革開放是1978年的重要國策，針對國內的經濟體制進行全方位的改革，並努力將中國的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轉移到市場經濟。事實上，中國經濟開放令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自1982年起，中國和英國政府開始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最後，中英雙方在1984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決定中國在1997年7月1日起收回香港的主權和治權。

隨着中國的改革開放和《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社會和親北京社會主義陣營的方針亦有所改變。親共愛國教育的政治教育在前一時期被認為無可置疑的非法行為；但當1984年

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之後，這些行為在社會上卻逐漸有人認同其合理性。從內部來說，親北京陣營要尋求一個策略以穩固他們的人力資源、網絡，以至社會影響力。在轉向新自由主義經濟政治的壓力下，內部需求也同時在推動着改變。主權的轉移，給予親北京社會主義陣營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事實上，親共愛國學校一向致力讓學生為回歸中國做準備，新的政治形勢正符合他們多年來堅守的政治任務。

在1980年代中期之後，隨着主權即將移交，原本推翻殖民地資本主義政府的目標失去了意義，香港親共愛國學校已不再從事反社會運動；反過來說，他們更努力重建其教育影響力及社區力量。由於1967年暴動的倒行逆施和9年免費教育的引入，親共愛國學校由1970年開始，數目和規模都不斷收縮。1991年當直接資助計劃(Direct Subsidy Scheme)開始推行時，當時就只有5所親共愛國學校(培僑、香島、福建、漢華和旺角勞工子弟學校)、5所國際學校，以及恆生商學院提交申請。最後，在此一期的直接資助計劃，恆生商學院及另外一所國際學校並未獲教育署批准加入。³⁵

港英政府的及時資助令親共愛國學校得以重新定位，這些學校決定發揮其最大社會職能。為了擴大其影響力，聯繫社區，這些學校不得不自我調整來適應新的社會政治前景，放棄共產主義式教育，以市場為發展依歸。例如他們重組了5間工人夜校，在1979年集中資源於一間，並將工人夜校改名為香港專業進修學校(HKCT)；又把焦點放在專業以及牟利的課程，為勞動人口提供國際認可的專業資格。其他親共愛國學

35 Ip Kin Yuen (1994) *Organisational Change: The Case of a 'Leftist School' in Joining the Direct Subsidy Scheme*. Hong Kong: Thesis (M.Ed.)—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校也開始像主流學校一樣，強調公開考試成績的重要性。

從其中一間親共愛國學校的校刊——培僑中學校刊，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變化：自1979年第10期開始，校刊開始報導學生的學業成績。1984年11月的校刊扉頁上，緊跟在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的賀辭後面的是學生的學業成績和獎項名單。隨後八十年代的校刊亦沿襲同樣的格式，學生學業成績佔了重要的位置和比重：一頁一頁的記錄、圖表和照片羅列了學生在公開考試中的出色表現。這樣的格式與之前充斥着愛國新聞、評論與文學的校刊展示出學校對學業成績的強調，也表明當時學校要擺脫其政治形象的策略。課外活動過去在這些親共愛國學校起着十分吃重的地位。由於公共考試的學業壓力，這些學校的學生已不能和以前一樣花費學習時間在課外活動上。事實上，親共愛國學校在體藝方面的表現從1980年代開始落後。

為了重建社會網絡，學校對外部社區採取了開放的態度。自1980年代，學校開始和其他社區服務機構及非政府機構合作，如(英國起源的)男童軍計劃、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機構)和香港紅十字會。為了加強和社區的政治活動，一個新的政黨「民主建港聯盟」(DAB)於1992年7月10日在香港成立，不少成員和參政者都是親共愛國學校的畢業生和成員。

從香港親共愛國學校在社會的建設中，可見國家權力與教育互動時的自主力量。學校、教師和學生是教育的重要組成部份，就算暫時的條件不利，他們亦可以形成一股反主流、反建制的力量，培育潛在的政治人才及勢力。

結語

在戰後至回歸前，香港親共愛國學校通過提供大眾化教育，在草根階層凝成一股社會力量，並從而培養親社會主義和中共政府的身份認同。為重新整理這段重要的教育歷史資料，有助分析國家與權力的發展，這篇文章主要描述親共愛國學校在香港重構一個非主流教育系統的過程，以及在回歸前對新形勢的反應。論述中學校將被視為一個社會建設的過程，以探討維繫於教育和轉變的政治關係策略改變，闡明政治和教育之間的互動。

愛國工會：香港工會聯合會

梁寶霖、梁寶龍

前言

作為一個全港會員人數最多(38萬)的「群眾組織」，也是香港教會以外最大的民間組織團體，香港工會聯合會(以下簡稱「工聯會」)在社會中發揮作用的本錢及空間應該很大。特別是回歸後，該組織的領導人分別出任行政會議成員，擔任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與及各級諮詢架構、半官方機構成員，如最低工資委員會等，可謂盛極一時。表面看來，勞工界在擔當政府「智囊」的地位與1997年前相比，提升了不少。諷刺的是，香港一般勞工的地位及工資福利，並無因此成正比地增長。「強資本、弱勞工」的情況在1997年後不單只仍然存在，甚至加劇，如貧富懸殊；而集體談判協議可算是絕無僅有。近十年來，實際工資曾一度沒有增長，樓價高企，租金狂升，物價、車費升幅等等¹。對老闆、當權者而言，這個情況沒甚不良影響，但對勞工則是最壞的。工會運動如何面對這個局面，值得同人深思。

本文從工聯會的歷史發展講起，從而分析其起伏原因及現象，探討在各種社會——政治因素下，其路線及所面對的各項挑戰。

1 香港社會保障學會(2012-2013)《社會保障論文集》，第1-4輯，香港：香港社會保障學會。

簡介

工聯會前稱「港九工會聯合會」，是最大的「左派²、愛國、建制派、親共」組織。2013年有186間屬會，63間贊助會，合共有249間工會，會員38萬1千餘人，佔全港工會入會人數48%，全港工會總數的24%。

表一 香港四大集團工會人數表³

	工聯會	工團	勞聯	職工盟
屬會數目				
2010年	180	33	70	79
2011年	183	32	72	80
2012年	184	28	74	80
會員總數				
2010年	368,740	24,519	41,587	122,605
2011年	380,009	24,232	42,062	126,265
2012年	396,110	24,082	44,052	129,223

資料顯示，工聯會在香港回歸前後以「愛國、團結、權益、福利、參與」為工作方針，維護勞工權益，推動改善民生，參與政治與社會事務，在建制內外為市民發聲。回歸後以「支持、合作、批評、監督」原則⁴，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2 本文使用的「左派」一詞是傳統用語，指親中共組織，並不是今天指的左翼激進組織。

3 勞工處職工會登記局(2000-2012)《香港職工會統計年報》，香港：勞工處。

4 香港工會聯合會網頁：<http://www.ftu.org.hk>。

政，以合作的態度來批評和監督政府，促進香港穩定繁榮。

工聯會甚為關注工人職業生活，與時並進地開辦職業培訓、業餘進修、醫療、康樂等多元化服務。有關服務機構包括：工人醫療所、工人俱樂部、地區服務處、工聯康齡長者服務社等。

工人俱樂部是工聯會下設的一個直屬文化康樂機構，為各屬會和贊助會會員提供服務及活動。工人俱樂部下設業餘進修中心、職業再訓練中心、就業輔導中心、工俱康樂組、文藝專組、工俱旅遊部及保健中心等。總部座落於土瓜灣馬頭涌道50號，在觀塘、深水埗、沙田、大埔、港島東及港島南、屯門、將軍澳等8個地區設立分部。文藝專組有：國聲(民族管弦樂)、群聲(合唱團)、新藝苗(流行歌曲)、南國粵劇團、工俱舞蹈團、工聯業餘管弦樂團(西樂)、工聯書法解碼學會、香港青年博藝坊、香港畫藝會、香港景觀設計學會、工聯會特區攝影學會、工聯韻翹舞蹈團、孜誠健身操養生學會、工俱長者英語CLUB及香港葫蘆絲巴烏民樂教演學會等15個。除了凝聚業餘文藝愛好者和藝術專業者，並積極參與社區及康文署舉辦的文藝活動，有助於推進業餘康樂活動，擴大宣傳工聯會，提高工聯會的社會聲譽⁵。

另外，工聯會將服務範圍擴大至國內，利用本身的脈絡在廣州、深圳、東莞、惠州及中山等五個城市開設內地諮詢服務中心，服務對象覆蓋所有香港人，為在內地定居、工作、旅遊或就學的香港人，提供免費法律諮詢及其他支援服務⁶。其中最有成效的是為在國內遺失回鄉證人士辦理報失手續。

5 工人俱樂部網頁：<http://www.hkftuwc.org/>。

6 同註4。

工聯會積極參與社會事務，促進政府照顧基層市民需要，建構和諧社會。發展地區事務方面，在全港18區設立地區服務處及聯絡處，除聯絡及服務會員外，更推廣至全港市民。

工聯會在香港政治架構內，至2013年底於行政會議佔有一席位，由鄭耀棠出任。在立法會佔有六席位，分別是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陳婉嫻、九龍東黃國健、港島王國興、新界西麥美娟、勞工界鄧家彪、勞工界郭偉強六人。在區議會佔有34席位。在勞工顧問委員會(簡稱「勞顧會」)佔有一席位，由吳秋北出任。在政府各有關委員會及法定諮詢架構，如中央政策組、最低工資委員會、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僱員再培訓局、生產力促進局、職業安全健康局、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建造業訓練及再培訓工作小組等都佔有席位⁷。

1997年後每年的行政長官授勳，工聯會必定有份兒，李澤添、楊光先後獲授大紫荊勳章。然而楊光因曾領導「六七暴動」，一度受到質疑，引起爭論。

在中央政府架構內，工聯會出任香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有鄭耀棠、吳秋北二人。出任全國政協委員有林淑儀、陳婉嫻二人。還有多人出任各省市的人大、政協等職位⁸。

創會至「六七暴動」時期

香港重光後，各工會紛紛復會，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黨幹部介入爭奪工會領導權。1946年時香港兒童失學問題嚴重，親

7 香港工會聯合會編(2011-2013)《工聯雙月刊》，香港：香港工會聯合會；同註4：香港政府一站通：<http://www.gov.hk>。

8 同註7，香港工會聯合會(2011-2013)；同註4：中國人大網：<http://www.npc.gov.cn/>；中國政協網：<http://www.cppcc.gov.cn/>。

共工會組織成立「港九勞工教育促進會」，開辦勞工子弟學校。在「港九勞工教育促進會」的基礎上，工聯會於1948年4月17日成立，屬會31間，當時名稱是「港九工會聯合會」，推舉「香港電車公司華員職工存愛會」（今「香港電車公司職工會」，以下簡稱「電車工會」）代表朱敬文為理事長，海員工會代表張東荃、香港電話公司港九華員協進會（今「電訊盈科職工總會」，以下簡稱「電話工會」）代表張振南等為副理事長。宗旨為：「1. 聯繫各工會，促進彼此間之互助及團結；2. 指導發展工人文化教育，提高工人技術水準；3. 推廣工人福利事業，改善工人生活；4. 爭取與保障各會員工會之合法利益。」制訂工作原則：尊重與保證各會員工會組織之完全獨立性，人事組織自主，經濟自理；會員工會有參加工聯會舉辦任何工作與活動的自由，不加強制，具體工作採取民主原則共同協商⁹。

同年9月9日，親國民黨的工會聯合組織了「港九工團聯合總會」，簡稱「工團」，屬會共有102個¹⁰。從此，香港工會分為兩大政治陣營，直至九十年代工團日走下坡，獨立工會冒起，局面開始改變，形成工聯會、工團、香港職工會聯盟（簡稱「職工盟」）、港九勞工社團聯會（簡稱「勞聯」）等四大陣營。工聯會自成立以來，在香港工運中一直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9 周奕(2009)《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出版社；香港工會聯合會編(1998)《金禧誌慶(1948-1998)》，香港：香港工會聯合會；香港工會聯合會編(2003)《工聯會經典圖片集》，香港：香港工會聯合會；《文匯報》，1948年。

10 周奕(2013)《香港工運史簡篇》，香港：利訊出版社，頁86-97；梁寶龍(1986)〈港九工團聯合總會簡介〉，載於陳明鍊主編，《香港與中國工運縱橫》，香港：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頁132-137；《工商日報》，1948年。

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親共工會紛紛懸掛五星旗表態支持。國共兩黨爭奪工會領導權進一步加劇，甚至出現流血事件，在各自心中埋下長久敵視態度；隨着海峽兩岸關係緩和，2000年後矛盾日見淡化，亦反映親台工會勢力在香港大大萎縮。

1948年的士工潮由工聯會主力工會「摩托車總工會」(簡稱「摩總」，今「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領導，工聯會發動屬會支持，「香港僱主聯會」介入，罷工歷時124天。同年，香港多間紗廠先後罷工，工聯會發動屬會支持，罷工蔓延至絲織廠，資方借助警力鎮壓，拘人判刑，港英祭出《違法罷工與罷僱條例》。時值中共建立政權。港英出動政治部拘人，遞解絲織工會的樓頌平出境¹¹。

工聯會下屬的公共事業五大工會：電車、電燈、中電、電話、煤氣等組成改善待遇委員會，分別準備向僱主提出要求。1949年12月，電車工會首先提出要求特別津貼，該會為免觸犯《違法罷工與罷僱條例》，發動售票員不售票，電車公司解僱全部售票員，工會派糾察隊包圍電車廠，港英派防暴隊到場戒備，工聯會號召各業工人到場支持，親共文藝團體也紛紛到場表演支持。1950年1月30日，警方出動800名警員驅散群眾，施放催淚彈，雙方發生打鬥，造成群眾32人受傷，警員13人受傷，港英封閉電車工會，拘捕三名工會負責人，一名青年團體負責人亦遭拘捕，翌日將四人遞解出境，稍後再遞解七人出境¹²。工潮期間，中華全國總工會(以下簡稱「全總」)電匯人民幣5,000萬元(這裏的5,000萬是舊人民幣

11 同註 10，周奕(2013)，頁 98-110。

12 同註 10，周奕(2013)，頁 118-122。

幣值，據文件指相等於1955年3月1日發行的新人民幣幣值5,000元)支援，毛澤東、劉少奇曾為此事發指示給香港中共組織¹³。

1949年底，「牛奶公司職工互助社」(今「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以下簡稱「牛奶工會」)繼電車工會後，向資方提出要求特別津貼。踏入1950年，電車工潮正陷入僵局，羅素街血案尚未發生。1月11日，牛奶公司在勞工處安排下舉行特津問題勞資大會，在銅鑼灣記利佐治街牛奶公司冰廠門前馬路舉行。牛奶工潮在第三者仲裁下，資方同意每人每月增加特別津貼30元。仲裁之後，其他公共事業工會紛紛據此向資方索取特別津貼，亦成功爭取¹⁴。

1950年底，愛國團體認為港英將會進一步打擊，決定全面撤退，工聯會將已露面領導人撤回國內，如理事長張振南、摩總秘書鄧和等70餘人¹⁵。

1951年11月21日，九龍城東頭村木屋區大火，工聯會屬會自發進行救災工作，成立「東頭村災民代表團」。1952年1月，港英出動逾千警員包圍東頭村災區，搬走救災物資，到「港九紡織染業職工總會」(以下簡稱「紡織染」)九龍城支會拘捕支會負責人二人，連同災民總代表李文興一同遞解出

13 劉少奇(1998)《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頁224-227；江關生(2012)《中共在香港—下(1949-2012)》，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頁51-57。

14 周文港主編(2011)《工在家國——香港洋務工會九十年》，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同註10、周奕(2013)，頁117-122；牛奶工會四十年大事記徵求意見稿(1981)〈光輝四十年〉，載於《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果餅業工會聯合慶祝成立四十週年會慶特刊》，香港。

15 同註10、周奕(2013)，頁123-134；《華僑日報》，1948-1950年；《華僑日報》，1950年；《工商日報》，1950年；《文匯報》，1950年。

境，其後又遞解災民代表四人。2月，廣東民間團體組成東頭村慰問團準備訪問香港，並撥出捐款人民幣四億元(舊人民幣幣值)，請「香港華商總會」和工聯會安排賑災工作。3月1日，慰問團準備出發，工聯會各屬會動員萬餘人到尖沙咀火車站(今香港文化中心)接車。下午工聯會宣佈慰問團當天不能到達，群眾從不同路線和平散去，其中一批群眾途經佐敦道時發生一輛警車衝向人群，即時觸發騷動，群眾焚燒警車，毆打過路英兵。事後，有16批次、55名工聯會工作人員被港英遞解出境¹⁶。

一直以來，工聯會推行政教福利不遺餘力，工聯會的「工人業餘粵劇團」一度發展成半職業藝團。體育活動方面：工聯會於1951年舉辦團結杯乒乓球賽，孕育出世界冠軍容國團；1953年起每年舉辦小型足球賽，參賽球隊達100隊。各屬會都開展文教康樂工作，成立舞蹈組、歌詠隊、話劇團等，除了提供娛樂外更可宣傳意識形態。這些小組除在節日演出外，更到罷工現場演出，為工人打氣¹⁷。

工聯會創會成員因開辦勞工子弟學校而聚在一起，各屬會推動工人子弟教育不遺餘力，開辦「管教班」甚至學校，解決會員子女教育問題¹⁸。

五十年代韓戰爆發，工人失業情況嚴重，工聯會大力推行福利主義，各屬會大辦食堂，開展失業救濟。各屬會成立

16 同註10·周奕(2013)·頁124-131。

17 同註9·香港工會聯合會編(1998)；同註9·香港工會聯合會編(2003)；香港工會聯合會(2008)《光輝歲月薪火相傳》，香港：新華書店有限公司。

18 同註14·牛奶工會四十年大事記徵求意見稿(1981)；龍少爺《海員興辦的子弟學校》，載於香港工人的故事網頁：http://leungpolung.blogspot.hk/2013/10/blog-post_16.html。

互助社廉價出售生活必需品¹⁹。工聯會則成立「聯益公司」統籌供應，聯益公司後來企業化，成為日用品供應商。當時幾乎每間工會都有小賣部出售「國貨」，香港洋務工會在中區寫字樓共成立了16個服務站供應「國貨」²⁰。工聯會於1950年7月開辦「工人醫療所」，提供廉價優質中西醫療服務。截至2013年12月底已發展至六間西醫診所、六間牙科診所、10間中醫診所、三間X光化驗所及1間聽力測驗中心，構成完善的綜合性門診網絡，凡工聯會會員及持證家屬，或長者咭持有人等，均可獲減費優惠²¹。除福利服務外，各屬會亦按各自行業工人需要開辦技術培訓班²²。

1954年電車公司開除大批工人，包括電車工會主席陳耀才等，工聯會成立「促進談判解決電車糾紛委員會」，爭取社會各界支持。不少社團就事件發出公開聲明。工聯會屬會通過支援電車工人，動員大量人力進行宣傳、組織工作，過程使幹部得到鍛鍊，基層得到鞏固和藉機發展不少會員。家屬工作方面，成立一支70、80人的家訪工作隊，穩定家屬情緒，工作隊在後來的海軍船塢閉廠事件中發揮重大作用²³。五十年代工聯會的家訪工作令人印象深刻，獨立工會的香港消防處第一標準薪級員工會古聖光回憶工聯會的家訪工作，現仍大加讚賞²⁴。

19 同註9，香港工會聯合會編(1998)；同註九，香港工會聯合會編(2003)；同註17，香港工會聯合會(2008)。

20 同註14，周文港主編(2011)，頁193。

21 香港工會聯合會工人醫療所網頁：http://www.ftuclinics.org.hk/cc/about_us/background.html。

22 同註9，香港工會聯合會編(2003)；工聯會各屬會刊物、網頁。

23 同註10，周奕(2013)，頁145-1250。

24 古聖光口述，梁寶龍整理(2013)《古聖光口述錄音稿》。

1956年10月10日，李鄭屋邨因張貼中華民國國旗事件引致九龍區騷動，做成瑞士副領事重傷，副領事夫人死亡，港英出動英軍平亂，宣佈戒嚴。在荃灣，右派組織向左派工人進行武力攻擊，襲擊荃灣工人醫療所、紡織染、絲織工會等，打死八人，重傷63人，二人被強姦²⁵。

1957年英國宣佈關閉海軍船塢，部署解僱工人，海軍船塢產業華員職工會成立「海軍船塢工人保障職業生活委員會」，提出「全塢工人不分會籍、不分等級、加強團結」的口號。海塢共有10間工會。工人停工抗議爭取權益。工聯會成立「支援海軍船塢工友爭取合理解決閉廠除人事件委員會」，動員屬會聲援，以「保障生活」為重點，提出先安置後離廠。又發動數百家屬拖男帶女分批往訪勞工處，爭取社會支持，向港英施壓。最後在各方的安排下，大部份工人都重新就業²⁶。運動中工聯會各屬會文工團大派用場，進行意識形態教育。

1958年中共提出「大躍進」計劃，需要大量技工。一直以來工聯會都強調「愛國」，舉行成立大會時，主禮台懸掛當時主掌中國政權的「中華民國」國旗及孫中山遺像，到中共執政後即改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工聯會一直以來都響應中國的國策，大躍進時發動工人回國建設，部份屬會成立專門委員會主理，動員了近萬人回國工作。接着國內出

25 《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1956)，香港：政府印務局；同註10、周奕(2013)、頁151-155；同註13、江關生(2012)、頁92-96；蔡思行(2013)《香港史100件大事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頁69-75；紡織染工會刊物。

26 黃業衡(2011)《鐸咁往事》，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頁42-68；同註10、周奕(2013)、頁156-160。

現「三年自然災害」，1961年國內糧食需求供應緊張，大批饑民偷渡來港，回國工人紛紛申請回港，部份人指責工會欺騙，脫離工會²⁷。

「車床打磨職工會」動員了900餘人回國，佔該會會員總數四分之一以上，令到1962年時會員人數下跌至600餘人。「港九五金工業總工會」(今「香港五金電子科技業總工會」)會員人數由1958年的4,459人下跌至1962年的1,710人，會員流失了六成²⁸。牛奶工會發動了6批技工回國，部份舉家回國²⁹。海塢工會當時正面臨閉廠，發動失業工人700餘人回國³⁰。

1966年中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12月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左派運用國內文革式鬥爭方法，以《毛語錄》、張貼大字報、激烈的群眾行為，擊敗澳葡政府，澳葡政府公開認罪，加速香港滋生極左思想。這時，香港渣華郵船公司「士他馬力加號」(或譯「士他馬士加號」)輪船發生槍擊事件，外籍船長槍傷香港海員。工聯會發表公開聲明指責渣華郵船公司包庇船長、拒絕認錯，把調子提高為對中國人民尊嚴的侮辱，並跟隨國內文革鬥爭方式，在聲明中引用《毛語錄》。渣華郵船公司在毛澤東像和中國國旗下簽道歉書認錯，海員工會將事件宣揚為毛澤東思想的勝利³¹。

27 同註 10，周奕(2013)，頁 163-165。

28 同註 10，周奕(2013)，頁 164-165。

29 同註 14，牛奶工會四十年大事記徵求意見稿(1981)。

30 同註 26，黃業衡(2011)，第 69 頁。

31 同註 10，周奕(2013)，頁 177-182；余汝信(2012)《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張家偉(2000)《香港六七暴動內情》，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有限公司；同註 9，香港工會聯合會編(2003)；海員工會會刊。

1967年初，中央、上海的士公司發生結業工潮，「摩總」為工人爭取應有權益。「摩總」沒有用文革式鬥爭方法處理工潮，通過低調的談判與資方解決問題。同年，荃灣南豐紗廠發生工潮，紡織染工會則採取文革式鬥爭方法抗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青洲英坭廠發生澳洲籍工程師毆打工人，青洲英坭工會把事件上升為保衛民族尊嚴³²。

踏入4月，香港人造花廠解僱工人，「港九樹膠塑膠業總工會」（簡稱「膠業工會」）以文革式方法與資方談判。5月6日，香港人造花廠新蒲崗分廠工人阻止廠方出貨，警員到場鎮壓，發生流血衝突，18人被捕。5月11日，新蒲崗分廠再發生衝突，警員開槍鎮壓，引致騷動擴大，港英宣佈九龍局部宵禁。工聯會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下屬工會紛紛成立鬥爭委員會。5月15日，中國外交部就新蒲崗事件發表聲明。5月16日，「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各界鬥委」）成立，工聯會理事長楊光為主任委員，運用文革式鬥爭方法進行運動，引致更多流血事件³³。

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提出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發動各階層愛國同胞，把鬥爭矛頭指向港英。即是這場運動由工聯會公開領導，以「仇視、蔑視和鄙視」向港英反擊。從字面上看仇視、蔑視和鄙視都不是實質行動，反擊亦是一種被動行為。工聯會的行動與上述指示相反，採取實質行動，發動全港罷工，號召

32 同註 10，周奕(2013)，頁 177-182。

33 同註 10，周奕(2013)，頁 188-191；同註 31，余汝信(2012)；同註 31，張家偉(2000)。

群眾上街示威。警方出動搜查工聯會多間屬會，拘捕工會人士。所謂「反英抗暴」，我們只見標語式的「反英」口號，沒有任何實質內容，行動多是針對港英的暴力而作出反應為主。「全總」先後兩次匯出共2,000萬港幣給各界鬥委³⁴。

7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放手發動群眾，進一步壯大反英抗暴隊伍》，提出「殺人要償命，血債要用血來償」。「各界鬥委」在全港各地隨意擺放真假爆炸品9,000多枚，造成12名市民死亡。港英全面出擊，進攻愛國機構，打死多人，拘捕數百人³⁵。雙方的敵對行動造成更多嚴重流血衝突，一連串行動中總共有51人死亡。罷工拖延了半年，工聯會元氣大傷，雙方停止行動，暗中進行和解。港英停止搜查愛國工會，工聯會和各屬會開始恢復正常會務，安排罷工者「復工轉廠改行」，結束罷工。「六七暴動」日後成為工聯會對手攻擊的利箭，工聯會亦只能招架無法還擊。

七、八十年代重建期

1967年後，港英開始大力增加康樂福利爭取民心。愛國工會被孤立，市民聞左色變。政府及資方備有「黑名單」，不再僱用罷工工人。港英推出「勞資協商會」，漸漸成熟發揮作用，因而影響工聯會談判地位。工聯會曾經申請租用荃灣大會堂舉辦文娛活動，但不獲有關當局批准。此時，獨立工運冒起，國際工會組織有意在港推動沒有政治背景的非親共獨立工

34 同註 10，周奕(2013)；同註 31，余汝信(2012)；同註 31，張家偉(2000)。

35 同註 10，周奕(2013)，頁 198；同註 31，余汝信(2012)；同註 31，張家偉(2000)。

會，如有世界勞工聯合會(World Confederation of Labour 簡稱WCL)背景的孟家華神父組織成立的「勞資關係協進會」³⁶。

工聯會部份會員對中共處理「六七」善後工作反感，認為自己已經付出代價，得不到應有的評價，反遭指責，覺得被遺棄，對中共失去信心甚至離隊³⁷。

1971年尼克遜訪華，中國國際地位提升，工聯會會員人數開始增加。1976年中國政局轉變，四人幫倒台，工聯會緊跟國內政治氣候，由左傾漸漸轉向務實政策。年青領導人「香港洋務工會」的鄭耀棠、「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的譚耀宗、「五金工會」的林淑儀等進入領導核心，出任副理事長，推動變革。於1978年舉辦全港性的工人歌唱比賽。1979年譚耀宗脫產出任工人俱樂部主任，大力發展康樂活動。1981年開辦「業餘進修中心」，提供職業進修課程和工餘文娛活動³⁸，藉機招收會員。

工聯會屬下若干間產業工會，因會員參加罷工不能復職，依例不能在工會擔任職務，故令工會負責人數量和質量下降，內部重組感到困難。為打破接班困局，「香港郵務職工會」遂將一批年青人提升為負責人，繼而晉身理事會，開拓了新局面³⁹。

工聯會於1982年派譚耀宗到澳洲進修成人教育，譚耀宗回

36 梁寶龍(1986)《為工人喉舌之孟家華神父》，載於陳明錄主編，《香港與中國工運縱橫》，香港：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頁232-236。

37 同註31，張家偉(2000)；張家偉(2012)《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周奕(2009)《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訊出版社，第4版。

38 同註9，香港工會聯合會編(1998)；同註9，香港工會聯合會編(2003)；同註17，香港工會聯合會(2008)。

39 鄧福棋口述，梁寶龍撰稿《負責任的工會領袖鄧福棋》，未刊稿。

港後舉辦了「工業安全與健康知識展覽」⁴⁰，當時各業工會都大力宣傳職安活動，推動政府為職安立法，此舉對提升勞工認識職業安全大有裨益，工傷事故大為下降。自此，職業安全成為勞工處的一項重要工作。

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工聯會採取「走出去」策略，派人參加工大、香港大學校外課程，學習社工技巧，僱用社工做議員助理，進行社會調查研究等，改變形象。工聯會僱用的職員也不再是「根正苗紅」的人，反而是大專學生。

與此同時，工聯會也與獨立工會及勞工團體合作。屬會洋務工會、五金工會、港九水泥混凝土工程職業工會⁴¹(簡稱「水泥工會」)等參加「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導的職安運動，後來演變為「港九勞工團體聯席會議」，水泥工會書記章麟是最積極參與者。牛奶工會於1983年發動工友參加「港九各界監管公共事業聯合會」在維園舉行的「遏止加風、保障民生」集會，在會訊上加以宣傳和發動⁴²。

處理勞資糾紛方面，工聯會這個時期相當低調，擔當「軍師」角色，並不事事出頭，又不與其他勞工團體爭奪領導地位。許家屯在《回憶錄》中曾表示，其他勞工團體的鋒頭蓋過了工聯會⁴³。

工聯會在各方面改革下慢慢收復失地，並且隨着工人的收

40 梁寶龍(1986)《新一代工人領袖譚耀宗》，載於陳明鍊主編，《香港與中國工運縱橫》，香港：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第244-246頁。

41 該會當時尚未加入工聯會。

42 同註14，牛奶工會四十年大事記徵求意見稿(1981)。

43 許家屯(1993)《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下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入逐步增加而結束「白恤衫，藍斜褲」時代，開拓了新局面。

參政

踏入八十年代，香港前途問題浮現，中國宣佈收回香港，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方針。港英開放政制，新一代論政團體「太平山學會」、「匯點」冒起。工聯會改變不參與建制的策略，秘書長梁漢開、香港百貨及商業僱員總會陳婉嫻等認為不應再採取杯葛態度，要加入港英架構內，參與政策討論，推動改革，才能更好地為勞工階層服務⁴⁴。工聯會於1985年區議會選舉派出10人參選作試探，結果五人勝出，如海港運輸工會聯合會秘書長葉國忠出任油麻地區議員。工聯會同時又發動會員登記成為選民⁴⁵。

工聯會參加「勞工顧問委員會」（簡稱「勞顧會」）選舉。勞僱會勞工代表一直以來都是由工團包辦，1981年工聯會與獨立工會、公務員工會聯手搶奪工團席位，協商分配席位，工聯會派出「港九石印業職業工會」潘子靖出選，結果以114票最高票當選，「政府土地工程測量員協會」黃偉雄以109票尾隨第二位，「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司徒華以108票屈居第三席，工團代表全部敗北，港英則安排委任工團的「香港棉系產業職工總會」彭震海、「港九集賢起落貨工會」李承礎為勞工代表，第六位勞工代表是委任「大東電報局(非海外

44 阮紀宏(2011)《建港心路——與民建聯的緣與份》，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45 梁寶龍(1986)《香港工會聯合會簡介》，載於陳明鈺主編，《香港與中國工運縱橫》，香港：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頁127-131；同註9，香港工會聯合會編(2003)。

派來)職員會」陳鑑泉出任。上屆三位勞工代表都是60餘票當選，工聯會參選把當選票數提高了近一倍⁴⁶。工聯會藉勞顧會與其他不同背景工會交朋友，同時亦與資方代表進行溝通。過往，工聯會認為參加建制以及與資方協商都是「喪失階級立場」的。1995年勞顧會代表組團訪問台灣，工聯會的勞顧會成員譚耀宗、梁富華、章麟等隨團到台，邁出統戰更大的一步。

1984年譚耀宗競逐立法局勞工界議席，和工團彭震海自動當選，而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副主任葉國忠參加選舉團間接選舉競逐南九龍席位，0票落敗。

1991年立法局選舉，陳婉嫻代表工聯會參加直選，競逐在九龍中議席，在七名選候選人中得票第三，以4萬4千多票敗於劉千石的6萬8千多票，和林鉅成的5萬5千多票。譚耀宗則在勞工界繼續自動當選。

踏入九十年代香港出現政黨，1992年「民主建港聯盟」(2005年起改名「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簡稱「民建聯」)成立，稍後「民主黨」、「自由黨」亦告成立。民建聯是由各界愛國人士組成，譚耀宗是最早的籌組成員之一，民建聯內不少成員是工聯會會員。培僑中學校長曾鈺成出任主席，譚耀宗任副主席，陳婉嫻、「香港航空業總工會」簡志豪任常委，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王國興、葉國忠、「港九花卉職工會」理事長梁煜林等任中央委員。從此譚耀宗淡出工聯會，專責民建聯工作。1994年的區議會選舉，民建聯派出83人參選，助選團舉目皆是工聯會的人⁴⁷。

46 龍少爺《歷屆勞工顧問委員會勞方代表名單(1947-2012)》、載於香港工人的故事網頁：<http://leungpolung.blogspot.hk/2013/09/1947-2012.html>。

47 阮紀宏(2012)《民建聯 20 年史》，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1995年，陳婉嫻代表民建聯參加直選競逐九龍東北席位，成功當選；譚耀宗代表民建聯參加直選競逐九龍東南席位落敗。工聯會派出六人參加新九組選舉，梁富華競逐製造界席位，陳榮燦競逐酒店及飲食界，潘仕泉競逐漁農、礦產、能源及建造界，陳國強競逐紡織及製衣界，王國興競逐批發及零售界，卓少爾競逐運輸及通訊界；當中只有陳榮燦勝出。另鄭耀棠競逐勞工界席位，擊敗對手當選。

1998年，陳婉嫻以民建聯身份參加直選競逐九龍東席位，取得1席位，譚耀宗亦以民建聯身份參加直選競逐新界西席位，取得1席位，陳國強、陳榮燦則在勞工界擊敗對手連任。

隨着政治環境改變，各政黨注意力都放在中產階層，民建聯不斷壯大，中產會員增加，工聯會與民建聯的政策立場與目標取向日漸拉開。陳婉嫻認為民建聯不再單單代表基層，而她自己卻是一心一意為基層，為勞工打拼，與民建聯中央出現分歧。在1995年立法局選舉中，陳婉嫻反對民建聯政綱損害勞工利益的內容，遭民建聯地區人士批評，陳婉嫻堅持立場不變。陳婉嫻甚至多次在立法局投票中，要求豁免跟隨民建聯的統一立場，獨立投票，為基層表態。從此陳婉嫻、王國興等淡出民建聯⁴⁸，陳婉嫻更於2011年退出民建聯⁴⁹。

2004年立法會選舉，工聯會與民建聯在同一區分開名單競逐議席，九龍東席位由陳婉嫻、林文輝、鄧家彪等組成名單代表工聯會，陳鑑林另組名單代表民建聯，結果配票成功，兩者共得票率為40%，各取五萬多票，陳鑑林多陳婉嫻3,000票。陳鑑林名單內有「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蔡鎮華。譚耀

48 同註 47、阮紀宏(2012)：同註 44、阮紀宏(2011)。

49 《東方日報》，2011年。

宗代表民建聯競逐新界西議席，成功當選。

在立法會勞工界選舉中工聯會內部發生糾紛，陳國強已連任兩屆，要求第三次連任，工聯會不支持他爭取連任，派法律顧問鄺志堅、王國興競逐勞工界席位，成功當選。而陳國強獨立參選，甚至曾找職工盟支持，結果落敗。事後工聯會汲取教訓，硬性規定由工聯會支持競逐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只能當一屆，下屆要落區參加直選，迎接將要施行的全面普選⁵⁰。直到現在王國興、葉偉明、潘佩璆等都遵從這個守則，或則參加直選取得連任，或則退任讓賢。

2008年立法會選舉，工聯會更新換代，以舊人支援新人，在九龍東派出工聯會理事長黃國健領陳婉嫻等組成名單參選，黃國健排第一位，陳婉嫻排在第2位，獲50,320票，得票率21.30%，結果陳婉嫻成功將黃國健推上立法會，自己無法連任。新界西派出王國興、麥美娟等組成名單參選，獲35,991票王國興當選，得票率9.04%。勞工界議席派出潘佩璆醫生、民航工會葉偉明競逐，職工盟和工團兩者加起來的票只有100票左右，不足以影響選情，結果在無對手下工聯會兩人都自動當選，第3席位由勞聯李鳳英自動當選。

回歸後，勞工問題不斷浮現，工聯會一些同工認為在比例代表制下，工聯會應轉變為一個參政組織⁵¹。直至2009年，工聯會才成立政務委員會，2011及2012年工聯會大舉出擊，但尚未算是一個參政組織。如果工聯會日後轉變為一個參政組織，原來的工會組織性質如何繼續下去，有待新一代領導抉擇。

2011年區議會選舉，工聯會打正旗號全力出擊，派出48

50 同註9，周奕(2009)，第553頁。

51 同註44，阮紀宏(2011)。

名代表參選，共取得29席位，當中五人自動當選，當選率為60.41%。另外有八名民建聯參選人使用「民建聯/工聯會」名義參選，但不在工聯會公佈的參選名單內，取得7席位。陳婉嫻復出首戰黃大仙區議會，為立法會新增的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席位鋪路，以3,456票當選，成為該屆票后⁵²。

2012年立法會選舉，陳婉嫻再代表工聯會率梁子穎、黃潤昌組成名單，競逐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席位，結果以246,196票當選，重返立法會。直選方面，港島席位由王國興、潘佩璆等競逐，王國興當選。九龍東席位由黃國健、簡銘東等組名單競逐，黃國健當選。新界西席位由麥美娟、陸頌雄等組名單競逐，麥美娟當選。新界東席位由葉偉明、黃宏滔等組名單競逐，葉偉明落選無法連任。勞工界由郭偉強、鄧家彪自動當選。2012年立法會選舉結果，工聯會可算成功把一批新人推上前線。

回歸前後擴展期

定位和作用

工聯會現今定位是：「促進香港工運，維護社會穩定，支持一國兩制，開展愛國主義教育」。自進入建制後，工聯會於「五一」、「十一」邀請各工會組團上京，進行統戰工作，冀能達到以上工作目標⁵³。

1984年中英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工聯會於是年第24屆代表大會提出「關心香港前途」的任務，工作方針是

52 同註7，香港政府一站通；《東方日報》，2011年。

53 同註9，香港工會聯合會編(2003)。

「參與社會事務，爭取合理權益，擴大愛國團結，促進穩定繁榮」。在同年第38週年會慶上響應中國提出的「一國兩制」，香港「原有制度不變」方針，表態贊成資本主義制度，支持穩定繁榮下發展勞資關係，「實現中國和平統一」⁵⁴。

八十年代工聯會參與社會事務方面，在贊成中國統一前提下，與不同背景工會一起合作促請港英設立中央公積金、修訂長期服務金及改善薪俸稅等，向政府遞交聯署聲明⁵⁵。

1985年，中國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譚耀宗出任委員。工聯會推動市民認識《基本法》，製作《基本法與你》錄影帶，鼓勵會員參與社會事務，進行《基本法》問卷調查，而個別屬會如印務工會等成立《基本法》關注小組⁵⁶。

8月，基督教工業委員會與「公務員工會聯絡處」等28個勞工團體發起「勞工界基本法聯席會議」，強調港人參與起草《基本法》，爭取把退休保障、集體談判權列入《基本法》。共有近150個團體參加，包括印刷工會⁵⁷、洋務工會等，洋務工會且是執委之一⁵⁸。工聯會在「擴大愛國團結」前提下，與不同背景的勞工團體聯合一起為工人在《基本法》爭權益。但是，在協商「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名單上，工聯會屬會及友會不支

54 同註9，香港工會聯合會編(2003)；同註7，香港工會聯合會編(2011-2013)。

55 同註9九，香港工會聯合會編(2003)。

56 印務工會(1986)《峰迴路轉五十年》，載於《香港印刷業工會特刊》，香港：香港印刷業工會；同註9，香港工會聯合會編(2003)。

57 同註56，印務工會(1986)。

58 潘文瀚、黃靜文、陳曙峰、陳敬慈、蒙兆達(2012)《團結不折彎：——香港獨立工運尋索40年》，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頁116-118；同註14，周文港主編(2011)。

持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任劉千石出任諮委，因為有些屬會不忿勞工團體在工潮中排斥工聯會。工聯會手握80票，劉千石只握60票。劉千石在無把握當選的情況下退出選舉和聯席會議，4間獨立工會表態退出，指責工聯會排斥異己⁵⁹。

其後，在政制爭論中，工聯會反對「八八直選」，表示「寧要飯票，不要選票」，反對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把政改精力集中在民生問題⁶⁰。

工聯會於1988年舉辦「香港工運路向」大型研討會。於1993年舉辦「後過渡期的勞資關係與工會角色」研討會。於1998年舉辦「香港工運前瞻」大型研討會。出席會議除工會領袖外，還有學者、商界代表等，共同探討回歸後香港工運發展路向。

2007年8月香港爆發紫鐵工人罷工，歷時36日，爭取加薪、八小時工作，及回復10年前的薪金水平等。紫鐵工資由一年一度的資方代表香港建築紫鐵商會與勞方代表「香港建造業紫鐵職工會」（以下簡稱「紫鐵工會」）商定。可是，紫鐵工人認為薪酬水平不能反映市場供求，並且每況愈下，懷疑紫鐵工會討價能力不濟，及感到紫鐵工會可能出賣工人利益，轉而向職工盟求助。職工盟等插手工潮帶領工人上街抗爭，將工潮擴大為社會事件，各民間團體表態支持工人，紫鐵工會認為職工盟的行動破壞了大事。紫鐵工人則期望在職工盟的協助下，可以得到更理想的待遇。最後勞資達成共識，以日薪860港元以及8小時工作解決罷工⁶¹。工潮後社會上

59 同上、潘文瀚、黃靜文、陳曙峰、陳敬慈、蒙兆達(2012)。

60 黃偉國〈探針：曾蔭權已進入「泛左」角色〉，《蘋果日報》，2007年。

61 同註59、潘文瀚、黃靜文、陳曙峰、陳敬慈、蒙兆達(2012)，第262-264

有聲音認為：「要福利去工聯會，要權益找職工盟」。

福利主義一直以來都是工聯會的重點工作，地區辦事處藉舉辦俗稱「蛇齋餅糶」活動進行深入細緻的聯絡工作，這些工作在進行選舉工程時就能開花結果。從選舉期間工聯會能發動的人力可見一斑。

2013年3月28日葵青貨櫃碼頭爆發罷工，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外判工人開始工業行動，各民間團體到場表態支持工人。工潮中工聯會被指隱形毫無動作，黃國健認為：今次工運由職工盟發起，工聯會沒插手餘地。及後揭露HIT管理層的邱美光是工聯會「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理事，邱美光被罷工工人指摘和HIT狼狽為奸。罷工進入第13日，勞工及福利局安排勞資雙方開調解會，工聯會建議由港府牽頭，讓5間碼頭工會一起與資方談判。「碼頭職工會」指沒有參加罷工的工會欠缺代表性，不能出席談判。工聯會反指職工盟唯我獨尊。勞工及福利局堅持將工聯會及勞聯加入勞方代表，這是否代表政府看重工聯會的作用呢？最後勞資以9.8%的加薪幅度達成共識，工人於2013年5月6日結束長達40日的罷工⁶²。

近年工聯會領導核心陸續更新換代，鄭耀棠、陳婉嫻退出幕前，掛名出任名譽會長，林淑儀為會長，黃國健、梁富華為副會長，吳秋北為理事長，陳志光等為副理事長。2012年第35屆大會主題：「加強工會基礎建設，推動工運持續發展」，定位在固有的工作基礎上前進。

頁：同註 10，周奕(2013)，頁 225-230。

62 大眾碼經編排校對(2013)《撐到底！——碼頭工潮 40 晝夜》，香港：香港職工盟；同註 10，周奕(2013)，頁 265-269。

多元化工會

踏入八十年代工聯會大力發展會員，針對香港工業轉型，主動吸收白領工人入會，一年內會員增長了7,000餘人⁶³。

工聯會為了適應社會的變遷，重整屬下工會架構，解決行業式微、架構重疊等問題。早於七十年代開始，在同一行業的屬會開始成立聯合辦事處，如印刷業的「港九印務職工會」、「石印工會」、「中華書局產業職工會」、「商務印書館工會」等四間工會成立聯合辦事處，最後於1985年合併為「香港印刷業工會」⁶⁴。

工聯會具總工會的性質，但其內部是一間聯合會，工聯會不能(亦難以)直接指揮各屬會的內部事務，由於其屬會行業眾多，為便於聯繫與統率，現分為：汽車鐵路交通業、海員海港運輸業、航空業、政府機構、公共事業、文職及專業、旅遊飲食零售業、服務業、製造業、造船機械製造業、建造業等多組類別，各類別之內自行加強聯繫，又或者幾間工會聯合辦公以減輕行政開支。

服裝業於1986年成立「香港服裝業總工會」，統率「港九洋衣工會」、「港九車縫業職工會」、「港九車衣工會」、「香港皮草皮革業工會」、「上海縫業職工總會」、「服裝採購專業人員協會」、「港九西式女服工會」七間工會。2010年有會員約6,500人，會員擴大至從事服裝業務的員工，包括洋行、公司、製衣廠、手袋、手套、帽、領呔、配料等與衣着有關行業的從業員，如文職人員、各部門職工以

63 《文匯報》，1985年3月68日。

64 同註57，印務工會(1986)；同註9，香港工會聯合會編(2003)。

及各製衣培訓機構、學院的導師、講師及員工等均可加入成為會員⁶⁵。

建造業總工會成立於1986年，是建造行業的集團工會，下轄歷史長短不一、工種不同的19間行業工會，全部集中辦公⁶⁶。

個人服務、食品服務、批發零售、公眾及企業服務等28間工會合組為「服務業總工會」，除六間有條件自行運作之外，餘下者集中辦公⁶⁷。

公務員方面，於1986年成立「政府人員協會」統率所有公務員工會，協會成立之時只有六間工會，包括「政府、軍部、醫院華員職工會」（簡稱「政軍醫」），「香港政府水務局華人職工會」、「香港郵務職工會」、「海事署華員職工會」、「醫務衛生署職工會」及「政府看更員工會」等，現有屬會及盟會共60多間，會員共有四萬餘人，是香港五大公務員團體之一。回歸前一年，不少公務員加入政府人員協會，會方與工聯會協助會員自發組織了多間工會，發展了回歸前因政治環境而未能成立的紀律部門工會，例如海關、入境、懲教等，進一步發展了專業職級工會，如醫生、護士等⁶⁸。

工聯會除了將屬會合併外，還按需要將擴大了的行業從原來的工會分拆出來，可以更能照顧會員利益，提高服務質量。如洋務工會成立初期，只要僱主是外籍人士都可加入成

65 香港服裝業總工會刊物。

66 建造業總工會刊物。

67 服務業總工會刊物。

68 政府人員協會(2011)《政府人員協會二十五週年會慶特刊(1986-2011)》，香港：政府人員協會。

為會員，會員職業廣泛包羅萬有，既有洋行職員，又有外籍人士家中的傭工和園丁，酒店廚師等，及後更有電梯維修技工。現確定凡從事酒店、酒樓、餐廳、舞廳、酒吧、會所、金融、銀行、保險、企業、寫字樓等員工都可加入。於1986年分拆出「香港電梯業總工會」，2011年有會員809人。於1993年分拆出「酒店及餐飲從業員協會」，2011年有會員5,559人。洋務工會於2011年有會員25,616人⁶⁹。

分拆後工聯會屬會數目增加，引伸的政治影響力，就是成為勞僱會和立法會勞工界選舉擁有最多鐵票的集團，可穩得一席位，進而支持友會。再加上很多工會是徒具虛名，它們沒有派員出選功能組別選舉，所以立法會勞工界席位都是自動當選居多。

中港矛盾下定位

從中共的立場來說，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中共當然有權在香港活動，但香港法例不容許香港以外的政治組織在香港活動。中共於1923年在香港成立共青團香港支部，年底成立香港中共小組，稍後共青團員轉為黨員，黨員人數增加，約於1925年正式成立黨支部⁷⁰。這些組織都是非法團體，參與活動者同是犯法的。

69 同註3；同註14，周文港主編(2011)。

70 梁復燃(1980)《廣東黨組織成立一些情況的回憶》，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北京：人民出版社；廣東省檔案館、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公室編(1983)《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21-1926)》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龍少爺：《中共在香港第一個團組織》，載於香港工人的故事網頁：<http://lcungpolung.blogspot.hk/>。

中共在黨章中將其自身表述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領導工人運動是其必然的工作。據中共已公開的資料，中共在香港成立黨支部後即部署打進海員工會。海員工會內中共黨員多如繁星，歷任負責人如蘇兆徵、林偉民、陳郁、丘金、曾生、鄧發、林鏘雲、劉達潮等都是，同時亦是中共重要人物，蘇兆徵更曾位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抗日戰爭前，海員工會、印刷工會、洋務工會等都設有中共支部。抗日戰爭時，工聯會創會領導人曾參加中共領導的東江縱隊，或潛伏在香港接受中共領導下從事情報工作。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們都先後回港重組工會，繼而組織工聯會，如張東荃、陳文漢、印刷工會的潘江偉、海員工會的吳渭池、「摩總」的楊績等。國共內戰時，部份中共黨員不能在國內露面，南下香港躲在工聯會內工作，如勞工子弟學校校長鄒劍卿⁷¹。工聯會成立後，劉少奇曾致電指示1949年電車工潮，要求行動要克制，及後出現流血事件，工聯會都沒有將事件擴大，符合劉少奇的指示精神。從以上資料來看，工聯會與中共是有緊密關係的，工聯會前理事長陳文漢、張振南、前副理事長張東荃都是中共黨員。從中共已公開的資料來看，有關1949年香港的文件中，有多篇涉香港工運，可見中共與工聯會是有直接/間接的連繫。

工聯會成立於1948年，而「全總」早於1925年已成立。歷史資料反映兩者關係十分緊密，海員工會的林偉民是「全總」第一屆委員長，第二屆委員長是海員工會的蘇兆徵，而

71 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1983)《廣東革命歷史文件集》，第1-70卷；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1-100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龍少爺《東江縱隊與香港工人》、《旺角勞工子弟學校校長——鄒劍卿》，載於香港工人的故事網頁：<http://leungpolung.blogspot.hk/>。

電車工會的何耀全是第一屆執委。部份工聯會屬會當年是「全總」屬會，如海員工會、電車工會、洋務工會等。省港大罷工時，香港工會雲集廣州，「全總」指示香港工會成立「香港總工會」，海員工會、電車工會、洋務工會、郵務工會等都加入為屬會⁷²。1949年電車工潮、反英抗暴，中共以「全總」名義匯款給工聯會支持鬥爭。

回歸前夕，英國於1992年改派彭定康接任港督職位，香港左派認為彭定康以民主作幌子改變香港政制，大幅度變動最後一屆立法局、市政局、區議會等選舉，當中在立法局增加9個功能組別，擴大選民基礎最受爭議。中國指責彭定康違反英方在《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違反與《基本法》銜接的原則；違反中英達成的協議、諒解共識和兩國外長有關政制發展與《基本法》銜接的協定。

當年在彭定康的強大傳媒攻勢下，中國在招架時拋出臨時立法會。工聯會配合中國行動，全力催谷三級議會選舉，爭取議席，增加議會的愛國聲音⁷³。牛奶工會函覆民意審核專員辦事處，支持中方⁷⁴。

回歸前工聯會成立「香港工會聯合會慶祝香港回歸祖國活動委員會」，舉辦一連串慶祝回歸活動。工聯會全力安撫公務員，政府人員協會聯同其他公務員團體舉辦多項慶回歸

72 中華全國總工會主編(1995)《中華全國總工會七十年》，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室編(1984)《中國工會歷次代表大會文獻》第1-2卷，北京：工人出版社，再版；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室編《中國工會歷史文獻》第1-5卷，北京：工人出版社；香港工人的故事網頁：<http://leungpolung.blogspot.hk/>。

73 同註14，周文港主編(2011)，第99頁。

74 同註14，牛奶工會四十年大事記徵求意見稿(1981)。

活動及國慶活動⁷⁵。前公務員工會聯合會主席黃偉雄多次應邀出席工聯會的工運研討會，參加「十一」國慶觀光團、中英聯合聲明觀禮團等活動⁷⁶。現任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籌庭、職工盟屬會政府工程技術及測量人員協會的阮澄波、華員會的張慧儀等等不同背景公務工會負責人，都曾先後參加「五一」、「十一」訪京團⁷⁷。

回歸後，工聯會與特區政府關係良好。1998年行政長官董建華出席工聯會金禧會慶暨「五一」酒會，2003年財政司司長梁錦松訪問工聯會，同年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出席工聯會婦女委員會「三八」國際婦女節暨會慶聯歡會。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公眾期間，鄭耀棠牽頭成立「政制向前走大聯盟」，支持港府的《2012年政改方案》，一個月內收集到160萬個市民簽名。工聯會在有關勞工權益問題上仍繼續向政府爭取，起一定的監察角色。面對政府推出的政策引起勞資極大爭議時，為了緊隨中央堅守一國兩制、不能動搖資本主義制度原則下，最終多數會妥協退讓。因此被對手指責是「小罵大幫忙」、「保駕護航」。在八十年代的一次社會服務聯會有關勞工法的研討會上，某書記發言：「狗死狗蚤死，鑊肥，鑊耳肥。」來應付勞工團體的質詢，引起不少勞工團體的強烈反應⁷⁸。

2002年，特區政府頒佈《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諮詢文件》，根據諮詢文件，把分散於《香港法例》內多項相關的

75 同註 69。

76 《黃偉雄訪問錄音》，2012年。

77 《公務員工運史訪問錄音》，2012年。

78 梁寶霖筆記，1986年。

條文抽出集中，並重新寫為《國家安全法》；根據《基本法》規定，對叛國罪、分裂國家行為、煽動叛亂罪、顛覆國家罪及竊取國家機密等五項罪行作出明確及清晰的立法。這項條文的立法過程引起香港各界反彈，激發50萬人上街參與是年「七一」遊行，表態反對立法。部份議員轉向反對立法，政府在立法會已無法取得足夠支持票，只好暫時終止立法程序。工聯會當時表態支持立法，於2002年舉辦「《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講座」，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出席；又前往政府總部遞交支持立法意見書。

1997前，工聯會大力推動政制發展，1987年舉辦「代議政制綠皮書」研討會，1991年舉辦「未來香港政策發展與選舉法」研討會，1993年舉辦「平穩過渡面面觀」研討會等。

中共建政後召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簡稱人大)，第一屆香港全國人大代表有兩人，工聯會理事長張振南佔一席位，另一人是僑界代表徐四民。第二屆香港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沒有代表，只有兩名銀行家。直至1975年第四屆香港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成員有五人，分別是工聯會理事長楊光、海員工會理事長蘇友、花卉工會理事長張泉(花卉屬農會性質，沒有加入工聯會)、「摩總」主席郭添海、紡織染理事長黃燕芳等。到了1993年第八屆人大強調經濟發展，香港全國人大代表的工聯會成員減為三人，分別是工聯會會長李澤添、工聯會理事長鄭耀棠、「摩總」陸達兼等。1998年第九屆香港全國人大代表改由選舉產生，最高票的是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策組前顧問曾德成有347票，工聯會理事長鄭耀棠則有332票⁷⁹。

79 中國人大網：<http://www.npc.gov.cn/>；香港工會聯合會刊物。

工聯會雖然與中共關係密切，但在一些問題上偶有分歧，如反英抗暴、「六四」事件。1989年「六四」事件中譚耀宗、鄭耀棠等曾出席支聯會的遊行，當中共將「六四」事件定性為反革命後，譚耀宗、鄭耀棠等人當然立即從支聯會活動消失。現時工聯會刊物已不再提「六四」事件，亦沒有指稱事件是反革命行為。

在「六四」事件衝擊下，香港市民反共情緒高漲，普遍反映在選舉結果上。1991年適逢當時香港的三級議會(即區議會、市政局/區域市政局、立法局)在同一年內改選，打正工聯會旗號參選區議會的候選人不多，參選立法局直選的更只得一人。參選區議會的勝出比例不低，但是參加立法局直選的唯一一個卻敗北，可見當時親中被戲謔為票房毒藥的效應，出現在全港層面，而對工聯會的地區工作影響則不是致命。

國際聯繫

工人運動最重視國際團結，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提出：工人階級無祖國⁸⁰，但工聯會最弱的正是這一點。

從過去發展來看，工聯會其實有機會邁向新加坡總工會的模式⁸¹，即是一元代表工會的狀況。新加坡總工會驕傲不在於維權抗爭，而是廉價超市和擁有龐大的的士網絡，及與執政黨的關係，強調構建和諧勞資關係為主軸，也是要政府積極介入的統合主義⁸²(社團主義，Corporatism)，及接受政黨指導

80 《馬克思和恩格斯選集》第二卷，1972年第一版，第270頁。

81 工聯會曾於2001年組團訪問「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交流。

82 有關統合主義的中文書籍可參閱洪士程編(2006)《台灣勞工運動》，台北：

下的伙伴。在維穩和發展經濟的前提下，政府及黨處於領導地位，資本家及工人其次，這樣勞資便不能處於平等位置。在統合主義下，抗爭可被指為影響維穩，力爭基本權益會被指為拖發展經濟後腿。

在與國際工運接軌方面，工聯會一向並無加入任何國際組織，也不參與跨國活動。最多的是與「全總」及各省市的工會交流學習。從歷史上看，海員工會於二十年代參與「泛太平洋勞動會議」，領導太平洋亞澳地區工運，在國際政治環境的改變和港英的高壓政策下，三十年代已沒有參與亞太地區工運⁸³。現在海員工會能加入國際運輸勞聯(I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簡稱ITF)的商船工會協調會，對比歷史算是一個大突破。還有，工聯會於1987年組團訪問日本和新加坡；1988年組團訪問英國、德國、意大利等國，學習該地的勞工運動經驗，且隨中國代表團出席國際勞工大會，及有關活動，增長見識。1988年「日本勞働組合總評議會」代表團訪問工聯會⁸⁴。但是，工聯會對國際工運，民間組織的聯盟、行動等，如面對2005年反世貿(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英文簡稱WTO)在香港的活動卻止步。在國際事務上，工聯會堅守「一國」的大前提，與中國外交政策保持一致。

環顧現今歐美亞太地區的工會參與率及影響力均下降，而香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能保持20%以上職工會參與率已經不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但該書沒有談新加坡和國內的情況。

83 劉明達、唐玉良主編(1998)《中國工人運動史》第1-6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同註73，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室編。

84 同註9，香港工聯聯合會編(2003)。

錯。筆者認為在這個時間，香港應先發揮積極的國際團結精神，工運才會有出路。

表二 香港工會參與率

年份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09	2010	2011
參與率%	22.08	22.15	21.04	20.88	21.51	22.48	23.19	23.57

(2011年登記在案的僱員工會為788間，共有會員887人。)

(資料來源：周奕：《香港工運史簡篇》，利訊出版社，2013年，第279頁。)

總結

經過65年來的風風雨雨，工聯會終於取得一般市民的認同，而且支持度往往比其他政黨為高。港大民意調查顯示，工聯會近20年支持度都過半，支持度每年上升，認知率超過八成⁸⁵。當然，在很多事件上工聯會因要緊跟中國或建制派的立場，而有所失分。此外，在個別事件的立場也未符公眾期望，例如2013年8月曾有行政及立法兩會議員接受國泰航空公司款待到法國旅遊，鄭耀棠遭到傳媒追訪時卻堅持議員沒有犯錯，實與當時的民情相悖。

作為一個重要的愛國及維穩力量，工聯會能做到的都已經做到了，但對日益高漲的本土情意結，及勞工爭取權益的呼聲，工聯會往往要擔任救火隊的角色，當然並不討好。

如今，在意識形態告終及實務主義抬頭下，工聯會可算是收復了不少失地。但進一步來說，怎樣才可以將工人運動帶上另一層樓，如國際團結。不少無良港商在海外/國內違反勞

85 香港大學民意網：<http://a2012.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pgroupRating/FTU/datatables.html>

工權利、踐踏勞工組織，卻未見工聯會發過任何聲明予以譴責，或對外地工運加以援手。這種獨善其身的做法，大有檢討的必要。

工會的真正實力在社區、在廠房，工聯會以前在太古船塢、電車、牛奶等公司中擁有一些會員，及爭取到一定的談判地位。香港怎樣才可以達到勞資平等談判，而非勞工處所鼓勵的勞資協商，這不單是工聯會面對的問題，也是一個全港工運共同爭取的目標。

愛國足球滄桑

—— 愉園 60 年

趙永佳、呂大樂、梁懿剛

導言

愉園體育會於1950年註冊成立，前身是1948年組成的愉園小球隊(小球即是小型足球簡稱，多在較細小的球場比賽，通常每隊不會多於七人落場比賽)。當時由多名熱心足球的人士於跑馬地一帶組織活動，包括吳啟智、張炳發、張炳雄、謝觀揚和葉榮添等，而正式註冊成立體育會後，首屆會長由葉榮添擔任。自創會後，在多種體育項目上均陸續有所發展，包括足球(1950年成立)、乒乓球(1961年)、游泳(1973年)、田徑(1986年)、籃球、羽毛球，及健體興趣班如太極班(1971年)等。¹不過，60多年來，愉園這名字，最為香港大眾所熟悉的，毫無疑問是其足球隊。本篇探討愉園體育會在香港本土球圈及中港體育橋樑的角色，以足球隊接近60年的起跌經歷為重心，分析一個「左派」體育團體如何在轉變中的政治、社會環境裏經歷角色的轉變。²

1 愉園體育會(1996)《愉園體育會四十五週年會慶紀念特刊》，香港：愉園體育會，頁49。

2 本文以「愉園」之名討論者，皆是圍繞足球隊的發展情況而論，不涉及會內其他運動項目。

足球隊發展簡歷

足球隊首次於1957年參加香港足球總會主辦之丙組足球聯賽(當時是最低組別的正式聯賽)，第一個球季完結即能以丙組冠軍成績升上乙組；再經一個球季後，又以乙組冠軍資格升到頂級聯賽組別作賽，實現時稱「三年計劃」的願望(即在第三球季便能在甲組比賽)。自1959-60年度球季升上甲組作賽以來，愉園足球隊從未由於在聯賽中因為積分過低而需要降班。此良好紀錄一直維持至2010年球季為止：2009-10年度甲組球季完結後，愉園首次因比賽成績欠佳而需要降班。

當然，對香港球壇有所認識的讀者都會知道，愉園足球隊曾經於1968-69年度球季從頭開始在丙組作賽，並在當年即時成功取得升班資格，於1969-70年度球季晉升到乙組作賽，繼而在1970-71年度球季重返甲組。然而當年需要從頭做起，並非因為聯賽成績不濟而降班，而是基於政治因素所致；關於這一點，容後再作詳細討論。愉園足球隊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曾不止一次牽涉於政治事件之中。它作為一支「左派」球隊，有其親北京的背景。當年在冷戰國際政治的環境裏，它的存在與意義，並不止於足球運動。我們對其瞭解，必不可忽略政治的部份。在政治與意識形態的保護下，愉園隊茁壯成長。但後來外在的生態環境有變，它要重新適應和尋找生存空間。當年朝氣蓬勃的跟各支強隊爭霸，到2010年球季因成績欠佳而降班，中間幾許風雨，正好給我們一個機會，回顧「左派」球隊愉園的發展歷程。以下的討論將由愉園的獨特政治背景開始，再而分析環境的轉變，從中瞭解它的興衰起落。

自創會至今，歷年在甲組足球聯賽參與比賽，愉園隊合共贏得6次聯賽冠軍：第一次於1964-65年度球季取得，第二次則要等待24年之久，於1988-89年度球季才再次成功奪得甲組聯賽標。第3次冠軍相距時間縮短了，但中間亦相隔10年，在1998-99年度球季奪標。自第3次冠軍後，愉園隊的聯賽成績開始踏入最輝煌時期，2000-06年6季內合共取得3次冠軍及3次亞軍，差不多都是冠亞軍交替而來。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最近一次取得冠軍已是2005-06年度球季的事情，那也就是說在過去接近10年裏，愉園不曾再度摘冠。1959年首次升上甲組作賽的球隊陣容，以及一些關鍵球季，例如各次奪得甲組聯賽冠軍的球員名單詳見附錄。

衡量一支球隊成功與否，聯賽冠軍次數不是唯一指標，但也可算是相當重要的指標，因為這顯示成績穩定性之餘，其實亦反映球會的領導能力及財政來源是否可靠。至於其他重要的盃賽成績，愉園隊的表現雖算不上耀眼，但可視為有實力的挑戰者，在上世紀的七十、八十和九十年代的每一個10年裏各取得兩次盃賽冠軍，而踏入千禧年21世紀後，亦共有3次奪標，至於在2003-04年度球季，更連取兩項盃賽冠軍。所以，不論聯賽或盃賽，都顯示愉園在21世紀初成績最為突出，共得3次聯賽及3項盃賽冠軍。反觀由初升甲組的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21年間只得一次聯賽及兩項盃賽冠軍；八十與九十年代，同樣是各自奪得聯賽冠軍一次及盃賽兩項。然而，21世紀的10年間，既是愉園成績最美好的年代，但亦是急速步向衰落的時期；最後球隊於2010年球季完結時，黯然降班。

冷戰時代的政治足球之一：同章足球隊

在六十年代期間，愉園隊經歷兩次沾上濃厚政治色彩的事件。而它在事件中的表現，給當時的香港市民強烈感覺它是一支「左派球隊」。這裏所說的「左派」，泛指其政治取向——基本上是正面認同社會主義中國。至於愉園隊在整個親中共陣營中的位置、重要性與任務，則因為資料所限，未能確認。但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環境裏，這樣的政治形象明顯有別於球壇的主流。在平常的日子，這種在政治取向上的差異或者還未至於太過表面化，但當出現特殊情況的時候，便是另一回事了。

愉園遭報章大幅報導其「左派球隊」背景，發生在1965年首次取得甲組聯賽冠軍後，它以「同章足球隊」的名義到國內廣州、上海和北京三個城市訪問及進行友誼賽，前後踢過四場比賽，但均負於主隊。³本來進行友誼比賽並非甚麼大不了的事情，但卻因為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非國際足球協會成員，令那幾場比賽不單只違反有關的規定，並且甚有政治色彩。事情一經曝光，便觸發一場足球政治風波。

當時在「左派」人士眼中，香港的足球圈被親國民黨勢力所支配。首先，體育運動跟國際政治有着密切的關係，在體育運動場上亦可以感受到在冷戰期間，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之間的鬥爭。中華民國政府於1949年遷到台灣以後，仍然保留國際足協會員資格，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中國足球協會」名義加入)同時亦是國際足協會員。當時基

3 愉園體育會(2006)《愉園體育會 55 週年紀念特刊》，香港：愉園體育會，頁 90。

於國際政治考慮，中共政府於五十年代多次嘗試在國際足協挑戰中華民國的會員地位，但始終未能成功。中國足球協會於1958年退出國際足協，只餘中華民國代表隊派隊參加國際賽。這裏相關的爭議不單只涉及由誰來正式代表中國的問題，同時更直接影響到北京和台灣在華人社會如何拓展其勢力。

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但港英政府又默許國共兩大陣營在港活動。而國共雙方均努力嘗試團結群眾，同時又希望孤立及打擊對方。體育運動也就成為國共之間鬥爭的其中一條戰線。在當時冷戰的國際政治形勢底下，中華民國在不少港人眼中是正統，而且它又有參與各類國際組織，因此以其名義參與各種國際體育比賽，會視為理所當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由於香港足球發展蓬勃，台灣方面便在香港的華人球員中選拔中華民國代表隊的成員：

這種情況在五、六十年代甚為普遍，而且也不會引起太大爭議。在當時球迷或一般市民的心目中，香港隊或者中華民國代表隊基本上都是由參與本地[按：即是香港]聯賽的球員所組成的代表隊……香港人在那個時期對待國共之間的政治張力，基本上是心照不宣，不有太多說話。⁴

當年很多優秀的香港球員(例如林尚義、張子岱、張子慧、黃文偉等)均代表中華民國出賽。很多時候他們會被尊稱為「國腳」，而其代表資格亦會視為對其球技的肯定。就是

4 見呂大樂(2012)《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頁78-79。另參考鄭夏英、吳俊賢、王宏義(2006)〈香港南華足球會對台灣足球發展之影響：以1949-1970為中心〉，《人文與社會》，第1卷、第9期。

這樣，中華民國存在於香港球壇。在平常的日子，國共的影響屬心照不宣的；但當發生特殊事故時，則那個表面上平靜的局面，會掀起風波。

同章足球隊「神秘地」回國訪問一事經傳媒不斷報導後，引起社會的注意。當時左右兩派報章均由7月底開始至10月底持續跟進，報導愉園與香港足球總會互相交鋒的過程。由最初的反應到國際足協致函批評香港足球總會處分涉事球員過輕等等，全都出現在報章體育版上。雖然不至於引發全城熱議，但是愉園的「左派球隊」形象，便凸顯出來。

由於愉園有違反規定到非國際足協會員國比賽之嫌，事情可大可小。⁵但立場親近中華民國政府的報章，並未見乘機發難，盡情攻擊，而是仍以第三者角度來看愉園隊領導人與香港足球總會之間的針鋒相對。在報導愉園隊致函香港足球總會會長抗議時，會簡略引述信件部份內容，例如：「足總執委會這次竟要設組調查……足總此舉，實是打擊本港熱心搞足球運動的人士的興趣。非本港足球前途之福云」。⁶儘管左右立場不同，還未至於窮追猛打：「自從足球總會通過成立調查小組……足球圈漸入多事之秋」。⁷或者，那些站在不同立場的報刊亦意識到，為了維繫整個球壇及甲組比賽，足總亦很難會有甚麼大動作，整件事件大概就是「不了了之」。⁸

反觀左派陣營的報章，於同日報導有關抗議信時，除了把抗議信內容全文刊登外，還組織報導其他球圈人士同情愉園

5 據當時新聞媒體上的消息，馬來西亞足總及日本業餘足協均表示關注。見註四，呂大樂(2012)，頁86-87。

6 〈香港足球界旅行團昨向足總會長抗議〉，《華僑日報》，1965年8月24日。

7 同註6。

8 〈足總如何懲治犯規例的球員〉，《華僑日報》，1965年8月4日。

隊及反對香港足球總會的處理手法。除此以外，又有評論文章甚至讀者來論明確支持愉園及反對香港足球總會。這些報導或評論的標題包括：⁹

【抗議信全文】

足總損害屬會迫害球員 有關措施必須立即撤銷 足球界
旅行團三團長昨向羅理基面遞抗議書

【球圈人士反對香港足球總會做法】

未審先判招來非議 區志賢責足總欠公平

【署名評論】

嚴正抗議 合理要求
足總發謬論

【讀者來論】

港腳變了台灣 足總為何不調查

同章足球隊返港當日，即1965年8月9日，一些「左派」或親近「左派」的社會人士，曾經高調到火車站迎接球員，並於翌日晚上設慰勞宴。不論左右兩派報章對此亦有報導。這樣高調現身面對傳媒，跟北上前的保密行程，確實有天淵之別。當中一個親身迎接並有份做東設宴的就是「左派」商人霍英東先生。後來他跟愉園及其他親近北京的體育運動社團之間的密切關係，不再是甚麼秘密。根據《愉園體育會

9 《大公報》，1965年8月24日，多論。

四十五週年會慶紀念特刊》中所載，霍英東先生早於1964年已經應邀成為愉園會的名譽會長，刊物中第一篇的題目就是：「霍英東博士晉身體壇緣起愉園」。¹⁰ 雖然起初沒有實際插手會務，但是有需要時也就名正言順「出錢出力」支持足球隊。

當年同章足球隊北上的愉園球員之一黃文偉，在其自傳中亦有透露霍英東先生在那次內地訪問中，擔任相當重要的角色：

有些球員從未到過這遍[按：應是「片」字之誤]神秘國土，有點兒擔憂，尤其是劉添、羅國泰和我三人曾代表台灣出外比賽，去與否猶豫不決，社會名人霍英東特召我們到其蟾宮大廈頂樓俱樂部(即現今愉園體育會會址)見面，許下承諾：此行返港後，如果有事情發生，保證你們一年生活無憂……。就這樣，訪京團如期出發。¹¹

由此可見，霍英東自1965年開始已經着力在財政上間接支持親北京的體育界社團及人士在香港嘗試擴充影響力；他承諾照顧愉園足球員的生活，更可謂對球員參加同章足球隊北上訪問，起着一錘定音之效。

推動愉園化名同章足球隊北上訪問的確切原因，現在很難求證。然而，自1957年起擔任愉園會長的顏同珍先生及長期支持足球隊的簡煥章先生，兩人親身帶隊北上作突破性訪問及比賽，則毫無疑問負起積極策劃的角色。呂大樂曾經引用

10 愉園體育會(1996)《愉園體育會四十五週年會慶紀念特刊》，香港：愉園體育會，頁18。

11 黃文偉(2013)《黃文偉：黃金歲月》，香港：香港文化館，頁42-43。

當年中共內部文件推論，「明顯地，在中國大陸的負責單位眼中，愉園是統戰的對象——要對它搞好思想工作」。¹² 換句話說，顏同珍、簡煥章及愉園會，當時還不是中共在香港進行統戰的機器之核心部分——他們屬於統戰的對象，尚未被界定為自己圈中的一部份。不過，無論如何，從愉園隊突破缺口訪問非國際足協會員國，到後來球隊及相關領導人高調面向大眾，及抗議香港足球總會採取任何相關的懲罰措施，顯見香港足球圈內親北京的力量，已開始有條件衝擊原來親台灣的勢力。足球在當年是極受廣大民眾重視的體育運動，而愉園當時剛好首次奪得甲組聯賽冠軍，如果成功通過它在香港爭取到群眾的話，極有利於打破親近國民黨勢力於香港體壇的主導地位。¹³ 這樣樂觀預期統戰成果，見於1965年8月13日一份中共內部文件所寫：「我們經過一年多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績，現在香港體育界已成為三分天下(我們的力量，蔣匪與英帝的反動勢力)」¹⁴。

理論上，愉園大可乘着首次奪得聯賽冠軍之勢，繼續向奪取更多錦標出發，以求爭取廣大球迷的支持，進一步擴充親北京的力量影響力。可是，首次在甲組聯賽稱王後，直至六十年代完結，就只能增添兩項亞軍(1965-66年度聯賽、1966-67年度銀牌)。更戲劇性的是，愉園在甲組聯賽的參與因政治因素而突然中止。

12 呂大樂(2012)《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頁84。

13 同註12。

14 引自呂大樂(2012)《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頁83。

冷戰時代的政治足球之二：

抗議足總支持警方打壓左派1967暴動、退出甲組聯賽

1967年新蒲崗塑膠花廠的工潮，引發後來「左派」在全港多區暴動，乘勢反抗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這類社會政治事件原本應該與足球比賽無涉，有需要便以停賽的方式，來維持當時的社會秩序即可。然而，當時香港足球總會在報章刊登廣告，「支持政府維持治安」。愉園經過同章足球隊風波，親近北京口徑可謂順理成章。面對香港足球總會此舉，於1967年6月2日以會長倪震歐署名去信提出嚴重抗議，節錄如下：

閱報得知「香港足球總會」在所謂「支持政府維持治安」廣告中，竟列名參與。查該項措施未經足總執委會討論，更未徵得本會同意。特此提出嚴重抗議。

……

為此，我會要求你們迅即撤銷該項廣告。否則，一切嚴重後果，概由「香港足球總會」負責。¹⁵

愉園那份言辭嚴厲的抗議信並未能令香港足球總會改變主意，只於1967年6月13日召開執委會議進行討論。會上愉園代表李毓宏雖然質問時任足總會長李福樹(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又在會上控訴港英鎮壓左派暴動的「罪行」，但最終給趕出會議室。¹⁶

15 〈足總助英為虐 愉園嚴重抗議〉，《大公報》，1967年6月3日。

16 〈足總支持港英內幕一塌糊塗 愉園代表向執委痛數港英罪行〉，《大公報》，1967年6月14日。

以當時的政治形勢而言，很難有妥協的空間。愉園於1967年8月31日發表聲明，決定不參加1967-68年度足總主辦的各項球賽。¹⁷ 到球季展開後，雙方沒有甚麼溝通，愉園隊退出甲組聯賽已成事實。香港足總不緊張愉園退賽，一則雙方屢次在政治問題上面劍拔弩張，二則當時有本應降班的屬會覷準機會申請留級，又有多支乙組未取得升班資格的球隊表示有興趣升班，一席甲組作賽資格，確是奇貨可居。¹⁸ 因此，愉園隊的退賽動搖不了當年的甲組足球聯賽，遑論起到甚麼政治效果。

隨着左派暴動平息，愉園隊在一年之後亦着手籌備重回甲組足球聯賽角逐。在1968年7月4日致函香港足球總會，主要表達於1968-69年度球季恢復參賽甲組之意願，字裏行間仍視足球總會處事不公、損害球會和球員。這其實是回應香港足總於1968年6月29日函告愉園必須從最低組別丙組作賽爭取升級。不難想像，愉園在信中仍保留部份類似一年前的「鬥爭」論調，視香港足球總會排擠與歧視愉園，但亦比較平和指出恢復參賽乃維護球員及廣大球迷利益。信末更分別附上兩張不同面額支票參賽甲組或丙組，期望香港足總「慎重選擇」。¹⁹ 結果是愉園隊無奈地從低開始，投入丙組聯賽，逐步爭取升回甲組作賽。

有趣的是，縱然在丙組作賽，愉園仍然能夠保留11名原本於一年前在甲組作賽的球員，一則當作向香港足總作出無聲

17 〈憤李福樹把持足總 愉園暫不派隊參賽〉，《大公報》，1967年9月1日。

18 〈愉園退出聯賽 三支準甲組隊皆有意思補缺〉，《華僑日報》，1967年9月14日。

19 〈愉園體育會函告足總 擬派隊參加各項球賽〉，《大公報》，1968年7月6日。

抗議，二則反映志切爭取升班之決心。甲組球員屈就丙組作賽舉措，自然又引起敵對勢力非議報導：

在今屆足總正在大力推行職業聲中，而該會敢將值錢有價之甲組球將，放在丙組出賽，此舉之目的如何，頗令人尋味。²⁰

另一方面，丙組聯賽對球會毫無收入可言，就連「左派」報章亦提醒「球迷將可免費欣賞巨型班的球賽」，因為隊中12人除一人外，「其餘各將，都是現役好手，不少是被選為『國際腳』」。²¹於球迷而言，免費娛樂固然是好，但球員肯定不會因丙組聯賽屬於業餘性質而甘願免收報酬。撇開丙組球員收取酬勞是否違規不談，毫無收入之餘，財政來源又是甚麼呢？就算是在甲組比賽，單憑門票收入，從來沒有可能足夠支持球隊營運，自當年升上甲組以來，跟其他並非政府部門球隊一樣(政府部門球隊包括消防、警察、陸軍等)，要靠熱心人士提供資金，而通常是商人才有足夠財力承擔，當時的顏同珍及簡煥章，俱屬於私人出資予球隊營運。另一方面，早前提及霍英東從1964年起便應邀擔任名譽會長一職，自同章足球隊事件後，更積極推動愉園自置會所，與其他愉園高層合力購得沿用至今的銅鑼灣蟾宮大廈頂樓，從此更多出錢出力支持愉園會的發展。²²有如此豐厚財力支持，甲組球

20 〈愉園收藏大牌 足總考慮查究〉，《華僑日報》，1968年8月24日。

21 〈甲組隊被迫打丙組 愉園陣容鼎盛〉，《大公報》，1968年8月22日。當時《大公報》報導時為現役甲組球員轉踢丙組的包括盧德權、廖錦明、鍾楚維、陳長強、林英傑等。

22 愉園體育會(1996)《愉園體育會四十五週年會慶紀念特刊》，香港：愉園

員降格丙組作賽，薪酬方面不會成為阻礙。

以甲組人腳作賽，自然可以奪得丙組冠軍升班，愉園同時又再去信香港足球總會，重申要求立即恢復甲組地位。信中除了一貫指責足球總會繼續歧視與排擠外，亦提出「球隊具有甲組實力和較大的號召力」，若要「多打一季乙組」，受損害的不僅愉園會，「對足總，所有屬會，球員和球迷，都是不利的」。²³ 最後於1969年6月的香港足球總會執委會議通過拒絕愉園的要求。²⁴ 愉園惟有再次在低一組別作賽，爭取一年後升回甲組。結果奪得乙組聯賽冠軍，每年升一級之下快速回到甲組比賽，與五十年代首次參加香港足球總會聯賽的經歷如出一轍，同樣是每年奪取低組別聯賽冠軍晉升一級。從1970-71年度球季開始，愉園重回甲組，之後沒有經歷降班，直至2009-2010年度球季結束為止，才需要在2010-11年度球季起降回乙組作賽。

縱觀整個六十年代，愉園自1959-60年度首季升上甲組後即獲聯賽亞軍，其後4季曾三度屈居亞席，終於在升班第六季，即1965年奪得聯賽冠軍。如前所述，球隊發展頗為順利，理應可以進一步成為香港球圈中一支勁旅，以平易近人的手法來爭取廣大球迷的支持。可是，適逢當年政治形勢出現突變，體育運動界亦捲入直接的政治鬥爭之中，愉園因而與香港足球總會決裂。非體育因素干擾球隊發展，雖然並不致命，但多少也令到球隊前進步伐迂迴。然而，亦由於受到政治因素干預，愉園隊得以早在50年前便能夠明確定位為

體育會，頁19。

23 〈愉園致函足球總會 重申恢復甲組地位〉，《大公報》，1969年5月28日。

24 〈足總避重就輕 否決愉園要求〉，《大公報》，1969年6月25日。

「左派」愛國球隊，而長久以來，這個「左派」的「光環」亦有利於愉園隊取得財政支持，使其在經濟狀況較為穩定及理想的情況下，得以自20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穩定發展至21世紀二千年代中期。

對愉園而言，「左派」的政治標籤或會令它失去某類球迷的支持，但在另一方面卻為它打開了支持的來源。例如早在六十年代末便得到霍英東大力財政支援，有條件自置會所；這樣的組織資源對發展青年球員的訓練及穩定球隊的班底，甚有幫助，甚至可以說是往後數十年會務發展的最重要基石。會所不僅讓管理工作集中於一處，亦讓足球隊員在操練後有落腳點，甚至向青年軍球員(即年齡及實力未及甲組球賽水平)提供三餐一宿，誠如訪問一位資深球會人士透露：

對青年軍球員提供膳宿及教育等全面管教。住宿於銅鑼灣蟾宮大廈，提供三餐一宿。除足球訓練及足球理論課之外，還提供補習英語、學習現代史(即愛國教育，由當時新華社派員負責)。²⁵

這段說話，凸顯愉園扛着「左派」球隊旗號的與別不同之處：培養青年球員較全面，及政治統戰任務。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甲組球隊，除了南華體育會之外，其實難有其他球隊在體育資源方面可堪比較；在組織資源方面，愉園應是比較充裕的一家球會。對已經成長的甲組球員，球場外管教方面可做不多，但是對十多歲的年青小伙子而言，他們通常在學業方面的成績都是不甚理想，所以能在操練球技之餘，

25 於2011年訪問一位愉園隊非常資深的管理人，口述轉載。

給他們灌輸一些足球理論，或多或少有助他們提升足球素養。而球隊在1967-68年度球季退出甲組聯賽，及後需要從頭由低組別聯賽爭取升班才可以回到甲組，也給愉園一個機會在青年球員的培訓方面，做一些基礎的工作。

重新於1968-69年度球季在丙組作賽的愉園，卻可以招攬到當時已在甲組嶄露頭角的新秀中鋒鍾楚維加盟降格丙組參戰，相信背後財力支持必不可少。對於這位當時未到20歲的年青人加入愉園隊，操練及比賽之餘，政治統戰工作必不可少。他接受一份刊物訪問時透露：

當時，整個愉園的球員都會不時回中國學習「毛澤東思想」，通常都是一大群球員一起搭火車前往廣州，恍如球隊集訓一樣。1968年，我剛開始學習愛國思想的時候，更曾經一個人隻身前往大陸學習，十分積極。²⁶

鍾楚維出身於流浪足球會，初轉到愉園時，對其政治氣氛頗不習慣。但後來卻在這樣的環境裏「心態上也積極了不少」，而且一直在球隊13個年頭，直至1981年「掛靴」為止。他的解釋是「沒有離開，除了因為球隊對待球員相當不錯外，也與本身的愛國情懷有關」。²⁷當然不是每一個球員都會接受愉園的那一套，但對另一些球員而言，則未嘗不是一種有吸引力的選擇。在這一套組織文化背後，需要有相對穩定的財政支持。

26 《長訊》，〈球場·戰場 鍾楚維〉，2009年10月，第17期。另參考莫逸風、黃海榮(2008)《香港足球誌》，香港：上書局，頁33。

27 同註26。

相對平靜的1970及1980年代

愉園隊的發展過程，自首度升上甲組以來，剛好遇上當時歷史、政治的大環境，由奪得聯賽冠軍至退出甲組，高低起伏，經歷了充滿戲劇性的發展。如果將六十年代球會的經歷描述為暴雨及驕陽的兩極交替，那麼1970及1980年代的兩個10年，則相對上是在平靜中渡過。愉園在1970-71年度球季重新升回甲組比賽，往後整整18個球季都與聯賽冠軍無緣，要到了1988-89年度球季才有機會奪得球會史上第二次甲組聯賽冠軍。1970-1989年間合共得到七次甲組聯賽亞軍及一次冠軍，其間曾取得4個主要盃賽錦標。以老牌球會計，成績不算特別耀眼，但是如前所述，甲組聯賽差不多逢二進一得到亞軍成績，反映球隊的運作相當穩定。

霍英東對愉園在財政方面的大力(甚至佔絕大部份)支持，由1960年代中期開始，延續30年直至1995年卸任會長，轉任永遠榮譽會長為止。我們當然不能說霍英東要依靠參與愉園才能夠踏足香港體育界，但是愉園確實起着踏腳石作用。時間方面又非常巧合，在1965-1969年間，愉園隊認為不斷受到香港足球總會中的親台及親港英勢力排擠與歧視，但重新升回甲組的1970年，霍英東適時當選香港足球總會會長一職，左右派兩股勢力的此消彼長，於此可見一斑。

霍英東當上香港足球總會會長，其中一項工作是通過足球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重回國際體壇，不單盡力恢復在國際足協的會籍(中國足協在1958年主動退出)，更同時爭取中國在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會籍；經多年努力，終於分別在1979年正

式恢復國際奧委會及1980年國際足協會籍。²⁸連串成果的最重要的政治意義及實際效果，就是兩大國際體育組織，都把中華民國的會籍，以「中華台北」名義處理，變相認同「一個中國」的政治表述。

至於愉園體育會會長一職，霍英東則遲至1977年才正式出任，亦即表示愉園是由霍英東在名義及實際上領導。霍先生未必會過問實際會務及其運作，但在有需要時會提供財政上的支持。

愉園最大的開支肯定是維持足球隊參戰甲組聯賽。雖然20年間只曾得到一次甲組聯賽冠軍及4項盃賽錦標，但多次取得聯賽亞軍的成績，亦可見它是當時球壇上的一支強隊，有實力跟其他勁旅角逐錦標。事實上，七、八十年代的愉園除了以培養年青球員而著稱之外(例如鍾楚維、劉榮業、余國傑、梁帥榮、陳炳安等)，亦曾重金招攬著名球星如張子岱、鄧鴻昌等加盟。1972年，當時張子岱以中華民國「國腳」身份由消防轉會至親北京的愉園，在球迷中間是一則頗為轟動的新聞。然而「左派」傳媒當時卻異常低調，既沒有大篇幅報導張子岱加盟，更沒有組織專稿專訪，只曾以標題「愉園東昇組軍完成」低調報導：

愉園體育會足球隊下屆人選，以本屆為基礎，為了補充個別位置，邀得張志培、吳汝賢、張子岱、黎新祥、楊振澄等加盟效力……²⁹

28 愉園體育會(1996)《愉園體育會四十五週年會慶紀念特刊》，香港：愉園體育會，頁20-21。

29 〈愉園東昇組軍完成〉，《大公報》，1972年7月19日。

相比《大公報》的低調，其他報章樂意作「弦外之音」式報導：

至於愉園所付出的轉會費多少，未有透露。但側聞為數不菲，而付出張子岱的年薪，亦近五萬港元，可說得「銀彈政策」的成功。³⁰

招攬當時年過30之齡的球星，若「銀彈政策」之說成立，簽字加盟時不作大事宣傳以收統戰之效，似乎有點可惜，但對「左派」球會愉園而言，期望張子岱能夠增強球隊實力似乎更為重要。但在那個本地球壇興旺的時期，愉園只是眾多「巨型班」中(例如南華、精工、流浪等)的其中一隊，投資並不能直接的保證可以贏得獎盃。或者當年的愉園未能跟精工、南華比較，但總可以算是強隊之一。³¹

1979年6月下旬，由球員到助教合共效力七年後，愉園忽然與張子岱解除賓主關係。「左派」報章的報導不以解僱為重心，亦不知有心或無意，稱其為六十年代球星，似乎忽視了整個七十年代，張子岱的足球歲月其實差不多全都貢獻給愉園：

張子岱下屆離開愉園，引起圈內一陣哄動。這位六十年代的足球明星，下屆如何，是令人感到興趣的。³²

反觀，親台勢力面對當年「右派國腳」加盟「左派球

30 〈消防張子岱已簽字愉園〉，《香港工商日報》，1972年6月22日。

31 當年霍英東也有獨資經營東昇足球隊，而以高薪從南華挖走仇志強，乃一時之佳話。但為何他「分散投資」，而不是傾力打造一支「超級巨型班」，就不得而知了。

32 〈張子岱離開愉園〉，《大公報》，1979年7月1日。

會」，歷時七年都未能釋懷。當張子岱與愉園再無關係，「右派」報章便乘勢反擊：

雖然表面上就滿口仁義道德，何嘗唔係一朝天子一朝臣，「主任林」下野，「阿香」亦遭到革職，當年曾出重金收購「阿香」，翌年就拉隊返回大陸集訓，因「阿香」係中華民國國腳，有利用價值作為宣傳工具，依家再有利用價值……³³

文中的「阿香」即張子岱。那種一人獨撐足球隊財政的情況，到了1985年開始有所轉變。當年同時間有3位後來成為政商體育名人的人士加入愉園領導層，他們分別是曾憲梓及徐展堂擔任副會長，余錦基出任足球部主任。³⁴三人中尤以余錦基最直接領導足球隊，但卻沒有對足球隊作出翻天覆地變化。余錦基擔任足球部主任三年之後，在1988年中當選香港足球總會主席，³⁵在香港體壇可更上一層樓。客觀上，可以說愉園是讓有心人晉身香港體壇領導位置的重要踏腳石。余錦基當上足球總會主席後，由其弟弟余錦偉繼承愉園足球部主任之位，亦即是作出財政支持，但其弟沒有再晉一級擔任體育界更高的領導職務。至於曾憲梓及徐展堂，則較多參與中國內地的事務，後來亦成為中港政商名人。

-
- 33 〈利用價值已完畢 阿香嘆前路茫茫〉，《香港工商日報》，1979年7月1日。
34 愉園體育會(1996)《愉園體育會四十五週年會慶紀念特刊》，香港：愉園體育會，頁50-51。
35 〈足總新內閣昨誕生〉，《大公報》，1988年7月25日。

1990年代至千禧年代：盛極而衰

當愉園在1988-89年度球季重奪失落24年的甲組聯賽錦標後，在隨後的整個九十年代又重複前一個10年般平平穩穩的成績，又是一等10年，才於1998-99年度球季第三次奪得甲組聯賽冠軍。而在10年間的盃賽成績亦未見突出，只在第三次聯賽冠軍之後一年各取一項盃賽錦標。換句話說，1990年代前半期，愉園只能交出兩項盃賽亞軍成績，聯賽就不具角逐冠軍實力。其實在余錦基及余錦偉兩兄弟之後，愉園足球部主任一職的平穩性不如以往。1995年的轉變最具象徵意義，因為霍英東卸任會長，雖然以永遠榮譽會長名義跟愉園保持一定關係，但明顯地霍氏對愉園的支持，將告一段落。不過，話雖如此，愉園作為數十年來一支重要的「左派」球隊，接任會長的亦是具紅色資金背景的朱樹豪，但當然若與霍英東相比，則中港政商影響力難望其項背。在此轉折期，有另一本地色彩的商人康寶駒入主足球部，雖然亦算熱心投入，但愉園成績未見突飛猛進，終於兩年後不再續任足球部主任，在1997-98年度球季起，轉而支持另一甲組球隊。之後再過兩年，即自入主愉園4年後，康寶駒當選香港足球總會主席，³⁶愉園可說再一次發揮晉身香港體壇領導位置踏腳石的作用。

康寶駒在1995-96年度球季起入主愉園之後，雖然球隊成績沒有戲劇性變化，但是對長久以來相對穩定的球隊管理層，卻有不起眼但翻天覆地的變化，就是梁子明從球隊的第一線管理架構上退場。³⁷梁子明自1973年起擔任球隊教練，至

36 〈康寶駒接任足總主席〉，《明報》，1999年7月26日。

37 愉園體育會(1996)《愉園體育會四十五週年會慶紀念特刊》香港：愉園體

1980年升任領隊，再到1994-95年度球季結束，合共22年都站在球隊管理層的第一線。梁子明破天荒的退場，其實具體反映了後霍英東時代愉園足球隊管理上的根本變化，雖然這是在霍英東淡出愉園10年之後發生。

1997-98年度球季起，有官永義及林大輝兩位接掌愉園足球部，其後於2000-01年度起林大輝不再主理；³⁸ 而官永義則在2008年中球季完結時退位，可說是後霍英東時期在任最長的愉園足球部主任，亦是作出財政支持為期最長的一位。官永義接手後，一則重整球員陣容，二則適值商業球會退潮，成績斐然。當時甲組職賽的商業價值和吸引力日減，加上其他老牌球會又不刻意經營，種種因素相加，令到愉園隊在官永義任足球部主任年代，渡過球隊歷史上成績最輝煌的年代。1997-2008年度間，三奪甲組聯賽冠軍，是以往參賽甲組30年歷史的總和，最後一次是2006年；此期間亦合共奪得5項盃賽錦標。毫無疑問，後霍英東年代的愉園隊，終於登上球隊歷史高峰。

然而，在官永義不再主理愉園足球部之後，足球部起了前所未有的變化。當時愉園隊的實際掌舵人是主席貝鈞奇(有別於會長朱樹豪)，但責任只是維持球隊註冊，亦即所謂擔當「持牌人」角色。自官永義離去，而在找不到如以往般的足球部主任繼續承擔財政及實際運作的情況下，貝鈞奇在2008-09年度球季開始把球隊改為以外判形式給予第三者營運。所

育會，頁55。1995-96年球季足球隊職員名單中各職位包括：總監、副總監、主任、副主任、領隊、副領隊、教練、助教、預備組教練、物理治療師，當中沒有梁子明的名字。

38 愉園體育會(2006)《愉園體育會55週年紀念特刊》，香港：愉園體育會，頁50-53。

謂外判，就是有別於以往由提供資金者直接管理，而是外判商自行籌集球隊營運資金，而實際投資者亦不一定跟愉園體育會原有領導層有聯繫或接觸。不幸地，這種外判模式不能投放足夠資金維持球隊實力，而以有限財政預算下，只能任用年青球員，結果導致愉園隊首次因為成績不佳而降班。

外判商面對降班形勢，沒有即時放棄，反而用同一模式向愉園會方繼續「租借」球隊營運權在乙組作賽。首兩季在乙組的成績未見突出，升班不成。到第三季，亦即2012-13年度，終於奪得乙組聯賽亞軍，在2013-14年度球季回升甲組。對老牌球會來說，以外判形式營運球隊，終於得以返回原來起點，不論對會方或外判商，理應感到鼓舞。可惜，甲組聯賽球季開始後，愉園隊三個月還未能打開勝利之門。在2014年1月，更發生懷疑球隊涉及球賽作假事件，廉政公署人員在一場比賽後即時在球場更衣室，把全隊球員及部份職員帶走調查，之後更正式拘捕愉園六名球員及一名贊助商職員。

本來愉園隊作為一支歷史悠久的球隊，在降班三年後得以重回甲組參賽，重新起步，大可是一個好的開始。奈何突然涉及刑事案件，遭香港足球總會終止繼續參賽資格，所受打擊相當巨大。由於事件已經進入法律程序，本文不便再作評論。

此次不幸事件，若最終有人需要負上刑責，固然個別立心不良者應該受到懲處。但在事件背後，愉園出現營運困難，又豈是偶然？

從班主足球到外判足球

傳媒對於愉園隊在2013-14年度球季賽涉及的造假事件有

不少篇幅報導。這次比較2009-10年度球季的兩宗造假案件惹來更大迴響，因為愉園這支老牌球隊在降班三年後重回甲組之際，竟然繼2009-10年度球季後再次涉案。在執法機關採行動前兩星期，即是2013年12月22日，另一場比賽於完場前的不可思議烏龍入球，其實已經引起大眾關注。兩宗事件的主角，愉園及屯門足球隊，背景及發展歷史絕不相同，為何湊巧在「1314」交接時同樣鬧出「假波疑雲」呢？

屯門足球隊的發展經歷，我們未曾詳細研究，但從傳媒報導及網上資訊得知，屯門足球隊是近年港甲呈現新氣象的代表之一，就是不同球隊以紮根地區為主的所謂「區隊」，經多年在低組別聯賽角逐升班後，最終得以參戰甲組賽事。這股港甲新興勢力，包括(皇室)南區、屯門、(天行)元朗，沒有一隊是由商業機構直接買入甲組球隊易名參戰，只是升班後應贊助商要求在原來區隊名稱前加上贊助名號。

商業機構直接買入甲組球隊後去掉原名，改以公司名稱參戰香港甲組足球聯賽(下稱港甲)，確實睽違已久，反映港甲對商業機構欠缺吸引力。財源不開，對港甲來說其實不是新鮮事。對上一個成功的商業機構參賽例子，已經要數到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快譯通足球隊了。有趣的是，缺乏商業機構直接改名參賽，又不表示商人對足球完全沒有興趣。但港甲長久以來的門票收益通常都不足以支付球員獎金，遑論作為球員薪酬的財源之一。球員薪酬及球隊日常經費，幾十年以來其實都是由一位班主負責承擔大部份以至全部。無論是歷史悠久如南華及東方足球隊，以至今次主角之一愉園，傳統上都不是由普羅會員或會方集資，反而是以會長、主席或足球部主任名義一力承擔。有力承擔的，首要條件自然是個人財力

充足，而通常亦是商人為主。

久而久之，本地足球圈便出現了所謂「老細足球」（老細即老闆之意）的說法。「老細」對聘用球員以至球賽臨場排陣調動，都有相當程度參與。從正面去看，是熱心推動足運，但負面的說法則是「干預」球隊。直到今天，普羅球迷以至資深足球圈人士，都認為「老細足球」不單沒有減少，個別情況更是變本加厲。

然而，據我們觀察，近年的「老細足球」與以往港甲蓬勃時的「老細足球」，從組班以至營運和管理，差異很大。為方便區分，我們把昔日港甲蓬勃時期稱為「班主足球」年代。就算不太年長的本地球迷，都會對八十年代中以前，綽號「大、中、細碼」的香港足球代表隊3領隊記憶猶新。創造港甲一個輝煌的「班主足球」時代，他們3人可算是最具代表性，大碼指精工足球隊班主黃創山，中碼指當時愉園的余錦基，細碼指南華足主林建岳（亦有指林是中、余是細）。他們3人各自為自己的球隊承擔大部份經費，是名副其實的班主足球。與他們同期的其他球會班主或足主，情況都差不多。他們可說是一群「在地」班主，即是於大部份比賽都親身踏入球場草地坐到球員後備席廂，緊張時不禁率先跳起來喝罵球員甚至是球證，是實實在在的「干預」球隊運作。可是，「班主足球」在當時的香港，絕不是貶意，無論是擁躉或敵對球迷，都不會視這群班主的「干預」是危害香港足球發展。

愉園體育會在上世紀的七、八、九十年代，營運模式跟其他港甲球會無大分別，可能最實質的分別，是九十年代以前，長期穩定地由霍英東作班主及提供財政資源，讓球會由人稱「書記」的梁子明及其管理班底長期主理球隊事務。老

一輩球迷應該記得，霍英東更喜歡親自落場踢球，這當然不是指出戰港甲賽事。及至霍氏家族完成對愉園體育會的歷史任務，於九十年代中功成身退後，愉園足球隊作為香港長久愛國體育組織龍頭象徵，亦很快便得到另一個紅色資本家出任會長，所以往後一段時間球隊都可以穩定運作。當時除了紅色商人外，亦有本地熱心足球的商家出錢出力支援球隊，以足球部主任形式，延續球隊在港甲競逐。這樣相對穩定的班主足球形勢，在2008-09年度球季瓦解，愉園開始步向近年一種新的港甲球隊營運模式，就是把足球隊的營運全面外判，即是由組織球員班底至管理至尋找財政來源，皆由外判商自行統籌及負責。有傳媒引述貝鈞奇所言，道出直至今天霍家對愉園在財政上的重要性：

愛國商人霍英東曾是愉園體育會的會長，每年從基金斥資7位數支持球隊。可惜霍老2006年離世後，基金開始減少撥款。³⁹

類似的全面外判，恰好同樣出現在近期另一支新聞球隊——屯門足球隊。此類外判模式，跟前述的班主足球模式徹底割裂，外判公司通常不是已經擁有資金，而是獲得授權營運球隊後，才開始尋覓主要贊助商。當幕後財主當上主要贊助商後，可能整季也不會親臨球場觀戰，遑論要求他們如「班主足球」年代般熱心參與。最新形勢反映，就是幕後財主竟然神秘莫測，無法讓傳媒及公眾查探得到。相對以往的地班主，新的球隊財主們顯然「離地」得多！

39 〈球員被逼放水 每場獲利萬元〉，《南方都市報》，2014年1月9日。

離地班主的資助模式，我們暫稱之為「外判足球」，以示有別於前述的熱血在地「班主足球」。外判足球通常由一個中間人或機構負責聯繫贊助商出資，而外判承包者負責組織球隊及日常運作。贊助商本人或是其代表，可以「離地」得一場球賽也不臨場觀戰。贊助商對球員的組班干預，可以激烈至球季開始後還要求大換血(例如本屆的愉園)，以符合贊助商某些主觀願望。近3、4年所見，港甲的「外判足球」抬頭時，就同時出現球賽造假，未能斷定是因果關係，但就非常巧合。然而，當熱血在地班主難求，面對財源緊絀的情況下，持牌球會若不想退出角逐港甲，外判幾乎是唯一可行方案。

暫時從負面新聞所曝光的內情窺見，某些贊助商通過外判足球模式，安插部份球員，使其繞過外判者的指示，直接聽命於贊助商或其代理人的安排。本來球員的工作細節，即是比賽時跟從甚麼戰術部署，應該是教練全權指揮，但是卻神秘地改由贊助商代理人直接作出個別指示。贊助商繞過教練而直接指示個別球員，對球隊的不良干預程度不單只遠超「班主足球」年代，而且性質亦很不一樣。當足球部署不再「純粹足球」的時候，腐敗、造假大有可能發生。這不單止是涉事球隊以至整個足球產業，同時也會令球迷失望，對本地足球失去興趣。

回看愉園、過去在財政比較穩定時期，都並非長時間在甲組聯賽一枝獨秀，但是成績跌宕起伏之間，還是對應着正常的體育產業發展週期。當完成愛國球隊歷史任務後，愉園雖然歷史悠久，但其實開源方面不會比較其他新興區隊更有利。當紅色資本有更多渠道投資於香港的經濟、文化和體育

產業時，愉園足球隊不再是唯一選擇；而由於背負悠久的愛國傳統，非紅色資本不願意或不易被接受成為財政來源。

小結

愉園隊60多年來的發展經驗，可謂見證了二戰後香港社會的歷史發展。它的成立是冷戰國際政治形勢下的產品，背負着在香港這處英國殖民地裏，以鮮明的愛國(意思是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形象，在廣大市民中團結群眾，爭取支持之餘，同時也嘗試制衡敵對勢力。它是有其政治任務的一間體育會，也因此而有相當穩定的組織支持，有助球隊發展。這類政治背景及相關的支持，並不僅限於親北京的「左派」團體。在當時的政治環境底下，國共雙方均嘗試在民間不同界別組織群眾和發揮政治作用，而體育運動界只是它們各自進行統戰、意識形態鬥爭的其中一條戰線而已。

現在事後看來，國共之間在香港土壤上所進行的角力、鬥爭，給香港社會注入很多非原來所預想的活力。在文化、出版方面，百花齊放；在足球場上，儘管當年只有400萬人口，卻可以支持一個甚有競爭性的足球聯賽。當足球並不只是足球的時候，其他資源投入其中，令球壇出現列強爭霸的局面。

但隨着冷戰結束，政治任務的重要性大大下降，愉園回到世俗的世界，在新的生態環境裏尋找生存的空間。而當「班主足球」已由「外判足球」所替代時，它在經營上的困難就更表露無遺了。

作為一個「左派」團體，愉園隊跟其他社會組織一樣，都需要不斷適應環境，找到生存的空間和發展的機會。對很

多不認同「左派」團體的政治立場的人士來說，或者會以為其政治背景是一種障礙，影響組織的發展。但從組織分析的角度來看，則它的意識形態與政治任務可以為它帶來充足的資源，使其組織、青年球員的培養，以至球場上的表現最為穩定。反而是當意識形態已變得不重要時，它便逐步走向衰落。

附錄：重要球季的球隊陣容

(1) 1957-58 年度首次參加丙組聯賽，得冠軍升班

門將：梁志強

後衛：伍球廣、梁尚德、張炳雄

中場：顏森泉、彭富志、葉明

前鋒：鄧競廉、梁友善、容康泉、袁沛華、王包欽

(2) 1958-59年度 乙組聯賽冠軍升班

門將：鍾卓標、何冠球

後衛：吳葆良、李定標、梅青

中場：黃文偉、劉潤森、黃漢忠

前鋒：劉德志、盧永勤、梁友善、梁永許、王沛榮

(3) 1959-60 年度首次升上甲組

門將：張觀興、雷煥璇

後衛：陳燦林、駱德興、梁榮輝

中場：黃文偉、郭石、鄭帝康、馬瑞能

前鋒：朱永強、郭滿華、梁友善、吳偉雄、謝炳權、梁桂康

(4) 1964-65年度 第一次甲組聯賽冠軍

門將：莫小霖、梁子明

後衛：劉添、廖錦明、馬福培、鄧耀民、莫光強、李志森

中場：黃文偉、陳鴻平、胡渠根、陳炳光、翟錦輝、秦禮文

前鋒：朱永強、郭滿華、羅國泰、李國強、廖錦光、阮家富

(5) 1968–69年度 退出甲組後重新參加丙組聯賽，得冠軍升班

門將：盧德權

後衛：廖錦明、陳長強、林英傑、馬福培、江達祥

中場：陳明基、樊錦明、劉希、潘容壽

前鋒：鍾楚維、陳中、郭榮、陳振權、陳維民

(6) 1970–71 年度重回甲組作賽

門將：盧德權、陳寶安

後衛：廖錦明、林英傑、江達祥、葉錦洪、黃文光

中場：陳明基、胡秀文、周志雄、崔錦輝、梁能德

前鋒：鍾楚維、郭榮、陳振權、馬興強

(7) 1972–73 年度張子岱加盟

門將：盧德權、陳寶安、劉德祥

後衛：黎新祥、鄭潤如、林英傑、黃文光、梁雄光、張志培、王展健

中場：張子岱、鄭國根、吳汝賢、張炳衡、周志雄、鍾廣仁

前鋒：鍾楚維、劉榮業、周榮、楊振澄、王永生、郭錦安

(8) 1988–89年度 第2次甲組聯賽冠軍

門將：劉棟平、王永新

後衛：梁帥榮、蔡滿祥、吳炳南、譚亞福、廖華智、闕偉強

中場：梁能仁、鄧柱盛、茹健德、姜榮耀、黃志強、葉天發

前鋒：王福榮、陳文順、黎耀光、許孫榮、吳鑑鴻

(9) 1998–99年度第3次甲組聯賽冠軍

門將：加夫利、麥國輝、吳俊龍

後衛：黃偉德、潘耀焯、胡耀國、陳志強、周昭雄、高爾
中場：蔣世豪、羅繼華、李偉文、郭文迪、賴啟卓、吳家銘
前鋒：巴古沙、摩亞、米活、郭裕洪

(10) 2000-01年度第4次甲組聯賽冠軍

門將：加夫利、梁卓長、詹錦文
後衛：奧拿里奧、黃偉德、李偉文、潘耀焯、周昭雄、賴啟卓、葉國偉
中場：祖利亞、蔣世豪、羅繼華、郭文迪、李培、唐健明
前鋒：布力治、卡路士、哥連斯、陳志康、郭裕洪

(11) 2002-03年度第5次甲組聯賽冠軍

門將：范俊業、梁卓長、詹錦文
後衛：卓卓、史提夫、李偉文、潘耀焯、梁承傑、沈國輝、薛振邦
中場：鄭兆聰、蔣世豪、羅繼華、賴啟卓、李培、李圳業
前鋒：甄馬田、基夫、郭裕洪、沈國強

(12) 2005-06年度第6次甲組聯賽冠軍

門將：范俊業、梁卓長
後衛：卓卓、史提夫、列卡度、潘耀焯、沈國輝、唐建文、馮繼志、
梁金輝、馮振霆
中場：蔣世豪、李偉文、羅振邦、李圳業、李思明、伊雲羅
前鋒：奧利韋拉、法比奧、馬些路、沈國強

(資料來源：《愉園體育會 55 週年紀念特刊》，2006：96-100)

香港左派工人的粵劇運動 (1950-1970年代)

李少恩

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份，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¹

這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內容，是1949年後中國大陸文藝綱領，也一直深深影響香港「左派」團體的文藝發展。²實際上，從1950至70年代，香港左派工會支持的工人粵劇如實反映了當代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並不斷在香港社會實踐中共的文藝政策，就如一股由左派工人發動的政治文藝運動。本文考據這時期的香港左派工人粵劇文獻，配合口述資料，探討中國大陸文藝政策是如何呈現於後期的香港殖民地社會？以及左派工人如何書寫出一段獨特的香港粵劇歷史和文化？³

- 1 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澤東在延安親自主持了一次文藝工作者座談會。會上他發表了這番重要的講話，全文初刊於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報》。
- 2 據筆者自少在香港的生活經驗，1950至1970年代，社會上有一種頗為普遍的現象，團體或個人的身份往往根據他們的政治立場而被區分，支持中國大陸的被稱為「左派」，支持台灣的則被稱為「右派」。
- 3 筆者曾撰文，初論1960年代左派工人的粵劇和左派學校的音樂活動，見李少恩(2005)〈從南國粵劇團看1960年代香港粵劇與工運〉，載於李少恩等編，《香港戲曲的現況與前瞻》，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粵劇研究計劃，頁21-30；〈風在吼的火紅年代——從文藝武器說起〉，《明報》，2006年8月17日，本文可說是更進一步的反思與深入討論。

粵劇作為工人娛樂

廣府人是香港人口的主要構成部份，而粵劇是十九至二十世紀廣府人的一種主要娛樂，在香港經常可以見到粵劇的活動，例如在港九、新界的酬神祭祀戲棚、在戲院及歌壇，以至於從電台和電視的廣播等媒體，⁴ 香港的民間社團更有粵劇活動的傳統，尤以二次大戰後十多年最為興盛。⁵ 1949年，當香港社會仍處於戰後重建的階段，中國大陸政權更替，不少人和資金轉移到香港，加速香港的工商業發展，也促進了香港的工會發展。⁶ 踏入1950年代，不少廣府人在他們所屬的工會進行粵劇活動，工會也樂於以此維繫會員和家屬，增加他們對工會的歸屬感。同時，工會的粵劇活動也起了招徠新會員和向社會宣傳工會的作用。故此，當時不少工會，無論它的政治立場，粵劇往往是會員的主要康樂活動之一。例如，港九海陸漆務自由工會於1953年在九龍普慶戲院舉行成立典禮，⁷ 席上除了由該會的教育組會員演出粵劇《萬惡淫

4 有關 20 世紀上半葉粵劇和粵曲在香港的發展，見李少恩(2010)〈撰曲史略〉，載於《粵調詞風：香港撰曲之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中國音樂資料館，頁 1-55。

5 二次大戰後，香港的《華僑日報》經常刊登有社團的粵劇和粵曲活動資訊，詳見 1940 至 1960 年代《華僑日報》的娛樂版。

6 有關香港社會發展，見元建邦(1995)《香港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

7 1950 年代香港出現了一批名稱包含「自由」的工會，例如中華巴士自由工會、電梯職工自由工會或港九電影從業人員自由工會等。這些工會由親台灣的人士組成，政治立場被視為「右派」。

為首》，⁸更邀請多位伶人演出助興。⁹又例如港九工會聯合會，簡稱工聯會，以及它的屬會都設有粵劇組或粵曲班。¹⁰據黃少俠憶述，年輕時他在廣州工作，並不熱衷於工會的活動，1949年來港後，經友人張明介紹，參與左派工會的粵劇活動，後來被吸納為工人粵劇團的成員，最終更成為工會文藝活動的積極份子。¹¹由此可見，粵劇是1950年代香港工會的主要康樂活動之一，而且對工會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工人日常的粵劇活動主要在所屬工會會址內進行。許多工會都把會址設於大廈的最高樓層，原因之一是可利用會址的天台，擴大活動空間，容納更多會員的聚會。例如摩托車職工會的天台便佔有幾個住宅單位的面積，而會員經常利用天台進行不同類型的活動，甚至於在重要的日子，搭建臨時舞台演戲。¹²

除了日常的聯誼，粵劇是當時工人聯歡的主要表演節目之

-
- 8 這是粵劇伶人新馬師曾(1916–1997)的首本戲之一，1950年在香港首演。劇中的主題曲透過舞台、電影及電視等媒體、廣泛流傳，特別是自1960至1990年代在電視的慈善籌款節目不斷出現，早已成為香港文化之一部份。
- 9 見1953年3月20日《華僑日報》社團動向。
- 10 香港工會聯合會成立於1948年，現有186間屬會和63間贊助會，合共有249間工會，涵蓋不同的行業，是香港最大規模的工會組織，見工聯會官方網頁<http://www.ftu.org.hk/zh-hant/about?id=12>。
- 11 黃、張二人均是當年南國粵劇團的活躍成員。黃少俠，藝名丁一，是百貨業工會會員，稍晚於張明加入劇團。他歷任南國劇團的音樂領導，並負責音樂創作和設計。1990年代，黃少俠自銀行退休後，再度活躍於社團粵曲的伴奏和創作。張明，筆名張振羽，原是煤氣工會會員，約於1957年加入工人業餘粵劇團，歷任劇團的編劇，1970年代於入榆園體育會工作，1980至90年代任職於香港聯藝公司，負責中國大陸藝術團體來港演出的安排。本文有關他們的言談源於2004年的訪問，而大部份資料補充則是來自近年的交談和考證。
- 12 據張明憶述，摩托車職工會的會址所在位置就是現今尖沙咀新世界酒店對面，當時會址所在的天台經常被用作節目慶典的活動場地。

一。左派的工聯會及其屬會的粵劇組，或粵曲班，在每年的3月8日婦女節、5月1日勞動節和10月1日國慶聯歡會的節目都演出粵劇，或歌唱粵曲。¹³ 1956年，工聯會一連3晚在會址的天台舉辦了「第一屆工人戲劇歌舞匯演」，粵劇是其中的主要項目。這一次匯演，工聯會副理事長徐振材在開幕辭中，明確指出發展文娛康樂活動是工聯會代表大會的重要議決事項之一，他也聲明工聯會經已議決，大力發展工人喜愛的戲劇、歌詠及舞蹈等文娛活動，並以此擴大工會在社會上的影響力。¹⁴

工會除了以會址作為主要活動場地，亦時常租用戲院或社區會堂進行活動。工聯會和它的屬會早於1954年，開始把工人的文娛表演展現於公眾，甚至租用戲院演出粵劇。例如1954年3月的「三八」婦女節，工聯會租用了九龍普慶戲院，由來自不同屬會的十多位女會員，演出了古裝粵劇折子戲《梁山伯與祝英台》。同年4月，工聯會屬下的港九勞工教育促進會協助旺角勞工子弟學校，簡稱「勞校」，募集經費，¹⁵

13 一般來說，粵劇表演涉及唱、做、唸、打，以至於化妝、服飾及舞台裝置等等，各式各樣的表演元素，是一種綜合性表演形式，而粵曲往往更多強調歌唱，表演形式也相對簡單一些。

14 見〈工聯文娛會演節目精采〉，載於1956年9月22日《大公報》。

15 當時香港社會一般稱呼這類學校為「左派學校」，而左派人士則稱之為「愛國學校」，勞校是當時香港眾多左派學校之一。正如學校的名字，勞校的對象主要是左派工人的子弟，因而一直獲得香港左派工會和其他左派團體的支持。實際上，左派學校的師生在1960年代的香港工運扮演着極重要角色，據梁家權的說法，「一直以來，殖民地的港英政府對與中方有聯繫的左派學校很有戒心，並非在67年大暴動才警覺。……原來50年代末、60年代初，港府以為左派已被「陰乾」至苟延殘喘、不堪一擊，『六七』前幾年完全掉以輕心，結果讓左校有培植力量的機會」引自梁家權等(2001)《英方絕密檔案曝光：六七暴動秘辛》，香港：經濟日報出版社，頁93。

租用港島的高陞戲院，由不同屬會的會員再度演出古裝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和時裝的《二八嬌妻一歲郎》兩個粵劇劇目。¹⁶

工聯會從1950至1960年代經常為「勞校」籌募經費，公演粵劇是主要活動之一。工會與左派學校的這種合作關係，促成左派學校師生參與工會活動的機會，左派學校的合唱隊及中樂隊不僅經常參與工會的文藝活動演出，當中不乏粵劇的演出。據黃少俠和張明指出，不少工會的粵劇團團員都是來自左派學校，無庸置疑，當時左派學校的師生正是工會會員的重要來源之一。筆者曾訪問當年勞校的一位負責培訓學生音樂演奏和粵劇表演的老師——陳幹夫。他從1950至70年代指導了不少學生參加校內的音樂表演、校際音樂比賽，以及工聯會的粵劇演出。例如嚴觀發、張秋榮及何東球等，近年頗為活躍的粵劇樂師都是來自勞校的畢業生。當年，他們在老師的鼓勵下，曾積極參與工會的粵劇演出。¹⁷因此，左派工人的粵劇活動實際又成為工會長遠發展會員的主要途徑。

有了龐大的社會基礎，工人的粵劇活動發展得更有組織性。工人業餘粵劇團，又稱港九工人業餘粵劇團，於1956年正式成立，成員大都是來自工聯會的不同屬會。當年，劇團在港島的高陞戲院初次演出古裝粵劇《梁山伯與祝英台》全劇。據張明指出，劇團在1957年演出古裝粵劇《金玉奴》的時候，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已包括了工聯會屬下的勞聯、中電、打銅等屬會會員。往後的幾年，頻密的演出吸引了更多

16 九龍的普慶和港島的高陞都是1950年代兩家香港最主要用作演出粵劇的戲院。

17 2011年4月19日訪問。

愛好粵劇的工友參加，劇團日漸壯大，在不同的場合演出大量劇目，例如古裝粵劇《搜書院》(1958)、《信陵君救趙》(1958)、《花木蘭》(1959)，又例如時裝粵劇《愁龍苦鳳笑顏開》(1959)。¹⁸ 劇團除了舞台的演出，更參與電影的攝製。古裝粵劇電影《喬老爺上花轎》(1959)由工人業餘粵劇團擔綱演出，改編自居於中國大陸的名伶馬師曾的作品——粵劇《喬老爺上轎》(1958)。¹⁹

工人業餘劇團演出的劇目大都是改編自中國大陸的劇作，而這些劇目大都創作於1949年後中國大陸的戲曲改革政策下。²⁰ 無疑，基於市場效益和政治立場，一般香港的粵劇團當時都不會演出含有強烈政治意識的劇目。但是，香港左派工會支持的工人業餘劇團毋須考量市場效益，卻要有一定的政治立場，正適合在香港推廣這些劇作，並在香港逐步實踐中國大陸的戲曲改革運動。

工人業餘劇團的團員皆是業餘愛好者，沒有受過專門的粵劇培訓，早期的演出水準不高，但團員通過經常演出，不斷累積舞台經驗，水平也有所提升。更重要的是，當時中港兩地的政治制度存在差異，但工人業餘粵劇團有左派工會的支

18 有關工人粵劇團在1950年代的發展參看小饅〈飲譽港九的工人粵劇團〉的報導，見1959年1月7日《文匯報》。

19 電影由新聯影業公司製作，羅志雄導演，主要演員包括：李覺、溫雯、陳東、湯明慧(即江雪鸞)、劉耿、梅芷等等，1959年1月22日首映。有關香港音樂、電影和政治的討論見余少華(2001)〈香港電影音樂：歷史與政治在香港電影〉，載於《樂在顛錯中：香港雅俗音樂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119-166。

20 由中國文化部召開的全國戲曲工作會議於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10日在北京舉行，會上討論了全國戲曲改革的政策，涉及戲曲的劇本、演出、教學及劇團制度等各方面。基於這次會議，政務院於1951年5月5日發出〈政務院關於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見1951年5月7日《人民日報》。

持，劇團的演員、樂師及編劇者經常有機會被安排到中國大陸參觀和學習，從而認識很多中國大陸的戲曲表演新元素。據張明指出，當年他們被安排到中國大陸參觀，有機會觀摩到不同地方戲曲的演出，從中學會不少新的表演方法，而這些方法都不是一般香港的劇團輕易接觸到的。工人業餘粵劇團的團員最終把各式各樣的表演新元素引入香港。

這些表演元素開創了香港粵劇的先河，例如1958年工聯會為了興建工人大會堂籌募經費，²¹ 工人業餘粵劇團在香港大戲院演出《信陵君救趙》，²² 劇中〈夷門薦別〉的一場，團員與來自工聯會的合唱團演唱了一段混聲大合唱，這參考自中國大陸戲曲改革的表演方法開拓香港粵劇引入多聲部大合唱的先河。在伴奏樂隊和樂器方面，劇團受到當時中國大陸的樂器改革影響，專門為伴奏樂隊訂造一個低音大阮，加強了粵劇伴奏的低音效果。同時，劇團模仿中國大陸的民樂團，吸納左派學校能演奏樂器的師生，擴大了粵劇樂隊的編制，發展多聲部的戲曲伴奏。除了音樂，劇團的新元素還包括舞台技術的創新，例如引進「打字幕」及幻燈天幕等舞台效果。關於「打字幕」的方法，據張明憶述，當時團員利用工聯會屬下工人醫療所的X光負片技術，²³ 於演出時把曲詞投射到舞台兩側，讓觀眾在觀看演出的過程中，可以藉字幕瞭解劇

21 現稱工人俱樂部，即土瓜灣的工聯會會址。

22 據張明指出，即現今灣仔合和大廈所在位置。

23 工人醫療所是工聯會為會員提供廉價醫療福利的設施，創辦於1950年，主要透過設於屬會的會址提供西醫門診服務，1952年更先後開辦X光化驗所及留產所，並在1955年成立第一間中醫診所。詳見香港工會聯合會工人醫療所的官方網頁http://www.ftuclinics.org.hk/tc/about_us/background.html。

情發展。劇團採用的新元素吸引了專業戲班，例如當時香港最大型的商業戲班——仙鳳鳴劇團，在演出《再世紅梅記》(1959)時，便聘請了工人業餘粵劇團負責「打字幕」的工友，協助投放字幕。

粵劇作為社會化工具

1960年代初，工會銳意拓展會務，左派工人的粵劇因而得以進入另一新階段，一個更具規模的工人粵劇團誕生了。據黃少俠和張明指出，工聯會當時積極開拓會務，全面建立工會與社會各階層的關係，進行工會稱之為「社會化」的計劃，主要策略是把工人業餘粵劇團發展成一個商業性演出的藝術團體。1961年6月，以工人業餘粵劇團為基礎的南國粵劇團正式成立。關於劇團名稱的源起，據張明等創團成員回憶，當初採納「南國粵劇團」的名字，是希望突顯粵劇是中國南方的主要戲曲藝術，而且這個名字更接近一般商業粵劇團的名稱，有利於劇團在社會上發展。

劇團的名稱雖然不再包含「工人」的字眼，可是南國粵劇團的台前幕後工作人員，絕大部份仍是來自工聯會的會員和家屬，例如團員嚴祝齡和李覺來自洋務工會，何少明與梅芷夫婦來自打銅工會，溫雯來自海事處職工會等等。南國粵劇團的演員方面包括擔任生角的李覺、何少明，旦角的溫雯、梅芷，武生的郭建民，老生的歐陽德，丑角的劉耿、陳東，以及劉聯光、梁慧筠、文靜、李明、何劍雲、岑綺玲等主要演員；劇團的伴奏樂隊又稱南國音樂社，亦是以工人業餘粵劇團伴奏樂師為骨幹，黃少俠是音樂領導之一，擊樂領導是

卓劍雄，劇團的編導組主要由張明負責。

南國粵劇團的骨幹主要都是來自工人業餘粵劇團，但從組織、訓練及演出，劇團明顯朝着專業劇團的模式發展。當初，工人業餘粵劇團在行政和表演都處於業餘水平，每次演出往往依賴各屬會會員臨時湊合而成，例如全職擔任南國粵劇團經理的嚴祝齡就是工人業餘粵劇團的團長。除了幾位團員受聘全職處理行政和對外事務，南國粵劇團的團員都不是全職的粵劇工作者。據張明說，縱然南國粵劇團開始了商業性的公開表演，絕大部份團員仍舊利用工餘時間參加排練及演出，每當遇上演出頻密時，團員總是千方百計抽空出席。他便經常利用不同的藉口請假，參加劇團的活動，尤幸得到上司諒解，容許他偷空參與。

更重要發展是，南國粵劇團不僅設立固定的行政領導架構，還擁有固定的排練場地和訓練團隊。劇團初期租用灣仔通明大廈3樓的一個單位作為會址，²⁴ 劇團並聘請了多位專業導師，例如由粵劇伶人靚元亨和譚珊珊指導唱與做，京劇男武旦祁彩芬訓練把子功，粵劇樂師孔仕教授《六國大封相》等傳統排場。透過定期和集中的培訓，團員的表演技術有很大的進步。

南國粵劇團的演出較工人業餘粵劇團時頻繁得多，演出場合也更多樣化。例如1961年9月，劇團的骨幹成員在香港麗的呼聲銀台錄播《牡丹亭之尋夢還魂》多個主要唱段。1962年，劇團應聘參與粵劇電影《龍女三娘》的拍攝，²⁵ 這齣電

24 據黃少俠憶述，劇團於1965年遷往土瓜灣的工人俱樂部大廈，並以此為劇團的排練基地。當時，他也透過工會的關係遷入隔鄰的大廈，方便參與劇團的活動。

25 粵劇電影《龍女三娘》改編自傳統神話故事《柳毅傳書》。電影由李鐵、

影改編自劇團曾演出過的粵劇《柳毅傳書》舞台版本。同年，劇團灌錄了粵劇《蘇小小》的聲帶，並以卡式錄音帶公開銷售。也在這一年，劇團開始演出神功戲，首演的地點在大澳。此後，劇團演出神功戲的地點遍及長洲、西貢、筲箕灣、灣仔修頓球場和旺角麥花臣球場。另一方面，劇團也經常在戲院和社區會堂演出，劇團曾於1962年初支持《華僑日報》的救助學童運動籌款活動，在旺角伊利沙伯場館連續多晚演出《柳毅傳書》、《三鳳爭鸞》(即《拉郎配》)及《牡丹亭》等劇目。到了1964年，劇團更在香港大會堂與當時成立不久的雛鳳鳴劇團，²⁶ 同台為慈善公益演出。²⁷

劇團初期的經費主要依賴工聯會的資助，全職職員包括擔任團長的嚴祝齡，主管劇團的行政事務，相當於行內的「班政家」職位，溫雯和梅芷是劇團的正印花旦，獲聘全職協助行政事務和宣傳活動。但據張明透露，劇團的全職人員工資並不高，待遇僅相若於當時一般工人，至於其他以業餘身分參與活動的團員，在排練或演出初期都沒有金錢上的報酬。據岑綺玲回憶，²⁸ 正如工人業餘粵劇團時期，南國粵劇團的團員最享受的福利只是每次演出前劇團提供的一頓「大鍋

李鑾、黃啟聯合導演，孟江龍編劇，歐陽德、李覺、溫雯、羅麗貞、朱活珍、梅芷、劉聯光等南國粵劇團演員主演，香港飛鷹影業公司出品，1963年2月3日在香港公映。

26 雛鳳鳴劇團是一個商業營運的劇團，由伶人任劍輝(1913-1989)、白雪仙支持，主要演員大都是她們的門生，劇團在1960至1990年香港粵劇發展扮演重要角色。據張明回憶，雛鳳鳴劇團早年曾借用工人俱樂部作排練場地。

27 據張明和黃少俠指出，左派機構在1950和60年代，申請香港殖民地政府管理的文化康樂場地，用作工會的公開活動是非常困難的，也很少獲得批准。

28 岑綺玲是黃少俠的太太，亦是劇團的花旦之一。

飯」。後來，當演出愈來愈頻密，特別是受聘演出神功戲，劇團有一定的收入，便在每次演出後發給每位團員3元的津貼。²⁹ 她還記得團員獲酬最高的一次，是1962年劇團應聘參加粵劇電影《龍女三娘》的拍攝，這次演出為劇團帶來2,000元收益，最終每位台前幕後團員均獲酬40元。從這種平均化酬勞的制度來看，南國粵劇團縱使在資本主義的香港社會，卻實踐中國大陸的集體生活模式。

南國粵劇團的團員都沒有加入香港的粵劇行會——香港八和會館，談不上是粵劇的「行內人」，但他們也尊重行內的一些傳統習慣。例如演出神功戲，³⁰ 仍參照商業劇團的傳統習慣，首先演出《六國大封相》、《加官》及《送子》等「例戲」。³¹ 至於一些較專門的「例戲」，如《祭白虎》，因為團員的技藝有限，劇團會聘請行內的專職藝人，例如何少松，協助演出。又例如，當時的神功戲還流行演「天光戲」的習慣，即是由一、兩位資歷較淺的藝人，通宵為神鬼表演。這種演出涉及大量的即興表演，南國粵劇團的團員皆沒有受過這傳統的訓練，劇團也只好聘請行內人代勞。³²

南國粵劇團的成立目的主要是擔任左派工會融入香港社

29 這是張明所提供的口述資料。然而，據憶述，不論所佔戲份多寡，各人的津貼金額都是每次每人7元。同時，岑綺玲強調當時的團員都不太計較酬勞，而這種服從分配與崇尚集體行動的表現，都是源自工人業餘粵劇團的傳統。

30 神功戲是地方上演戲酬神的民俗活動，當1949年後逐漸消失於中國大陸，香港卻一直保留這風俗傳統，見陳守仁(1996)《儀式、信仰、演戲：神功粵劇在香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粵劇研究計劃。

31 粵劇演出時，劇團保留的傳統劇目。

32 有關粵劇的即興演出，以及近代香港粵劇的特色，可參考陳守仁(1999)《香港粵劇導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粵劇研究計劃。

會的橋樑角色。故此，劇團也採用了一般商業劇團的營運手法，重視宣傳，例如1961年8月，劇團先後在香港高陞、九龍普慶及澳門永樂等戲院公演古裝粵劇《牡丹亭》。團長嚴祝齡向新聞界宣傳，獲得不同政治立場的報章報導，下面是《華僑日報》在娛樂版報導他對劇目的詮釋：

[牡丹亭]在古典文學有很高的地位……[它]歌頌了青年男女堅貞不拔的愛情，和追求幸福的不懈努力，充滿了浪漫主義的精神。因此，在古典戲曲中享有盛名，過去在各種劇種中，都有牡丹亭的劇目。現在由南國粵劇團編導組重新改編為粵劇……劇中保留原著精神、情節和美麗的文字，有雅俗共賞之妙。³³

正如《牡丹亭》一劇，以「帝王將相」或「才子佳人」為主題的劇目常見於南國粵劇團的初期演出，其他類似的傳統題材劇目如《西施傳》(1963)和《李香君》(1964)。據黃少俠指出，工會對劇團的劇目選材有一定的要求，那就是劇目必須主題健康。因此，劇團演出的劇目大都是改編自國內的新編劇目，可是為了迎合一般香港觀眾，劇目的題材往往又以傳統為主，或是較少政治色彩。這種情況直到1964年才因應中國大陸的政治環境而產生變化。

粵劇作為文藝武器

從1963年到1964年，毛澤東多番撰文，嚴厲批評負責文化

33 見1961年8月18日《華僑日報》。

的官員，直斥他們未有積極推動文藝服務政治的政策：

《戲劇報》盡是牛鬼蛇神……文化方面特別是戲劇大量是封建落後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東西少，在舞台上無非是帝王將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應注意這方面的問題，為之檢查，認真改正。如不改變，就改名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國死人部。³⁴

毛澤東認為，中國大陸自1949年以來的戲曲創作和演出，仍舊以傳統為主，主題盡是圍繞「帝王將相」和「才子佳人」，根本未有貫徹他所指示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的要求，歌頌社會主義的發展。終於，在毛澤東的影響下，自1964年開始，全中國大陸的戲曲迅速轉向歌頌當前政權的現代劇目創作和演出，傳統劇目，尤其是帝王將相和才子佳人為主題的劇目都消失於中國大陸的戲曲舞台上。³⁵

中國大陸的文藝政策的轉變直接反映在香港的工人粵劇活動中，南國粵劇團明顯遵循當時中國大陸的政治方向轉變，自1964年停演古裝粵劇，特別是以帝王將相和才子佳人為主題的傳統劇目，並減少商業性演出。往後的日子，團員更多留在工會的節慶活動中，以小組形式，或以工人業餘劇團的名義，演出一些時裝短篇粵劇，甚或參與政治宣傳的「活報

34 見〈中央文藝工作會議(1964年1月3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網址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51935/176588/176596/10556213.html>。

35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舉行的第一屆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標誌了中國大陸戲曲改革在全中國展開另一階段，見李松編著(2011)《「樣板戲」編年史》，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頁171。

劇」演出。³⁶到了1967年，劇團的發展又再踏入另一階段，那是一個更明確的「文藝為政治服務」實踐的時期。

正如《人民日報》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³⁷中國大陸的政治運動不單止席捲全國各地，也蔓延到英國殖民地的香港。當年5月前後，香港出現了一場極大規模的社會動亂，港英政府稱之為「六七暴動」，而左派團體則稱之為「反英抗暴」或「五月風暴」。據梁家權引述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黃文放的闡析：

「六七動亂」是香港歷史上最大的一場社會動亂，因素當然是多方面的，文革背景也只是其中一個方面，但這是重要的方面。當時香港社會因素，以及英國人長期迫害香港左派引起的反彈也是重要研究方面。³⁸

1967年5月28日，香港《大公報》頭版轉載了中國大陸《人民日報》刊登的毛澤東〈關於文學藝術的兩個批示〉，³⁹重申當時中國大陸的文藝創作和表演方針，這也成為當年香

36 據張明解釋，「活報劇」就是短篇話劇，常見於工會的表演活動，多以時人時事為題材，間中加插音樂和歌唱。

37 見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

38 見梁家權等(2001)《英方絕密檔案曝光：六七暴動秘辛》，香港：經濟日報出版社；有關1967年暴動亦可參看周奕(2002)《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文出版社。

39 毛澤東曾兩度發出批示，包括1963年12月12日〈柯慶施同志抓曲藝工作〉和1964年6月27日對中央宣傳部文藝處〈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草稿)〉。這兩個批示明確重申了當時中國大陸對文藝創作的政治控制，也為香港左派的文藝創作定出意識形態的框框。

港左派工會抗爭殖民地政府的指導思想。作為工聯會屬下的一支文藝隊伍，南國粵劇團積極參與不同形式的政治宣傳，鼓舞左派工人的士氣，對抗殖民統治。1967年10月1日，劇團在工聯會的國慶遊藝晚會上公演了一齣粵劇折子戲——《紅燈記》之〈刑場鬥爭〉，據說演出大受觀眾歡迎。一個月後，劇團改編了全本的《紅燈記》，並命名為「革命現代鑼鼓粵劇」，在九龍普慶戲院正式公演。⁴⁰

南國粵劇團的《紅燈記》改編自京劇《紅燈記》。京劇《紅燈記》是著名的八大「樣板戲」之一，是1960至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⁴¹期間全中國大陸能夠經常公演的幾齣戲曲劇目之一。「樣板戲」一詞初見於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報》社論〈革命文藝的優秀樣板〉，文章中統稱8個當時在北京公演的戲曲劇目和音樂曲目，包括京劇《智取威虎山》、《海港》、《紅燈記》、《沙家浜》、《奇襲白虎團》，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交響音樂《沙家浜》為「革命樣板戲」。⁴²據一本香港出版的書籍定義樣板戲：「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⁴³這些劇目當時備受官方推崇，全中國大陸各地方戲曲迅速爭相效應，身處殖民地香港的工人的步伐不比中國大陸的粵劇團走

40 見1967年11月10日《文匯報》。

41 1965年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普遍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的開端，見毛澤東(1967)〈對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講話〉，載於《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據日本小倉編集畫版重印版本，頁673-679。

42 演出名為「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週年」，見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報》；毛澤東(1942)《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67，第1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43 見楊學群編(1970)《革命樣板戲和〈智取威虎山〉》，香港：朝陽出版社，頁3。

得慢，⁴⁴ 南國粵劇團配合當時本地的工運發展，改編和公演了《紅燈記》這一齣樣板戲，迅速把中國大陸文革中的戲曲改革完全實踐於香港社會。

正如中國大陸宣傳口號，樣板戲「做到了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⁴⁵ 香港左派工人引入樣板戲，用作對抗殖民地政府的文藝武器。然而，為甚麼香港左派工人在多齣樣板戲當中選擇《紅燈記》？這可能跟《紅燈記》的故事人物和情節有很大的關聯。《紅燈記》的故事講述抗日戰爭時期，一個共產黨人在偽滿州地區以鐵路工人掩飾身份，從事情報工作，在一次行動中身份敗露，被捕入獄，最終遭處決，他收養的女兒在同樣是共產黨人的祖母指點下，最終成功代父完成任務。⁴⁶ 《紅燈記》全劇歌頌工人和工人家屬都是正面英雄人物，完全符合後來樣板戲的「三突出」人物塑造原則。⁴⁷ 從《紅燈記》的劇情來看，它切合當時香港左派工人心態，而情節中描寫工人和家屬身份的主角與敵人鬥爭，更令工人很容易把自己對抗殖民地政府的處境聯想起來。南國粵劇團的粵劇《紅燈記》出現，既配合當時中國大陸的政治運動，又符合香港左派工人所處的社會環境。

44 1960至70年代，廣州的粵劇樣板戲如《山鄉風雲》(1965)、《沙家浜》(1973)及《杜鵑山》(1974)等劇目，見謝彬籌、謝友良(2008)《紅線女創作·生活》，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45 見〈革命文藝的優秀樣板〉，載於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報》。

46 見中國京劇團編(1972)《紅燈記》，北京：人民出版社。

47 「三突出」即是(一)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二)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三)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見于會泳〈讓文藝界永遠成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陣地〉，載於1968年5月23日《文匯報》。

粵劇《紅燈記》為南國粵劇團來帶來一次大型的演出機會，卻也讓她一躍成為一個廣受注目的左派團隊——一支旗幟鮮明反抗殖民地政府的文藝宣傳隊伍。1967年前後，香港政府嚴密監視和壓制左派團體的活動，警察經常突擊搜查左派工會，拘留涉嫌從事政治活動的工人。據張明回憶，團員當年要冒着被拘捕的風險，參加粵劇《紅燈記》的排練和演出。當年，劇團為了保證演出不會因個別團員被捕而延誤，將演員、樂師及工作人員分成兩、三個梯隊，輪番演出；部份團員更是長期留宿於戲院後台，避免在返回工會時，遭到逮捕。據黃少俠憶述，當年警方曾進入劇團團址的工人俱樂部搜查，而團員也經常受到警方監視，更有團員被捕，而他也曾因為返回工會籌備演出，被拘留了24小時。

然而，有趣的是，正因為大部份團員都參加了左派工會號召的罷工，可以放下平日忙碌的工作，全情投入排練，劇團只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便正式公演這一齣樣板戲粵劇。粵劇《紅燈記》在香港高陞戲院、九龍普慶戲院和澳門永樂戲院，連續公演了過百場，創下一齣粵劇在香港和澳門戲院連續公演最長時間的記錄。⁴⁸

據負責音樂設計的黃少俠指出，南國粵劇團的粵劇《紅燈記》就如京劇《紅燈記》，無論音樂和表演形式都跟傳統戲曲有很大分別。粵劇《紅燈記》沒有傳統的生、旦、淨和丑等行當分工，取而代之是以故事中不同的人物身份和性格為主導，例如原來在劇團擔任正印花旦之一的梅芷，在粵劇《紅燈記》中負責扮演李奶奶——男主角李玉和的年邁母親。這種演出的改變對習慣古裝戲演出的團員是一項挑戰，

48 見《文匯報》、《大公報》等香港左派報章當年的報導。

他們要重新適應這種革新的表演形式。據張明指出，幸好團員既非傳統科班出身，加上自1964年開始便經常演出時裝粵劇或「活報劇」，因而很快便適應這種非傳統的「樣板」戲曲演出。

南國粵劇團的粵劇《紅燈記》出現在1967年的香港政治環境，符合當時中國大陸與香港的政治環境，獲得香港左派的一致認同。香港《文匯報》主編金堯如撰文〈向粵劇紅燈記大鼓掌〉，並刊登在報章的頭版，充分肯定劇團以粵劇《紅燈記》的演出有效地支援了工運。⁴⁹同期的香港左派報章對劇團的演出有不少正面的報導，例如一篇以芳姚署名的評論文章：

粵劇同其他地方戲曲一樣，它的表演程式(包括唱與做)是同現實生活不相同的……在現實生活中如果有人像戲曲演員那樣開口「白攪」、「中板」，動起來就舞手動腳，那會使人認為[他]是瘋子。但在舞台上，這些表演程式不但可以使觀眾覺得合乎現實，而且比一般的現實語言和動作更感人，更具有吸引力和影響力——就在這方面，顯出了戲曲的優點，顯出了它的藝術力量。⁵⁰

粵劇《紅燈記》受到香港左派的肯定，鼓舞了工會計劃另一次的大型演出。兩年後，南國劇團終於再接再厲，排演了另一齣「樣板」粵劇——《智取威虎山》。

49 見1967年12月14日《文匯報》。

50 同上註。

樣板戲的香港實踐

南國粵劇團的粵劇《智取威虎山》改編自同名京劇樣板戲。京劇《智取威虎山》劇情講述1946年，東北中共游擊隊成功打擊盤踞於威虎山，由國民黨支持的地方武裝勢力。⁵¹ 這齣樣板戲的創作源於小說《林海雪原》，中國京劇院和上海京劇院分別根據小說改編為京劇劇本，並參與1964年6月5日在北京舉行的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1965年，于會泳在江青支持下進一步改編此劇，⁵² 並於1968年攝製成京劇電影《智取威虎山》，在中國大陸及香港各地公映，成為樣板戲的經典之一。⁵³

對於南國粵劇團來說，排演粵劇《智取威虎山》「是一個光榮艱巨的任務」。⁵⁴ 因為無論在音樂、表演、服裝、道具和舞台設計等各方面，粵劇《智取威虎山》都較南國粵劇團昔日演出的劇目要求高。為了排演《智取威虎山》這齣戲，劇團的負責人、編導及音樂領導等，隨同香港左派文藝界人士到廣州，參加移植樣板戲的學習會議。一個月後回港，他們才開始編撰和排演樣板戲《智取威虎山》的粵劇版本。南國粵劇團的粵劇《智取威虎山》由張明負責編劇，黃少俠負責作曲和音樂設計。劇團在演出中加入合唱和大型的混合樂

51 同註4，頁27-44。

52 于會泳原為上海音樂學院教師，受江青青睞，文化大革命期間官至文化部長，專門負責樣板戲的工作。他對戲曲音樂有一定研究，見于會泳(2008)《腔詞關係研究》，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

53 有關《智取威虎山》等樣板戲的發展及討論文章可參看李松編著(2011-2012)《「樣板戲」編年史》，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4 見〈各業工人排演革命現代粵劇，《智取威虎山》進入精排階段〉，載於1969年8月23日《文匯報》。

隊等，以至加入一些從未出現在香港粵劇的音樂和曲詞，像歌曲《東方紅》、《國際歌》、毛澤東的語錄和詩詞等等手法，都是香港戲曲表演和音樂創作上的大膽嘗試。然而，改編《智取威虎山》較早前的《紅燈記》困難得多，箇中原因並非藝術創作或表演的問題，而更多是政治的考量。南國粵劇團的粵劇《紅燈記》很大程度上改動了京劇樣板戲的音樂和曲詞，這是中國大陸的文藝部門不認同的做法。⁵⁵

1960至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國各地的地方戲曲團體紛紛「移植」樣板戲。⁵⁶ 據黃少俠說，樣板戲的改編有嚴格的要求，首先，樣板戲可以「移植」，而不應該「改編」。「移植」重點在於，不能太多的改動原有情節和曲詞，縱有改動，也不能偏離京劇版本太遠，更不可有即興表演。除了聲腔採用地方戲的素材，演員的身段台步都要效法京劇樣板戲，甚至音樂和樂隊的人員編制亦要仿照京劇樣板戲的格式。雖然粵劇採用西洋樂器，甚至於加入西洋音樂元素，早有大量先例可援；⁵⁷ 可是，南國粵劇團的粵劇樂隊在排演此劇時，加入西洋樂器及嘗試分聲部演奏則是仿效京劇樣板戲的做法。⁵⁸ 事實上，全國各地在移植樣板戲的過程中，無論編劇和演員，可發揮的空間很有限，他們往往只能盡量模仿京劇樣板戲，依樣畫葫蘆。

55 據張明憶述，當時並無受到直接的批評，而是過了一段時間，才間接知道有中國大陸官員不認同劇團的改編手法。

56 同註 53，頁 93。

57 早在 1930 年代，從業員已經加入不少西方音樂元素到粵劇當中，這個情況尤其在香港表現得更為明顯，只要聆聽 1950 年代及以前的粵劇、粵曲唱片，還可清晰分辨西方樂器的演奏和西洋音樂風格的大量應用。

58 樂隊增加了手風琴和銅管樂，見〈工人民樂隊的成長〉，載《文匯報》1969 年 8 月 23 日。

縱然粵劇《智取威虎山》的演出仍然獲得香港左派的大力讚賞，一份左派報章讚賞此劇的唱腔有一定創新，「幾個演員的唱段，也都不是完全根據粵劇曲牌照唱，可以聽得出來，每一個唱段對某些舊曲牌的唱法都有突破，並有所創造。」⁵⁹ 例如，劇中第4場的主題曲〈革命熔爐中百煉成鋼〉：

譜例1 粵劇《智取威虎山》第4場主題曲〈革命熔爐中百煉成鋼〉選段⁶⁰

革命熔爐中百煉成鋼
(甲劇「智取威虎山」主題曲)

1=G

(英雄白) 朔風凜冽林炮好，奔迎峽谷震四方。(敲鑼樂起)

(由「紫雲月」) 05 35 | 2 1 2 3 | 5 - - - | 3 4 3 2 | 1 - - 0 | 6 · 1̇ 6 5 |

漫 天 風 呼 雪 吹 射 千 里

2 1 2 3 | 3 5 - (6 | 5 6 5 -) | 6 · 1̇ 6 5 | 3 4 3 - - | 3 0 (4 3) | 2 1 2 3 |

原 飛 騰 象 展 一 望 盡

6 5 - - (6 | 5 6 5 3 | 2 3 5 - | 5 3 5 3 2 | 1 2 1 - | 1 0 (1 - | 6 6 0 5 |

山 翻 滾 披 上

3 · 5 6 i | 5 6 3 - | 3 4 3 2 | 1 4 3 2 | 1 - 6 2 6 5 | 3 4 3 2 | 1 - - 0 |

6 · 5 6 i | 5 - - 0 | 3 - 6 i | 6 5 6 5 3 | 2 - (2 3 2 | 6 1 2 0) | 3 · 5 6 4 |

一 派 大 好 北 國 風 光 又 怎 忍

6 5 3 6 | 2 - 6 5 | 2 1 2 - | 2 0 (3 -) | 5 6 i - | 6 · 1̇ 6 5 | 3 · 5 6 i |

此 嶽 兩 山 河 虎 去 狼 來 既 便 蒼 生 再 受 侮

5 - - 0 | 1=C (± 3 拍 板) (0 0 6 i | 5 6 4 5 | 3 4 3 2 | 1 6 3 5 | 6 i 5 - |

創

59 見止戈〈看粵劇《智取威虎山》談唱〉，載《文匯報》1969年9月23日。毛澤東借用清末洋務大臣張之洞的觀點，指示音樂家在音樂工作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要大膽引入西方音樂和樂器來豐富中國音樂，見毛澤東1956年8月24日〈同音樂工作者的講話〉，載《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60 黃少俠手稿。

從譜例1中看到，黃少俠巧妙地採用了不同的粵劇音樂元素譜寫京劇版本的曲詞，例如「英雄白」、「土工慢板」，更把原本的京劇樣板戲曲詞譜上粵劇小曲《寒關月》的旋律。⁶¹ 這種安排在歌曲創作上難度極高，但黃少俠卻能夠做到既盡量保留原曲的曲詞，又採用了粵劇的常用音樂素材，為這樣板戲增添了一點地方音樂色彩。⁶²

粵劇《智取威虎山》在改編時保留了京劇版本的風格和大量內容，創作空間很少，難度很大。根據張明和黃少俠後來的分析，縱使得到工會的全力支持，劇團也花了不少人力和物力，粵劇《智取威虎山》的演出卻並不像粵劇《紅燈記》在社會上反應那麼熱烈，而且演出的次數也少得多。⁶³ 他們總結，粵劇《智取威虎山》可能太「樣板」，不像傳統的粵劇，喚不起香港戲曲觀眾的興趣。

《紅燈記》和《智取威虎山》這些樣板戲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不僅佔據了中國大陸的大眾傳播媒體，也透過左派工人的粵劇活動呈現於香港社會。1960年代後期，中國大陸把樣板戲逐一攝製成電影，在各地公映。筆者記起年幼時，多次隨父母在香港的左派電影院，觀賞這些樣板戲電影，原因當時左派機構透過各式各樣的渠道贈送戲票，鼓勵香港市民入場觀看。綜觀樣板戲由左派工人在1960年代以粵劇形式引入香港，而中國大陸拍攝的樣板戲電影在1970年代的播放，促使

61 「英雄白」是粵劇的一種唸白，「土工慢板」是一粵劇的一種音樂板式，《寒關月》則是一首創作於1930年代的粵劇小曲。

62 有關黃少俠對粵劇音樂的論述見黃少俠(1999)《粵曲基本知識》，香港：臬皮匠出版社。

63 1969年一共只演出19場，見〈向粵劇《智取威虎山》喝采〉，載於1969年8月23日《文匯報》。

這種政治文藝產物更廣泛在香港流傳。到了1973年，無論是收費的麗的電視和不收費的無線電視，這兩間香港的電視台也先後播放了樣板戲《紅色娘子軍》芭蕾舞劇。從樣板戲在香港的傳播，也可以看到電影和電視這些現代大眾傳播媒體當時正逐步取代傳統戲曲舞台的文化傳播地位。

工人粵劇的尾聲

1969年底，隨着中國大陸逐步改變它的外交策略，與西方國家改善關係，延續了兩年多的香港左派工人罷工也有了新發展。左派工會指示罷工工人重新投入社會，實行「復、轉、改」的策略。據岑綺玲解釋，「復、轉、改」是要求參與罷工的工人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或轉換工作，又或協助他們改投其他行業。實際上，工會的策略早反映在工人粵劇活動的宣傳中。1969年8月，南國粵劇團積極排練《智取威虎山》，工會曾公開表揚個別工人，讚賞他們為了有效地參加排練，不吝嗇職業的社會地位，毅然放棄工廠工人的職位，投身庫倉搬運的工作，目的是騰出更多時間參與工會組織的活動。⁶⁴

然而，樣板戲的龐大製作經費是工會難以長期承擔的，而更重要是工人的業餘表演能力，不可能達到中國大陸官方對樣板戲的專業要求。據張秋榮憶述，⁶⁵除了1971年《智取威虎

64 見1969年8月26日《大公報》。

65 張秋榮是旺角勞工子弟學校學生，在校學習二胡。1965年畢業，在船廠當學徒，入車床打磨工會，同期開始參加南國粵劇團的粵劇表演和伴奏。雖然他沒有受過粵劇唱做訓練，卻曾在《智取威虎山》擔演一角。

山》的一次重演，⁶⁶ 1970年代的大部份時間，左派工人並未有組織大型的演出，更多的是在個別工人在工會不同的節慶或宣傳活動，配合當時的政治運動演出一些小品或短劇。嚴祝齡策劃了不少劇目，由黃少俠負責設計音樂，演出的地點除了在工人俱樂部，工人也曾獲邀在中國大陸的遠洋客輪明華號，以及以小組形式到廣東省的江門、順德及深圳等地交流演出。

1976年，毛澤東去世，中國大陸發生了重大的政權變化，以毛澤東妻子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倒台，一直由她推動的樣板戲也失去了支持。往後的幾年，中國大陸逐漸容許各地方戲排演樣板戲以外的劇目，一些傳統的戲曲題材也逐步重現各地的舞台上。香港左派工人的粵劇運動也隨着當時中國大陸文藝政策轉變。1978年，工會再度支持工人排演大型粵劇，在專業伶人的支援下，工人以工人粵劇團的名義，改編京劇《楊門女將》(1959)，排演了一齣同名的大型古裝粵劇。⁶⁷

然而，也許是缺乏社會環境的支持，又或是沒有高度的政治干擾，這齣《楊門女將》只像曇花一現，未能把工人的粵劇活動帶回1950和60年代的蓬勃景況。正如1979年元旦的《人民日報》社論，號召中國大陸的人民「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產建設上來」。⁶⁸ 大部份曾經活躍於左派工會粵劇的工人

66 見〈國慶文藝匯演今天開始 高陞戲院今起上演革命粵劇智取威虎山〉，載於1971年9月18日《大公報》。

67 當時，工會邀請了香港的著名編劇葉紹德協助張明改編劇本，又邀請了粵劇藝人林錦棠擔任藝術指導，工人劇團於1978年12月10日在香港北角新光戲院首演了這齣《楊門女將》，見《華僑日報》，1978年12月20日。

68 見1979年1月1日《人民日報》。

都把精力放回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上，在《楊門女將》演出後都陸續淡出這持續近30年的工人粵劇運動。⁶⁹

結論

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予偉大的影響於政治。⁷⁰

無論是1950或1960年代，香港左派工人的粵劇充份反映了當時的時代氣息。左派工人的粵劇興起是1949年後中國大陸戲曲改革政策在香港的延伸。當時，中港兩地政制各異，文化交流受到很大的影響，中國大陸透過左派工會支持的粵劇而影響香港社會，而左派工會亦充份把握了粵劇——這一種當時香港的普及文化，擴大他們與社會的接觸面。

左派工會在1960年代透過一群熱愛粵劇的工人推動其社會運動，粵劇成為工會和社會不同階層建立關係的重要橋樑，工人的粵劇從帝王將相的傳統戲曲演到革命現代樣板戲，從浪漫的才子佳人題材發展為火紅的階級鬥爭劇目，工人組成的劇團在十數年間從一個業餘團體發展成一個商業性演出的粵劇團體，又轉化成一支政治宣傳文藝隊伍，實在有賴工會在財政、人力及物資的支援，以及積極扶植。1967年，南國粵劇團的粵劇《紅燈記》確切地反映了當時香港社會的政治

69 黃少俠夫婦自1980年代便沒有再參與工會的粵劇活動，專注於事業和家庭，直到1990年代初退休後，才重新投身社團粵曲活動，並自行開辦一家粵曲社——一軒樂苑，設帳授徒。

70 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澤東在延安親自主持了一次文藝工作者座談會，全文初刊於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報》。

環境，從某些方面說明左派工人的處境，而1969年的粵劇《智取威虎山》則更多是中國大陸政治運動餘波在香港的呈現。

然而，樣板戲缺乏商業效益，若不是工會的操作，加上一批熱愛粵劇的工人，這種負載濃烈政治色彩的戲曲絕不輕易在香港展現。到了1970年代末，當中國大陸權力一再更替，推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這些曾經活躍於粵劇舞台的工人才把時間和精力放回工作和家庭，那一度因政治運動而火紅的工人粵劇運動也隨之而落幕。

總括而言，香港左派工人的粵劇運動經歷了不同的階段，它印證殖民地後期香港左派工會發展的歷史，反映中國大陸的文藝政策在香港的實踐，也書寫了香港粵劇文化獨特的一頁。

批判與同情

——試論《文匯報》副刊連載小說《港Q自傳》的「香港」想像

張詠梅

引言

《港Q自傳》自1959年2月8日始刊於《文匯報》副刊〈彩色〉版，至1967年4月30日完結。作者署名「香港阿Q」，¹小說主角就叫「港Q」，作者把他塑造成深受資本主義思想影響的負面人物。作者敘述「港Q」不擇手段追求名利，不惜做偏門生意及吃「軟飯」，不願意腳踏實地努力工作，只望投機取巧一朝發達。「港Q」是作者批判的對象，藉「港Q」個性批判香港人自私功利的心態，醉生夢死的人生態度。因此，「港Q」既是作者批判的對象，也是香港社會的象徵。作者從左翼意識形態批判香港資本主義功利社會，藉「港Q」的個性及經歷在《港Q自傳》展現其「香港」想像。

作者選擇以第一人稱敘述觀點，從主角的角度看香港社會的人與事，但主角卻是作者批判的對象，因此，作者盡量在敘述中展現出「港Q」的負面形象，讓讀者感受到主角的可憎可鄙，才能夠達到作者批判的目的。然而，作者有時會藉主角的想法和說話批判香港社會，不免與「港Q」的負面形

1 據羅孚先生1995年1月17日口述，筆者記錄，「香港阿Q」是左翼作者林嘉鴻的筆名，另得黃仲鳴先生協助，向編輯吳羊璧先生查證，證實「香港阿Q」是林嘉鴻的筆名。

象有所矛盾。至1966年，作者安排主角覺悟前非，嘗試重新做人，小說的語調也從批判轉變為同情。小說最後一天的標題是「浪子回頭」，以主角結婚收結全文，但是結束相當倉卒，未及安排主角失業後未來生活的出路，也許是受到五月暴動影響而匆匆收結。

《港Q自傳》以長期連載的形式在左翼報章副刊上刊登，從未出版過單行本，較易受到研究者忽略。筆者從報刊蒐集和整理了原始資料，探討作者的敘述策略如何從批判轉變為同情，從而分析《港Q自傳》如何想像「香港」。

香港資本主義黑暗社會想像

五十年代的香港左翼文化人，基於民族感情及政治傾向，在理想主義的號召下，加上中央的要求和指示，大多從國家民族的立場出發，反對資本主義。當左翼作家把目光投向香港時，往往傾向把香港想像充滿資本主義罪惡的都市。他們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公不義，視之為自己的道德責任和使命，他們對香港的想像深受左翼意識形態的影響，這與左翼小說想像「香港」的角度有密切關係。

《港Q自傳》於《文匯報》副刊〈彩色〉版上連載，《文匯報》是左翼文藝陣營的重要報刊，《文匯報·新文藝》在1950年2月20日創刊不久，編者就在第三期刊出了〈要求反映香港〉一文，文中談到對香港的看法，認為「香港，一個荒淫糜爛的都市」²，論者清楚表述其香港想像，既然香港如此

2 編者〈要求反映香港〉，《文匯報·新文藝》第3期，1950年3月20日，頁5。

「荒淫糜爛」，作者在反映香港時，往往在小說中想像其負面的形象，務求使香港讀者認識到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如何黑暗。《文匯報·新文藝》在1951年2月19日停刊後，《文匯報》在1956年3月2日再創刊〈文藝〉版，創刊號刊登了唐摯〈必須干預生活〉，談到作家的態度與創作的關係：

一個作家在創作時，難以抑止地要把自己對於生活的意見，通過自己筆下的形象傾訴出來，體現出來，這個現象之所以合乎規律，是因為作家要在作品中作為一種正面的力量出現，是因為他要傾全身心去支持他所愛、所贊成的東西，要傾全身心去鞭打他所恨、所憎惡的事物。而且，只有在這樣的時候，形象本身才能帶着這同樣火辣辣的力量闖到生活中去積極地干預生活，只有在這樣的時候，作品才能成為作家干預生活的武器。³

作者以國內「文藝干預生活」的思潮來作為香港左翼文藝的方針，要求作者不單是客觀反映現實，作者的聲音更要介入作品，清楚表現作者的立場。而這個「立場」是有規限的，它必須作為「正面力量」的代表，暴露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罪惡，充份發揮文學的社會作用。

此外，李敏〈向文藝拜年〉也具體談到作品應該如何描寫香港：「將兩個地方(筆者按：即中國和香港)的現實生活展現在讀者的眼中和思想裏，我們將生活作過比較，我們就會知道甚麼東西是好的應該熱愛它！甚麼東西是壞透了的，我們

3 唐摯〈必須干預生活〉，《文匯報·文藝》，1956年3月2日，頁10。

起來詛咒它，甚至是制止它！」⁴ 文中清楚表現左翼作者對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把香港想像成充滿黑暗罪惡的都市。

《港Q自傳》中所展現的香港想像，基本上配合左翼意識形態的要求。作者敘述「港Q」不擇手段追求名利，不惜做偏門生意及吃「軟飯」，不願意腳踏實地努力工作，只望投機取巧一朝發達。作者塑造「港Q」的負面形象以象徵香港社會，批判香港人自私功利的心態，醉生夢死的人生態度，藉以展現其資本主義罪惡社會的香港想像。

(1)對香港社會的直接批判

作者會在敘述中，藉主角的看法直接批判香港社會：

總之香港這個社會，誠如占士甸話齋，是個講銀紙的社會，唔到你講本事者。講銀紙的社會，大抵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了吧。年青人在社會受到挫折，以我港Q的同學來說，大概有三條路可走，其一是受磨練、越有勇氣，呢的叫做打不死精神，從磨練中長成，勇往直前，向上進取，不過，我港Q的這一種同學，百中無一了。勇往直前的精神，本來是好的，但我聽過一個很新奇的名詞，叫做向上爬。書院仔的所謂勇往直前，便是向上爬。為了向上爬，不惜損人利己，只求目的不擇手段焉。在皇家政府打工，至緊要尊敬皇家人，這是向上爬的捷徑，被皇家人打了兩巴掌都活耶術丁橋，零舍易加人工者。世俗眼光，說這種態度是奴顏婢膝咁講，卻不知在皇家保護下的社會搵食，

4 李敏〈向文藝拜年〉，《文匯報·文藝》，1958年1月4日，頁9。

面皮越厚越撈得起。面皮薄的，所謂有骨氣的，其結果可能走第二條路：沉淪下去，用不正當的方法麻醉自己，或感於現實之滿足，做一個平凡保守的人，求其在皇家的保護之下，混混沌沌的過一輩子；或過着聲色犬馬的頹廢生活，講求享受與刺激。我的同學，多半是走這一條路的。英格烈就是走這一條路。甚至乍眼看來，我港Q也似這一類人，所異者，我港Q不想做平凡之人，我要做爵士，太平紳士也好，這是我的理想。我為追求這個理想而生活，講求享受是為做爵士而準備。如此的人生，誰能說是沒意義呢？因此，我覺得做人很快樂，而且眉精眼企，適應不同的環境。

青年人憤世嫉俗太深，就後容易走上了第三條路，做社會上的不良份子。學業成績不好，皇家人唔受，家庭環境不好，社會唔受；走投無路，只好鋌而走險。不幸得很，我港Q讀過的那間著名貴族的書院，不好老一輩的同學選上了這一條路。某區大名鼎鼎的高利貸大王蔡某，便是我港Q的同學也。據我所知，蔡某確因憤世才走入歧途的，自然大多數失足之人，是受了社會環境的影響。⁵

作者用了很多篇幅詳細說明對香港社會的看法，一開始就說明資本主義社會重視金錢不重才幹，在如此社會風氣之下，英文書院畢業的年青人並沒有出路。文中所說的三類人都是負面人物，表面上「港Q」說自己「覺得做人很快樂，而且眉精眼企，適應不同的環境」，其實這類人只是「過着聲

5 《香港阿Q〈港Q自傳〉》，《文匯報》，1959年6月21日，頁7。下引只註日期和頁碼。

色犬馬的頹廢生活」，其餘兩類人一是「損人利己，只求目的不擇手段」，另一類是「因憤世才走入歧途」，顯見作者認為年青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並沒有出路。作者從敘述中突顯出資本主義的不合理：

青年人離開學校之前，相信有邊個不抱着造福人類、改造社會等宏願，更有邊個是立心生捷徑食軟飯者，一旦接觸社會，碰得頭崩額裂之後，方知現實社會是甚麼一回事，所以青年人皆對現實不滿。然而，不滿現實又點？人要生存，即使不滿現實也得生存下去。……環境往往改變人之觀念，生活在不合理的社會之下，不容你不隨波逐流，人人以追求物質生活為目的，眾同而你獨異，你就很易被視為不正常之人。⁶

從作者敘述的語調，顯見作者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下市民勢利心態的批判。作者認為「這個社會，就是如此這般的一個社會，人與人之間，互相利用，不少人使出一個斗零，都有目的者。使一個斗零，搵番一元代價，是為理想。」⁷「在香港地搵食，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憑着一些小聰明，或者利用對方的一個小弱點，就可以搵到啖食。……這個是搵老襯的世界，你唔搵人老襯，人亦搵你老襯、鱸魚頭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焉。」⁸ 其實就是上述第一種只求目的不擇手段的人。作者藉「港Q」朋友占士甸所說：「傻嘅，枉你做香港

6 1959年5月4日，頁7。

7 1959年10月4日，頁7。

8 1959年3月27日，頁7。

仔，香港係咩地頭，你識冇？花花世界冇銀紙兩仔爺都係假也。港Q你讀盡咁多書，難道不知所謂資本主義社會乎？香港就是資本主義社會，有錢使得鬼推車，銀紙大晒！」⁹明確表示資本主義社會只重視經濟利益，因此，資本家往往自私勢利，作者藉環球洋行老闆肥仔耀的說話表明現資本家的想法：

肥仔耀常曰：「超，出來撈世界，揸住無毒不丈夫嘅宗旨至得，事關呢個世界，飛打飛搶者，你唔去砌低人，人就來砌低你。弱肉梗係強食，使乜講，你想自己強，手段就要毒。你決心打倒對方，不惜任何手段打倒佢，不惜傾家蕩產打倒佢，有我有你有你有我，你毒過我銀紙多過我，我仆街，我毒過你銀紙多過你，你仆街，係咁多」。¹⁰

作者以「無毒不丈夫」諷刺資本家毒辣無情的作風，然後透過窮富的對比，突顯出「人之毒與不毒，是與貧富有關矣。窮人有銀紙，毋須乎互相為害，你唔整我我唔毒你，所以窮人零舍齊心者也。」¹¹認同階級貧富與人物個性關係密切。作者認為「這個是資本家的社會，有錢佬大晒惡晒，炒你魷魚唔使考慮，更有所謂友情可講也。」¹²資本家唯利是圖，受僱者並無保障。除了肥仔耀如此，作者塑造另一個資本家王永祿也一樣：

9 1959年4月17日，頁7。

10 1959年7月29日，頁7。

11 1959年7月29日，頁7。

12 1959年12月22日，頁7。

但王永祿的毒辣作風，令我覺得更加要警惕；佢要利用你之時，跪響處求你都製，一旦利用完了之後，打完齋唔要和尚，一腳踢開你，佢做得到也。開除沙庶務便是一例。大抵凡是做老細之人，都是如此者矣。¹³

作者以此推論「大抵凡是做老細之人，都是如此者矣。」表示資本家基於階級出身，在資本主義社會生存就會自私勢利，為求私利而不擇手段。因此，香港社會瀰漫重投機取巧、自私勢利的風氣，他認為「生活在此時此地，三更可以窮，四更可以富，投機世界，唔理得五年咁長矣。」¹⁴ 在如此社會風氣下，賭博投機風氣盛行，作者藉「港Q」賭馬輸錢的情節批判賭博：

我港Q本來係醒目仔，何以忽然蠢得咁交關，想落不外一個「貪」字作怪。貪字變貧，真是至理之言。如果跟住貼士穩打穩扎來買，不是八千元推晒落去，又何致一殼撓起？這就是貪之過。貪之害大矣哉！¹⁵

作者批判賭博背後的貪念，也藉柳太的說話批判港英政府「縱容」馬會開賭，引致一般市民都抱着投機僥倖的心理：

我慨嘆賭馬風氣狂熱，賽馬原是一種高尚娛樂，現在變左害人不淺。柳太曰：「冇法矣，世界唔好，人人存着僥倖

13 1959年12月8日，頁7。

14 1959年5月17日，頁7。

15 1959年10月31日，頁7。

心理，希望搏搏下，以少搏多，好過望事頭加人工也。不過真正贏錢者，有幾多人，真正贏錢的是香港政府，馬會同騎師。」¹⁶

即使十賭九輸，仍然有不少人沉迷賭博，作者形容寫字樓職員「有些興高采烈在談論馬經。始知馬季又到。據說今年賽馬又有新花樣，加多了幾場仔寶，幾乎每場之間有連帶關係，花樣愈多愈難賭，乃必然之道理，且看了有多少人仆街至得。」¹⁷ 作者對賭博持批判態度，其後澳門於1963年恢復賭狗，作者藉老林的說話加以批評：

老林曰：「有得賭，澳門人受直接影響，香港人受間接影響，但香港又多了鋪草皮一味，每個星期狗狗馬馬一齊來，日頭輸左馬，夜晚希望贏番狗，雙管齊下，的人你話焉得唔輸到窮窮掘掘？輸清光，邊重有銀紙過年？邊重有閑錢辦年貨？所以今年本港歲晚市場特別冷淡，輸到窮亦是原因之一。」¹⁸

作者認為賭狗賭馬風氣除了影響人心，更影響經濟發展。除了賭博市場，香港的股票市場也體現了社會的投機風氣：

又講到本港之股票市場，老林話此間有某公做股票生意，賺了幾千萬，亦有某人在一個股票風潮中蝕幾百萬。股

16 1959年5月8日，頁7。

17 1959年10月16日，頁7。

18 1959年1月27日，頁7。

票是投機生意，大起大跌，值八元多的股票一夕間可以起
到五十多元，值十元的股票一夕間又可以跌到值幾毫子咁
講。不知真定假。股票價值每隨時局而起跌，記得王永
祿以前也做股票買賣，曾在一個風潮中獲利近百萬，曾
幾何時百萬元又化為烏有。總之這個是投機世界，搏
亂世界便是。¹⁹

作者以「投機世界，搏亂世界」形容香港，顯見其批判態
度。作者藉此介入情節敘述，直接表現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

(2)對「港Q」人生態度的批判

作者安排主角「港Q」生於資本主義社會，從小在香港成
長，深受其中的負面影響，「港Q」就是香港的象徵，正如作
者所說：「一個不健康社會，不免產生不健康的人與事。」²⁰
作者以嘲諷的語調，藉「港Q」的人生態度批判香港人勢利短
視的價值觀念，也藉此批判「不健康」的香港社會。作者首
先突顯出「老Q」人生觀對「港Q」的影響，表現家庭環境對
主角個性的影響：

不容否認，老Q的人生觀，對我影響甚大。自從我港Q出
來撈，每逢遇着棘手的事情，就會想起老Q講過的說話，
確有幾分道理在。至少，他的若干觀點，是適合這個社會
環境的。開講有話，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老Q幾十歲

19 1965年8月14日，頁7。

20 1965年12月2日，頁7。

人而仍能生存在這個社會，不為環境所淘汰，就係因為佢有適應之條件，面皮尺幾厚，個心又够黑，但求你死你嘅事，這都是老Q傳授給我的做人秘訣。²¹

作者指出「老Q」之所以自私勢利，就是因為要適應社會，因此，作者批判小說中的人物，其實是藉此批判香港社會的不合理。「港Q」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對人對事都抱着自私自利、只求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心態。「港Q」一家對於嚴肅的宗教問題，同樣抱着投機取巧的態度：

現在，談一談我家信仰的宗教。這個問題，不知從何說起是好，因為老Q、媽咪與我，每人都信過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宗教。我們三仔嚟信教，是吹無定向風的，可東可西，忽左忽右，或者丟低呢隻教唔信，信過第二隻，或者兩隻教同時信，亦無不可。總之，我家信仰宗教，視乎環境與需要而定，主要是看對本身是否有利，有利就信，有利就唔信。這就是我們對宗教的看法。三仔嚟各有不同的環境，不同的嗜好；因此，三個人所信的宗教，有六七種之多焉。²²

「港Q」一家對於宗教都是抱着「看對本身是否有利」的態度，作者藉此嘲諷香港社會的投機風氣。作者特別指出這種勢利短視的心態相當普遍：

21 1960年5月22日，頁7。

22 1959年3月30日，頁7。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是我港Q的人生觀。除了做爵士或太平紳士，我是很少想到將來問題的。不問過去，不顧將來，只顧現在，大抵這就是現實主義吧？在我的朋友中，那些正牌的香港仔，人生觀大抵與我相同。²³

作者以「港Q」作為「正牌的香港仔」代表，以嘲諷的手法表現出生於「不合理」社會的主角，如何表現出種種「不合理」的行為與想法。「港Q」對未來沒有理想，只期望不勞而獲，能夠一朝發達：

我港Q的理想不必晚晚燈紅酒綠，但必須出入於上流社會之中，而且以大亨的姿態出現，做生意要講一百幾十萬起碼，住半山區，坐私家車，僕從如雲，前呼後擁，咁先至够睇頭者，這並非苛求，不過係做人之起碼條件而已。換句話說，做人而不能達到呢個起碼條件，就枉為一個香港人。²⁴

主角的人生目標就是追求名利，作者以第一人稱敘述「港Q」內心的想法是「做人不是兩餐攞掂就算，有了利便要求名，有名有利至不枉一世。」²⁵ 表示這是「香港人」的人生觀。為求達到目的，所有的人際關係都可資利用，「港Q」的人生觀雖然深受「老Q」影響，可是父子關係只建基於金錢：

23 1959年7月8日，頁7。

24 1960年10月24日，頁7。

25 1961年2月9日，頁7。

開講有話，老豆賺錢仔享福，大凡做老豆之人，應有二十四孝美；銀紙自己曉搵唔曉使，死慳死抵，剩落大把身家畀個仔去散，方得稱為好老豆也。老Q不是好老豆，風流自賞，散銀紙唔斬眼。自從我曉得散銀紙，個心就話：「老鬼，係時後拉柴矣，無謂阻手阻腳阻生晒矣。」無奈老Q總唔熟性，越老越生猛。唔得佢死。因此，我與老Q的感情，淡交如水。²⁶

「港Q」不講親情，對愛情的態度同樣勢利，最初交女朋友只是為了自己的面子，坦言是「不健康的愛情」，²⁷ 主角自述「造成病態乃因彼此動機不純正。固然，我承認不是真心愛珍妮，目前我沒有女朋友，為了面子關係，不得不碼住珍妮，慰情聊勝於無，好過畀人唱我有女朋友而已；珍妮亦不是真心愛我，她的家境不好，又唔捱得鹹苦，又不禁受物質的誘惑，乃想搵個老襯托以終身，換張長期飯票吧了。」²⁸ 甚至「老Q」也鼓勵兒子追求有錢人家的女兒：

一日之間情勢突轉，老Q三口兩脰，推翻前講，話靚女未必可靠，係佢講，話靚女賢德固不待言，又係佢講。現在鼓勵我追求蘇珊，雞食放光蟲心知肚明，我自然曉得老Q的用心，不外因為蘇家是有錢之人吧了。²⁹

26 1959年2月3日，頁7。

27 1959年7月3日，頁7。

28 1959年7月3日，頁7。

29 1959年4月23日，頁7。

其後「港Q」與寡婦何太同居，也是為了金錢，作者敘述兩人分開時主角自省「錯在當年與肥婆同居，動機不純正的。坦白講，肥婆若不是手上有十萬八萬，我點會同一個又老又醜的女人同居？」³⁰「港Q」與何太同居時，為了利益搭上「撈家」王太，後來知道王太染上惡疾，卻只想在王太遺產上分一杯羹：

當王太自知死期將至，必然想到處理遺產之問題，斷估不會將全部遺產過給王媽，即使大部份送給王媽，小部份送給其他之人，則其他之人所受惠者，已經相當和味矣。而這些所謂「其他之人」未必有我港Q份者也。

就係由於有此可能，使我越想越驚，恨不得立即飛到王太身邊，向佢大獻殷勤一番。搵銀紙要緊，顧不得甚麼廉恥骨氣矣。³¹

後來「港Q」喜歡柳太，也是基於勢利心態，認為「柳太是一個寶藏，內有無數金銀珠寶，我港Q是窮鬼，窮鬼發現一個寶藏，豈有輕易放過之理？人格卑劣都咁話，冇骨氣都咁話，撈世界唔計得咁多矣。」³²從作者敘述語調，以「人格卑劣」、「冇骨氣」、「顧不得甚麼廉恥骨氣」來形容「港Q」，顯見對主角愛情態度的批判。

對於朋友關係，主角也是抱着互相利用的態度，認為「今後總之對我有利之人，都是我的朋友。今日與咪郁周一見如

30 1963年4月26日，頁7。

31 1965年6月17日，頁7。

32 1964年12月10日，頁7。

故，坦白良心講因佢手上有個錢而已。」³³ 朋友有困難，「港Q」只是袖手旁觀，認為「幫忙不離銀紙，講到銀紙個層，咪攞矣。」³⁴ 「港Q」的朋友也抱着相同的態度：

羅拔陳笑曰：「見盡咁多有錢仔，至疏爽係你，認真係GOOD FRIEND也。唔信問聲占士甸，我羅拔幾時都咁話，港Q對手足夠義氣，抵佢撈起嘅。」占士甸曰：「唔在多講，學似港Q呢停醒明仔，先至叫做曉得散銀紙，散得來夠大方，呢點難得也。」³⁵

所謂朋友只是金錢掛帥，作者更以肥仔耀的說話明確指出「對自己有利益者，叫做益友良友；對自己有利益者，叫做損友。」³⁶ 顯見朋友只是利益關係。為了謀取更多利益，往往在人前吹噓，作者藉「港Q」的經歷批判這種社會風氣：

世上有許多人的身份，一旦揭穿往往不值一個爛桔者也。我港Q以五千多元的代價，換來一個放款公司總經理的銜頭，你咪理我將來有冇生意做，依靠這個銜頭來照實，就大有機會在社會滾紅滾綠矣。³⁷

「港Q」藉着「空殼公司」總經理的銜頭到處「滾紅滾綠」，「港Q」的朋友也是如此，「咪郁周與佐治鄰鬥吹牛，

33 1960年6月27日，頁7。

34 1963年4月30日，頁7。

35 1959年2月26日，頁7。

36 1959年8月1日，頁7。

37 1963年12月26日，頁7。

一個失業而自稱出入口行襄理，一個跑街而自稱電器行營業主任」，³⁸ 經紀游丹更說：「私家車係門面嘢，不能有。出來撈，至緊係門面睇得，屋企冇得食一件事，出到來，衣食住行都要第一流。我不是貪圖個人享受咁解，這個社會係咁，人心係咁，你有左門面，即係有左信用，有信用即係有得撈矣。」³⁹ 作者強調這種風氣源自社會，「你要在這種社會來撈，要接觸的是這種人這種朋友，也就無從到你做一個真誠坦白之人者矣。」⁴⁰ 作者藉此批判資本主義社會虛偽勢利的人際關係。作者透過對「港Q」人生態度的批判，表現出作者對於資本主義黑暗社會的想像。

(3)對香港前途的悲觀想像

作者對於資本主義香港持批判態度，因此，《港Q自傳》中所展現的香港前途想像，一直顯得悲觀黯淡。事實上，五十年代韓戰以來，香港受到美國禁運政策影響，經濟大受打擊，當時港英政府對香港並無長遠的打算，更沒有制定扶助香港工業發展的政策。《香港年報》(1954-1955)中〈香港一年來概況〉認為香港經濟「前途仍是一片濃霧，本港的工商業，還沒有顯著光明」，⁴¹ 對香港經濟的預測並不樂觀。楊森(Professor Alexander John Youngson)在《香港經濟的成長及政策》中形容五十年代初期香港經濟「前景更複雜，更沒有指

38 1966年5月11日，頁7。

39 1961年6月13日，頁7。

40 1965年5月25日，頁7。

41 〈香港一年來概況〉。吳占美編著：《香港年報》(1954-1955)，香港：香港年報出版社，1955，頁1。

望。」⁴² 而且「戰爭(韓戰)又一次大大地削減了香港的貿易和收入，同時給香港的前景蒙上了一層暗淡的色彩。」⁴³ 當本地工業初步發展起來以後，「五十年代末，預料香港前程似錦的人可能不多。當然，經濟發展的規模相當大，但卻不斷遇到嚴重的困難。」⁴⁴ 處於五、六十年代的過渡階段，香港社會普遍貧窮。左翼作者基於反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價值觀念，對於香港前途的想像，自然傾向悲觀黯淡。作者藉人物的說話，表現對香港的看法：

游丹曰：「以目前情形來講，我認為不動為好。事實上生意難做，尤其是美國禁止港製紡織品入口之後，棉系工廠受打擊，其他百業都受到影響，香港前途一片黯淡，思疑將來只有旅遊業界一行企得住而已。」⁴⁵

游丹曰：「未來之香港，會逐漸失左轉運港之地位，而香港工商業受外力摧殘，正所謂，內外交迫，香港將來之地位，極其量好似澳門一樣，成為一個旅遊地區而已。一旦到了這個日子，香港人就有啖好食也矣。現在你入搵旅遊界，在這三幾年間打穩基礎，則尚有遠景可言，所以，勸你無謂郁動，現在行行生意都咁難做。香港工商業究竟是否好景，睇百貨業就知。百貨一行，係工商業之試金石，如果工商業好景，人人袋中有多餘銀紙，百貨業就蓬勃；

42 楊森(Professor Alexander John Youngson)著、何秉石譯(1985)《香港經濟的成長及政策》(Hong Kong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cy)，港澳經濟研究中心，初版，頁3。

43 同註42。

44 同註42，頁5

45 1962年3月30日，頁7。

反之人人個袋莫財，奢侈品慳得就慳，百貨業就衰落，咁即係反映其他工商百業不景矣。目前來睇，香港表面上繁榮，飲食娛樂生意似乎重有得做，然而，言不是真正的繁榮，係世紀末人心，鍾意找尋刺激，人人揸住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之心理，所以造成表面繁榮耳。而此種表面繁榮，等於將死之人的迴光反照，不外曇花一現而已，靠唔住者。總之，香港冇晒前途，一日比一日艱難便是。⁴⁶

作者以「香港冇晒前途」作總結，顯見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除了經紀游丹以外，作者又藉「港Q」與丁九少的對話評論香港經濟：

九少曰：「係者，近來旅業生意比較差的，其實也不止旅業如是，自從銀行收縮信用以來，幾乎有一行叫做好景，商場間互為影響，好難講。」我曰：「聽講外銷生意更難做。」九少曰：「外銷生意更不在話下矣。香港工業品外銷，過去之所以企得住，並非物美，而是價廉。成本輕，所以能與外國貨競爭。現在成本高左，就難與來路貨拗手瓜矣。因為減產關係，不少山寨廠倒閉；有的雖然未倒閉，而拖下不少街帳，分分鐘有冚斗可能。」我曰：「總之難做。」九少曰：「重有度慘，生意已經不景氣，偏偏百物騰貴，在經濟學來講，東西貴了即是銀紙貶值。」⁴⁷

46 1962年3月31日，頁7。

47 1965年7月25日，頁7。

作者認為香港生意不景，百業蕭條，再藉司機培哥感慨生意難做，表現香港經濟慘淡：

培哥搖頭呻曰：「今年唔得好景矣，的士紅牌滿街係，輪唔到我地白牌仔搵食。當然有的執下，比起先幾年真係打邊爐同打矢忽矣。先幾年年初一、二、三三日，平均執百零財一日者，今年拉扯一百未够，重由早做到晚，索氣之至也。」我曰：「係者，聽講呢兩年行行都淡。」培哥曰：「淡，淡得交關！」⁴⁸

香港在如此慘淡的環境下，究竟還有甚麼前途？作者藉國貨公司生意好，暗示未來的前途在中國：

一年不如一年，生意家人人咁話，也可能講得誇張一些，記得年廿七八我經過幾間國貨公司，就看到人山人海的情形。人人都話國貨公司賺大錢，可見市民樂於採用國貨也。⁴⁹

作者基於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想像香港經濟前景一片黯淡，同時暗示未來的出路在中國，顯見左翼意識形態與作品中的香港想像有密切關係。

從批判轉變為同情

作者以第一人稱敘述觀點，從主角的角度看香港社會的

48 1967年2月22日，頁7。

49 1967年2月22日，頁7。

人與事，然而，作者有時會藉主角的想法和說話批判香港社會，不免與「港Q」的負面形象有所矛盾。至1966年，作者安排主角覺悟前非，嘗試重新做人，小說的語調也從批判轉變為同情。

(1) 主角個性的矛盾

主角「港Q」是香港社會的象徵，也是作者批判的對象，藉「港Q」身上種種負面特質批判香港社會。但是，作者有時直接介入小說敘述，表現對香港社會的看法，不免與小說所塑造的「港Q」負面形象產生矛盾。

「港Q」的個性是為求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但是，他對於「女撈家」王太的做法卻不表認同，反而認為「不擇手段得來的銀紙，是不義之財；不義之財無久事，只因崩口人忌崩口碗，不便講出來耳。」⁵⁰此外，「港Q」又反對大鼻劉欺騙人客的生意手法，認為「話雖如此，到底對人唔住，識做生意作風講求殷實，能够做到童叟無欺最好。老襯人地最多做一次，傾過嘢第次冇交易，咁即係生意唔長耳。」⁵¹做生意講求作風殷實、童叟無欺與「港Q」的自私勢利的個性有所矛盾。

「港Q」對於愛情一向抱着勢利的態度，從來沒有真心真意，當決定與何太分開時，「港Q」反省個人的愛情觀念，認為「一切錯在當初，男女攪上不正常關係，動機不純正，應有此報。人心肉造，問下自己良心，當初與肥婆同居，確保

50 1961年9月12日，頁7。

51 1962年8月1日，頁7。

貪佢身邊有個錢而已，佢不是黃花少女，又不是美貌徐娘，青頭仔與寡婦同居，話不是為了銀紙，自己都唔信也。」⁵²此外，「港Q」更反思家庭出身對其人生態度的影響：

我明白老Q之思想，只要對象是有錢之人，是富婆抑或小姐可以不必理。我自小接受老Q此種「庭訓」，縱使有時不以為然，潛意識中總有此種思想存在。回想這些年來我港Q所接觸之女人，皆與金錢關係分不開者，見到老Q我就想到自己的無恥。⁵³

作者以「無恥」形容「港Q」，顯見作者藉「港Q」的反省表達對於主角愛情態度的批判，但是，這與主角的負面形象並不配合。

(2) 主角個性的轉變

直至1966年，作者改變敘述策略，嘗試改變「港Q」的負面形象，安排主角在朋友的規勸下覺悟前非，漸漸改變人生態度：

午夜思量，將自己以往對人對事的態度檢討一下，覺得真有重新做人之必要。有時人生態度之轉變，往往是在一念之間者。希望今後改過自新，學做好人。這一轉變唔講得思想成熟，我港Q是思想遲熟就真；可能年歲漸增，「摒

52 1963年9月13日，頁7。

53 1965年2月5日，頁7。

除絲竹入中年」，對世事逐漸「睇化」耳。當然，本性轉移，積重難返，有很多劣根性一時不能改變得來，學丁九少話齋，慢慢來便是。無論如何，丁九少是益友諍友，而不是徵歌逐色之酒肉朋友。人生得一益友不易，以後多與丁九少接近可也。⁵⁴

作者更詳述「港Q」的想法和具體的生活轉變：

昨晚思量一番，決定今後有三件事要做。第一，盡一切辦法搵工，不計人工多少，也都做住先，目的在於讓自己磨練一下。第二，從此不再撐門面，不再以波士經理之類的街頭去嚇人，腳踏實地，做一個真真正正的受薪階級，自食其力。第三，收縮皮費，不住這層樓，阿雲也辭退不用，出去租間房住，過寡佬生活。關於第三點，事在必行，事實上亦有能力再過着此種舒適生活，一個仙入息都有，支數就幾百條，點頂？開講有話，坐食山崩，難道食乾穀種至想辦法耶？其實老早應該行呢步棋矣，真傻仔！⁵⁵

除了生活上的改變，最重要是人生價值觀念的轉變，作者安排「港Q」批判家庭出身對自己的影響：

知子莫若父，同樣道理知父也莫若子。我非常明白老Q的封建思想，佢認為自己是香港世家，已經破落另一回事，

54 1966年2月1日，頁7。

55 1966年2月2日，頁7。

總之金字招牌仍然響處；因此做親家必須門登戶對，縱使對方也是破落戶，仍有商量餘地咁講；不是世家出身，或無族譜可查，一概列入「身份不明」個類，結婚免問。老Q常曰：「不過，亦非硬性規定，倘若不是世家，而是大富之家，例如中頭獎馬票之類，總之有銀紙，又當別論。或者你會估：親家有銀紙，而我地冇，不是門當戶對。非也！因為至低限度，我地曾經有過銀紙！」曾經有過四字，一字一頓。我港Q自小就享受這種「庭訓」，所以大時出社會做事，滿腦子虛榮思想，也學老Q一樣自我陶醉，常以世家子弟自居。這種種錯誤觀點，我港Q今日已是痛改前非，而老Q依然故我，各走極端，不可能沒有衝突者也。⁵⁶

床前問候幾句，可笑老Q還以為我過着從前的生活，開聲就問我最近「滾」成點樣？我港Q過去曾經有一段荒唐之生活，可謂拜老Q之賜。這個四十年前的玩家，自從我港Q開始懂得人事，佢便以衣鉢相傳，如何徵歌逐色，如何把對方銀紙滾入自己袋中，教得有紋有路。老豆教仔見得多，就係未見過世間竟有老Q這種老豆。我得自佢先天之遺傳，後天之培養，一度被人認為「臭嚙出臭草」，無可挽救者；而今日竟能痛改前非，學做好人，不可謂不奇蹟也矣。⁵⁷

作者以「臭嚙出臭草」形容「港Q」的出身背景，藉其

56 1967年3月13日，頁7。

57 1966年10月1日，頁7。

「痛改前非」批判主角過去種種負面思想，敘述「港Q」否定自己一貫的想法與行為，認為「如果在以前，我港Q一定對着這位黃先生車天車地，大吹牛皮，話買層樓在邊處邊處者矣。如今聽了這位黃先生所講，笑下就算，可見自己確乎改變了許多，只要從此把缺點逐漸改善，則不難有好人做矣。革面洗心，浪子回頭，非下一番苦功不可的，慢慢來可也。」⁵⁸ 對於朋友的態度也有所不同，「倘若是以前識我，對着這一位財神，難免有如咪郁周之立心，騙佢滾佢，至低限度碼住佢討好佢作為靠山；現在我港Q改變了，對朋友確係要有一種真誠坦白之態度，居心不良人地不難一眼睇穿你者」，⁵⁹ 甚至對於愛情的看法也有所轉變，「肥婆過去待我確不薄者，使我在生活方面，無憂無慮，乖乖地做一條寄生蟲；而不知問題就在呢度，養成我港Q依賴、懶惰、懦弱、不思振作等等壞習慣」，⁶⁰ 作者藉此批評「港Q」過去的個性，並敘述他對愛情開始有不同的感受：

我港Q愛情場上雖然不是初哥，戀愛中的所謂情味則是初次嘗到，大抵以往與每一個女人來往，無不是有企圖有目的者，故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疑真疑假，有時連自己也糊塗起來，對黃姑娘自問無可利用，亦無所企圖，友誼發展順乎自然、循序漸進，而不是監硬來個類，故飽嘗真正的情味。⁶¹

58 1966年2月7日，頁7。

59 1966年7月22日，頁7。

60 1966年6月25日，頁7。

61 1967年1月12日，頁7。

作者藉「港Q」人生價值觀念的變化，批判資本主義上流社會的勢利無情，突顯出普羅大眾的人情味，認為「過去我港Q把人間看得太冷酷，是自己的生活圈子中，某些人比較重視名利二字，與佢地相處多數互為利用，利盡則交疏，打工仔女之社會關係比較單純，所以往往有深厚的人情味。」⁶² 作者敘述女傭阿雲及其丈夫培哥對主角無條件的關懷與幫助，體現「財主佬睇得利害關係太緊要，相濡以沫的互助精神就不如普羅大眾矣。」⁶³ 從而表現作者對於社會不同階層的愛憎與看法。作者以另一個人物二叔改過遷善，作為主角的借鏡：

我心中暗想，二叔過了幾十年荒唐生活，積重難返，尚且能於一念之間決心改過，然後我港Q浪子回頭又有何不可？今日無意中碰見二叔，獲益良深，至低限度由佢而想到自己，無形中得到許多鼓勵。我曰：「不瞞二叔，我同你一樣咁想法，亦係拋棄以前之生活方式，重新做好人，自食其力。過去我之生活，雖然不至如二叔之荒唐，回想起來亦是我所謂社會敗類之流也。自然，好似我港Q此種一無所長之人，想話社會有所貢獻就有份矣，但由一個壞人而變為一個好人，令到社會減少一個敗類，假假地都算有所謂貢獻，你話係咁講唔係？」⁶⁴

作者從主角的反省，強調人與社會的密切關係，一個人的

62 1966年2月10日，頁7。

63 1966年4月3日，頁7。

64 1966年3月13日，頁7。

好壞，關乎整個社會的前途，作者更藉二叔的說話分析社會上三類不同的人：

二叔點頭曰：「係者，做人而能對社會有所貢獻，當然最好，此是上等之人，對社會有益但不至有害，做一個普通小市民，是中等之人；等而下之就是社會敗類矣。現在我地升格成為中等之人，浪子回頭，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總算不枉做一個人矣。」

作者以「社會敗類」形容過去的「港Q」與二叔，顯見作者最初一直把主角塑造成資本主義社會的負面人物，直到後來改變敘述策略，似乎想為「港Q」尋求新的出路。作者曾提及1967年暴動的影響：

使我忽然想起自己的生活圈子太小，年來為稻粱謀，只顧為解決個人生活而奔波，似乎與人群大眾脫了節。這是一個鬥爭的時代，但不為個人的向上爬而鬥爭。然則為了甚麼而鬥爭呢？我港Q說不出來，就係覺得這時代不應該談個人主義，不應與群眾脫節而已。

但是，作者對此只是片言隻字輕輕帶過，沒有重點敘述1967年暴動如何影響「港Q」，到小說連載的最後一天，作者敘述「人不能有朋友，唯一解釋是，過去的豬朋狗友一概疏遠，而新朋友的友誼又未建立得到，青黃不接，所以『孤立無援』。當然，我港Q以後會有朋友者，而且一定是益友。」小說最後一天的標題是「浪子回頭」，以「港Q」結婚收結全

文，表現對於過去的鄙棄，對未來的期望。但是，小說的收結相當倉卒，未及安排主角失業後未來生活的出路，也許是受到「五月暴動」影響而匆匆結束全文。

小結

從以上對小說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到作者最初塑造主角「港Q」為深受資本主義思想影響的負面人物，以第一人稱的自傳形式，嘲諷香港人自私功利的心態，醉生夢死的人生態度，從而展開對於香港社會種種負面的想像，作者在小說中表現出對香港前途悲觀的看法，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沒有出路。「港Q」是作者批判的對象，也是香港社會的象徵。由此可見，左翼意識形態與作品中所展現的香港想像有密切關係。

作者為了表現對香港社會的看法，有時不免直接介入小說敘述，與小說所塑造的「港Q」負面形象產生矛盾。直到1966年，作者改變敘述策略，希望為「港Q」尋找出路，安排主角痛改前非，也許作者藉此為香港謀求新路，可惜1967年香港左翼文藝受到文革衝擊，高調提出要配合「反英抗暴」作政治宣傳，而《港Q自傳》也於1967年4月30日匆忙收結，作者對於出路的探索尚未完成。筆者希望能夠繼續研究作者以另一筆名於「反英抗暴」期間在左翼報章上撰寫的連載小說，從而探討「反英抗暴」對於香港左翼文藝的影響。

兩岸三地的政治差異與文化經濟的融合

——銀都在華語電影產業鏈的角色¹

趙永佳、冼基樺

左右翻騰、如山穩妥；默默耕耘、悃悃無華。²

銀都機構是現時香港唯一擁有製片廠，集電影製作、發行及戲院於一身的電影公司。可是，每當談起香港電影的「黃金歲月」（即約七十至九十年代中），總離不開「邵氏」、「嘉禾」、「金公主」、「德寶」、「新寶」（或較早期的「電懋國泰」、「光藝」、「嶺光」）等大公司的名字。³至於「銀都」？它彷彿和那些被稱為「左派」⁴的電影公司一同被忘掉了！然而，這些不太起眼的「左派」公司卻默默地成就了今天的香港電影業。就此，本文嘗試整理有關銀都機構的成立

- 1 本文屬於香港研究資助局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2012 至 13 年度撥出的優配研究金 (General Research Fund) 所資助的研究項目「中國改革開放後的電影產業化：政府、市場、文化與區域融合」(編號：442312) 的一部份。筆者特此鳴謝研究資助局的資助及研究助理周冰超提供的協助。
- 2 筆者嘗試以此概括銀都機構一直持守的信念，並藉此感謝多位銀都影人在百忙中抽空接受筆者的訪問。在此特別鳴謝：許敦樂、馬逢國、宋岱、任月、張康達、冼杞然、林炳坤、崔顯威、施揚平、列孚、薛理明、張帆、曉理。
- 3 列孚 (2011) 〈艱難險阻擋不住 繼往開來又一春——且道「銀都」六十年〉，《當代電影》，第 178 期(2011 年第 01 期)，頁 4。
- 4 由於大部份香港電影人也把與中國關係比較密切或有聯繫的電影機構標為「左派」公司，因此本文借用這個政治名詞來描述當時香港電影業界的景況。

由來及其歷史背景的文獻，分析這間電影機構在華語電影產業鏈⁵的角色，讓大眾「重新」認識這所香港歷史最悠久兼仍然運作的電影機構。

背景

香港「左派」電影的由來

自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共產黨與移遷台灣的國民黨致力推行「海外工作」爭取境內、外民心歸附。由於兩黨認為社會的意識形勢能主導人民的思想與行為，因此兩黨十分重視文化產品對其人民所造成的影響。電影作為主要的文化產品之一，自然成為兩黨統戰的重要工具，香港的電影業亦因而成為兩黨開展統戰的舞臺。

在這個時代的香港，凡與中國關係比較密切或有聯繫的電影機構，普遍也被列為「左派」電影公司，當中包括在1950年由「香港長城影業公司」改組而成的「長城電影製片有限公司」、1952年成立的粵語片製作公司——「新聯影業公司」，及1953年由「五十年代影業公司」和「馬龍電影公司」整合而成的「鳳凰影業公司」(統稱：「長、鳳、新」)。除了「長、鳳、新」三間電影製作公司，在香港的「左派」電影機構還包括「華南電影工作者聯誼會」(其後易名為「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和以發行中國電影為主的「南方影業公司」(簡稱：南方公司)。

改革開放前，大陸電影市場基本上是對外封閉的。除了國營製片廠生產的電影外，只有少量蘇聯或東歐共產國家的電

5 電影產業鏈主要包括電影製片、發行、放映三大範疇。

影能夠在內地放映。在這個年代，長城、鳳凰和新聯等「左派」電影公司所製作的電影是少數能夠在中國大陸放映的「外地」影片。

由於香港「左派」電影公司擁有以上的特許權，因此它們部份收入來源來自向內地出售其生產的電影，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內地暫停購入香港電影，導致「左派」電影公司幾近停產。1971年長城只製作了兩部電影，鳳凰和新聯均無出品。1972年鳳凰重新投入生產，但只製作了兩部電影。同年長城沒有任何出品，新聯則繼續停產至1976年。相比「文革」前各公司每年出產約5到10部電影，「文革」時期的產量相差甚遠。南方公司在這時間也只能發行以紀錄片為主的電影。⁶ 同時，在香港「六七暴動」(又名：反英抗暴)期間，不少「左派」電影工作者被捕入獄，導致香港的「左派」電影公司元氣大傷。後來更有些「左派」影人被派往內地「學習」、進行「思想改造」。⁷ 直至「文革」結束後，內地國營製片廠復工，香港的「左派」電影公司才逐步恢復運作。⁸

「廣州會議」與銀都的成立和組織架構

1978年，時任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的廖承志(前僑務辦公室副主任廖暉之父)復職後，在一次香港電影界座談會上為香港的「左派」影人抱不平。他稱在「文革」期間，

6 同註3，頁7。

7 趙衛防(2011)〈銀都體系六十年的產業和文化貢獻〉，《當代電影》，第178期(2011年第01期)，頁12。

8 張志成(2013)〈「合拍」：香港電影的不歸路〉，載於陳志華編，《2012香港電影回顧》，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頁238。

「左派」電影公司被江青嚴重摧殘，搞得支離破碎，一些影人更遭受「不白之冤」。⁹ 廖承志在會上重新肯定香港「愛國」電影工作的重要性，並鼓勵香港「左派」電影機構到內地取景拍攝，同時吸納本地的新進電影人才。他覆述國家領導人的一番話，認為：「香港電影製作的幅度可以更為廣泛些。凡是有利於愛國統一戰線的，什麼都可以拍。內地充分支持(香港的「左派」電影公司)，(它)們可以到內地拍外景，拍祖國的名勝古蹟、名山大川。題材由〔它〕們自己選擇，不要加這樣那樣的限制，只要求不違反愛國原則，上下幾千年都可以拍。」¹⁰

其後，廖承志於1982年初主持在廣州召開的香港、澳門地區電影界會議(又名：廣州會議)，在會議內提倡把長城、鳳凰、新聯三間電影公司合併，以整合資源，提升競爭力。¹¹ 同年11月，長城、鳳凰、新聯和中原¹² 按照廖承志定下的合作基礎，合組成為銀都機構有限公司(簡稱：銀都機構/銀都)，作為在香港主要的中國電影發行機構，「南方影業公司」隨後也被納入其中。1984年，銀都機構正式投入運作，¹³ 為香港的「左派」電影史翻開新一頁。

9 廖承志(1990)《廖承志文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頁553。

10 同上，頁5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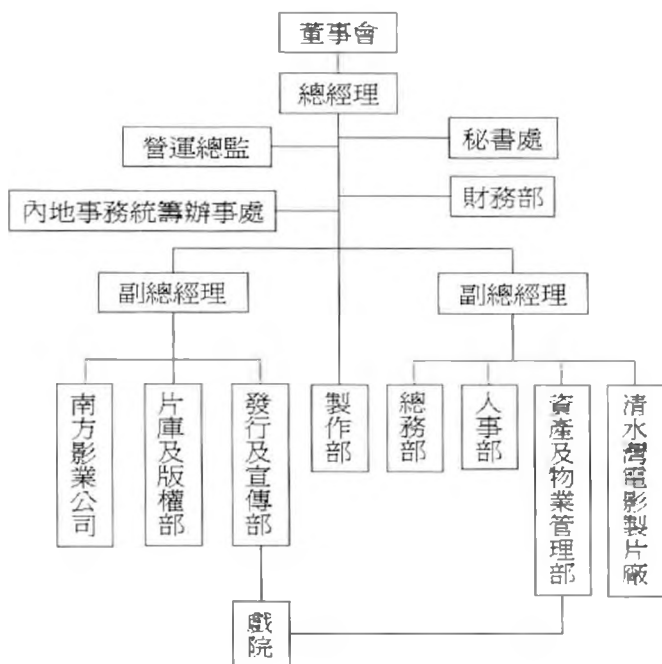
11 韓力(2010)〈銀都機構成立始末〉，載於銀都機構編，《銀都六十》，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頁364。

12 「文革」結束以後，「左派」電影公司嘗試以團結協作的方式尋求突破。因此長城和新聯於1981年合組「中原電影製片公司」，到中國大陸取景拍攝了《少林寺》(1982)和《少林小子》(1984)。

13 張燕(2010a)〈銀都的成立與開拓〉，載於銀都機構編，《銀都六十》，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頁345；張燕(2010b)《在夾縫中求生存：香港左派電影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銀都機構是一間在香港註冊的私人有限公司，股東主要為董事會成員及前任或現任公司員工，組織架構與一般在香港的電影機構類同(見圖一)。銀都機構的領導層由董事長及董事會成員組成。董事會負責為機構的長遠發展制定目標，並監察總經理的表現。近兩任董事長也身兼兩職——他們既是董事長，也是總經理。董事會成員則多為機構的副總經理和部門主管。總經理負責管理機構的日常運作，並定期向董事會交代機構的業績。營運總監負責協助總經理統籌公司的業務，秘書處則為總經理辦理行政事務及文書工作。銀都機構在北京和廣州均設有辦事處，以統籌與內地電影機構及政府部門的合作事項。銀都另有兩位副總經理協助總經理管理各部門的運作，其中一位主管南方影業公司、片庫及版權部和發行及宣傳部；另一位負責管理總務部、人事部、資產及物業管理部和清水灣電影製片廠。各部門的主管需定期向總經理及副總經理彙報工作情況，唯有電影製作部直接隸屬總經理。戲院的營運由發行及宣傳部管理，資產及物業管理部則負責戲院、員工宿舍及其他物業的租售安排。

銀都機構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密切。歷任董事長及總經理等主要職位多由內地文化部門的前官職人員擔任。銀都的第一任董事長為廖一原，總經理為傅奇。廖一原曾經在《文匯報》工作，1956年任新聯公司董事長，曾任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會長。傅奇曾為長城公司的演員，1952年開始演藝生涯，主演超過50部電影；六十年代起兼任導演，加入銀都之前為長城公司總經理。1985年，蘇辛群接任銀都機構董事長。蘇辛群為北京市文聯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曾任北京市出版事業管理局出版處副處長，北京市文化局出版文物處



圖一 銀都機構的組織架構

副處長、辦公室副主任，《北京文學》編輯部主任、副主編等職。¹⁴ 1990年，前新華社香港分社文體部部長韓力任銀都機構董事長。1992至1993年，前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長李慧生任銀都總經理。1993至1996年，原任中國電影合拍公司總經理李寧擔任銀都機構董事長。1997至1998年，原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簡稱：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崔頌明被任命為銀都機構董事長。此後，銀都的董事長

14 張大海 (2007)《移動的風景——八十年代〈北京文學〉研究》，中國：左岸文化。檢索日期：2013.10.08，取自<http://www.eduww.com/Article/200706/14068.html>；參見註解3，頁7。

則兼任總經理。1998年，原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局副局長竇守芳任銀都機構董事長兼總經理至2005年7月。同年8月，前西安電影製片廠副廠長、西部電影集團副總裁宋岱接任銀都機構董事長兼總經理至2014年。

製片

「銀都出品」與香港「新浪潮」

「文革」結束後，中國電影業逐步恢復運作。當大部份香港電影機構仍未能到內地取景拍攝電影時，銀都機構的前身長城公司、鳳凰公司和中原公司已奔赴內地實景拍攝了多部電影，包括：《蘇杭姻緣一線牽》(1980)、《白髮魔女傳》(1980)、《泰山屠龍》(1980)、《密殺令》(1980)、《飛鳳潛龍》(1981)、《少林寺》(1982)、《嶗山鬼戀》(1984)、《少林小子》(1984)及紀錄片《新疆奇趣錄》(1981)、《四川搜秘錄》(1982)、《神秘的西藏》(1985)、《中國神童》(1985)、《神州大地女兒國》(1985)、《中國三軍揭秘》(1989)等。這些電影成為窺探中國的窗口，讓香港市民和海外華僑認識大陸當時的境況。

可是，在「長、鳳、新」合組成銀都機構的初期，遇上員工的退休潮。由於「左派」電影機構傳統上會向退休員工發放「贍養費」，令當時銀都的財政負擔甚重。¹⁵ 為減輕機構的營運壓力，銀都棄用傳統自身培訓人才的機制，落實廖承志在1978年的座談會上所提出要吸納本地新進電影人才的建議，邀請一些創作理念與銀都機構相似的香港導演和電影製

15 同註 13，張燕(2010a)，頁 339。

作人合作。因此，銀都機構在這個時期出品的電影既保留了「長、鳳、新」時代的一貫風格(例如：反映時弊的電影)，同時又愈來愈貼近市場，以較商業化的電影題材取代以往充滿「教化」意味的電影。

在新格局下，「長、鳳、新」及其後合組的銀都機構變得更靈活，除了打正旗號直接投資電影製作外，也透過與電影人合組公司，逐步突破台灣當局的限制而拍攝了多部深具影響力的影片，在八十年代培育了不少出色的香港電影人，更成為香港「新浪潮」導演¹⁶的搖籃。很多電影人都是因為得到「第一桶金」的支持而展露才華，奠定及開展了他們的電影事業，包括：冼杞然執導的第一部電影《冤家》(1979)及其後的《情劫》(1980)、《薄荷咖啡》(1982)；杜琪峰執導的第一部電影《碧水寒山奪命金》(1980)；鮑起鳴(即：鮑德熹)執導的第一部電影《爵士駕到》(1985)；方育平的第一部電影《父子情》(1981)及其後的《半邊人》(1983)、《美國心》(1986)。當中《父子情》、《半邊人》和《美國心》分別奪得前後三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新演員及最佳剪接等多個獎項。

1987年邱禮濤為銀都執導《靚妹正傳》。同年，許鞍華為銀都拍攝了《書劍恩仇錄》(1987)和《香香公主》(1987)。1989年張之亮為銀都執導《飛越黃昏》。劉國昌也曾經和銀都合作，先後製作了《童黨》(1988)和《廟街皇后》(1990)，

16 香港「新浪潮」導演泛指在七、八十年代一批曾經在本地電視台工作、擁有電視製作經驗或曾經在海外留學的香港新進電影製作人員。他們在這段時期拍攝的電影充滿本土意識、反映當時的社會問題，拍攝手法亦有別於傳統的片廠製片方式，因此被譽為「新浪潮」導演(參見：卓伯棠(2003)《香港新浪潮電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分別奪得第八和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及最佳編劇等獎項。

踏入九十年代，銀都繼續與香港影人合作，當中包括：關錦鵬的《人在紐約》(1990)，台灣片名為《三個女人的故事》。該影片在第26屆台灣金馬獎贏得最佳劇情片、最佳女主角、最佳原著劇本、最佳攝影、最佳剪輯、最佳服裝設計、最佳原著音樂及最佳錄音等八項殊榮；劉國昌的《廟街皇后》(1990)、張徹的《西安殺戮》(1990)、李翰祥的《敦煌夜譚》(1991)、李志毅的《婚姻勿語》(1991)、張之亮的《籠民》(1992)、劉國權的《冒牌皇帝》(1995)和《減肥旅行團》(1997)、高志森的《豆丁奇遇記》(1997)、林德祿的《非常警察》(1998)、林嶺東的《極度重犯》(1998)等，成就了八、九十年代香港電影多元化的格局。¹⁷

「曖昧不清」的香港影人

縱然銀都機構為不少香港電影工作者提供了第一個工作機會，但不少香港影人在九十年代之前也不太願意與銀都合作，因為他們顧慮到台灣對香港「左派」電影機構的打壓，害怕被銀都的「左派」標籤牽連。

1956年「港九電影從業人員自由總會」(簡稱：自由總會)在香港成立。¹⁸「自由總會」彷彿一個台灣駐港的電影審查機關，主要負責檢閱香港電影在意識上有否宣揚中國共產

17 同註 13，張燕(2010a)，頁 340。

18 1957年「港九電影從業人員自由總會」易名為「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1984年註冊為有限公司，全名為「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有限公司」；1996年易名為「香港電影戲劇總會有限公司」；1999年再度易名為「港澳電影戲劇總會有限公司」。

主義，或電影演員有否參與中國大陸的電影活動等。如有發現，「自由總會」便立即向台灣電影局匯報，禁止該影片在台灣發行放映。而且香港電影如要在台灣上映，拍攝前都必須先向「自由總會」登記。「自由總會」將審查該電影的內容，再決定是否向影片發出「入台許可證」。如果影片不獲「自由總會」通過，便不得在台灣放映。由於中國大陸在九十年代之前仍未對外開放電影市場，香港「非左派」電影公司的出品均不得進口內地，所以台灣成為港產片最重要的海外市場之一，「自由總會」對香港電影業有重大影響。

1960年台灣新聞局電影檢查處開始收緊規定，嚴格限制沒有加入「自由總會」的香港電影公司、導演、編劇、演員的電影輸入台灣。¹⁹ 1980年當局通知「自由總會」轉告其會員，不可將出品或發行的國語片在港九「左派」戲院排映。如違反規定，當局將不再受理其影片進口台灣。²⁰ 因此，長期以來「長、鳳、新」及銀都出品的電影也不能進入台灣市場。

此外，凡參與「左派」電影製作的電影人也會被列入「自由總會」的黑名單，他們有份製作的電影亦不能在台灣放映。²¹ 例如：王天林曾經為新聯執導多部電影，雖然用了化名，仍然被「自由總會」發現，即時吊銷會籍。李翰祥因為到北京故宮、圓明園等景點拍攝電影，包括《火燒圓明園》(1983)和《西太后》(1989)，被「自由總會」取消會員資格，其後要寫悔過書方重獲會籍。演員梁家輝因為曾經參與「左

19 黃愛玲、李培德編(2009)《冷戰與香港電影》，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頁277。

20 同註19，頁288。

21 余倫(2011)〈「銀都」六十感懷〉，《當代電影》，第178期(2011年第01期)，頁19。

派」電影的演出而被禁止進入台灣。張徹也因為到內地取景拍攝電影，如《大上海1937》(1986)，而遭受「自由總會」指責。由此觀之，在八十年代大部份香港影人都因為受到「自由總會」的壓力，選擇放棄與「長、鳳、新」和銀都等「左派」電影公司合作。²²在這種情況下，儘管香港影人與「左派」電影機構有聯繫，他們的交流也要「偷偷摸摸」地進行。

化名「列孚」的電影評論家對此有一番體會。²³七十年代，「列孚」在邵氏公司的《南國電影》雜誌社工作期間，曾經發現一本寫上「送長城看閱」的邵氏電影劇本。當時他大感迷惑，不知道何以不屬於「左派」的邵氏公司竟然徵求長城公司為其劇本提供意見。其後，「列孚」湊巧經過屬「左派」院線的土灣珠江戲院，發現戲院竟然掛上邵氏公司出品的《七十二家房客》(1973)電影劇照。雖然這些劇照很快便消失了，珠江戲院最終也沒有放映《七十二家房客》，但這些經歷讓「列孚」懷疑邵氏公司是否暗地裏與「左派」電影機構有聯繫。

多年後，「列孚」與已故銀都董事長廖一原閒聊時談及此事，從廖一原口中證實當年「左派」電影機構的確與一些「非左派」系統的電影公司(例如：邵氏)保持友好關係。早於五十年代，東南亞的三大院線公司(即：邵氏、國泰和光藝)尚未到香港組建製片公司時，已放映大量「長、鳳、新」出品的電影。據黃愛玲的研究所指²⁴，國泰機構主要購買長城的

22 同註 13，張燕(2010a)，頁 338。

23 同註 3，頁 5。

24 黃愛玲編(2001)《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二：理想年代——長城、鳳凰的日子》，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頁 11。

影片，邵氏公司則多放映鳳凰的出品，以發行粵語電影為主的光藝公司則選擇新聯的影片。即使這三大公司其後在香港建立製片基地，仍繼續購買「長、鳳、新」的影片以補充片源。²⁵ 因此，香港「左派」公司製作的電影早於五、六十年代已在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地區的「非左派」戲院放映。

七十年代初，已在香港設立製片廠的邵氏公司有意重拍1963年新聯公司發行的《七十二家房客》。當時，邵逸夫曾經徵求「左派」電影公司提供重拍《七十二家房客》的意見。電影的版權雖然屬於新聯公司，但廖一原得知新聯並沒有向邵逸夫收取版權費。²⁶ 廖一原推測也許是這個原因，當「左派」戲院有意放映邵氏出品的《七十二家房客》(1973)時，邵逸夫便安排把電影劇照送往珠江戲院去了。可是，如上文提及，在當時的政治環境，「非左派」系統的邵氏公司是「不容許」在「左派」戲院放映其影片的。因為一旦被「自由總會」發現，台灣當局有可能禁止邵氏公司進口電影到台灣去。

香港影人的「內地顧問」

台灣電影局藉「自由總會」對香港的「左派」電影機構多番施壓，導致大部份香港影人不敢明目張膽地參與「左派」的電影工作，但自九十年代中國逐步開放電影市場之後，與銀都合作進軍內地的香港影人多不勝數。中國電影市場的改革開放是從「文革」結束後開始的。1978年鄧小平在第十一

25 同註7，頁11。

26 同註3，頁5。

屆三中全會全面掌政，提出一系列改革開放的政策。在電影業方面，中央政府於1979年8月7日成立「中國電影合作製作公司」(簡稱：合拍公司)，打開中外電影業合作的大門。

中外合作拍攝電影(簡稱：「合拍」)指由任何一間在境外(包括：香港和澳門地區)擁有電影製作經驗的公司與一家在內地的製片廠或中國電影局認許的民營電影機構簽訂合作協議，共同製作電影。有份參與「合拍」的機構必須在電影開拍前把故事大綱送檢「合拍公司」，辦理立項手續。²⁷ 故事大綱首先要通過「合拍公司」的審查，再送呈電影局審批。審批主要是針對電影的故事內容是否違反國家電影審查規定，例如「渲染兇殺暴力，唆使人們蔑視法律尊嚴，誘發犯罪，破壞社會治安秩序」或「有淫穢庸俗內容」等。²⁸ 如果電影局發現電影違反電影審查規定，便要求電影公司刪剪或修改相關內容。當故事大綱通過審查，電影局會向參與「合拍」的電影公司發放「拍攝許可證」。電影公司持有「許可證」才可以開始拍攝電影。電影完成製作後，電影公司必須把影片送檢「合拍公司」，再由電影局審批。如果影片通過審查，電影局便會發出「放映許可證」，該電影才能合法地在內地的戲院放映。

在這個制度裏，銀都機構成為境外唯一被中國電影局認許的電影機構，地位等同內地的製片廠。因此，銀都出品的電影(包括其他公司與銀都「合拍」的影片)皆可以國產片的身份在內地發行放映。這個特殊的待遇讓銀都成為中港「合拍

27 同註8，頁242。

28 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1997)《電影審查規定》，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檢索日期：2013.09.27、取自<http://www.sarft.gov.cn/articles/1997/01/30/20070922145320110024.html>。

片」的中介公司——香港電影人可以透過與銀都合作進軍內地市場。²⁹同時，這個安排為銀都添了一個頭銜——華語電影業界的「內地顧問」。相比其他境外的電影公司，銀都與內地電影業和官方機構的關係較密切。當中國還未對外開放電影市場時，銀都已經可以到內地取景拍攝電影，也可以與內地的製片廠合作，³⁰所以銀都比大部份香港的電影公司更了解中國的電影政策和政府部門(包括：電影局和「合拍公司」)的辦事方式。如下文所述，這個優勢使銀都在中港「合拍」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根據前銀都董事長兼總經理宋岱的說明，銀都機構在2003年之前可算是香港電影業界與內地合作的唯一橋樑。由於2003年之前，進口中國大陸的香港電影受到中國電影局所設的配額限制，所以在境外製作的電影便只有銀都的出品才有資格在內地發行放映。³¹可是自2003年「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實施後，香港的電影公司獲准直接與內地電影機構合作拍攝電影，「合拍」的電影可以國產片的身份在內地發行。在新形勢下，中港兩地電影業的交流和合作由昔日以銀都作為唯一的渠道變為多個渠道。由此觀之，CEPA的落實「似乎」奪去了銀都過往作為中港「合拍片」中介公司的優勢。³²

29 李相、司若(2010)〈「九七」後再騰飛——銀都的轉型與發展〉，載於銀都機構編，《銀都六十》，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頁430。

30 同註13、張燕(2010a)、頁336。

31 康寧(2011)〈整裝待發 重新啟航——宋岱訪談錄〉，《當代電影》，第178期(2011年第01期)，頁30。

32 林錦波(2010)〈華語影業大變局中的銀都〉，載於銀都機構編，《銀都六十》，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頁444。

CEPA實施後，香港電影可以通過三種方式進入內地市場。一是以外語片的方式進口(又名：分賬片)。這個方法受內地進口影片配額的限制，每年的配額只容許三十四部外語片進口，當中包括世界各地的影片，但大多數為投資規模比較大的美國荷里活電影。因此，如果香港片商以該種方式進口電影到中國大陸，它們必須與外語片商爭奪進口配額。加上以外語片的方式進口，在內地的發行全賴中影和華夏電影公司，票房分賬的比例亦低於「合拍片」的分賬比例，所以港產片商一般也不會採用這個方式把影片進口到大陸。第二種方式是把港產片的發行權賣給內地的發行機構，讓發行商把影片在內地發行。這些影片又名為引進片、批片或買斷片。如果香港片商採用這個方法，它們的收益便只限於把影片賣斷而獲取的金錢，但它們分不到影片在內地的票房收入。第三種方式是與內地註冊的電影機構共同投資合作拍攝電影。這些影片名為「合拍片」。「合拍片」在內地可享受國產片的待遇，即「經內地主管部門審查通過後，不受進口配額限制在內地發行」，³³片商亦可分享影片在內地的票房收入。「合拍片」一般享有等同國產片的票房分賬比例。目前「合拍片」的片商(包括所有參與「合拍」的公司)大約可分到三至四成票房，但「分賬片」的片商只分到約兩成半票房(2013年以前只有13至17.5%)，與「合拍片」的差距甚大。³⁴可是「合拍片」的主題必須與內地有關，內地主要演員的比例不得少於演員總數的三分之一。由於以「合拍片」形式進軍內地市

33 工業貿易署(2013)《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香港：工業貿易署。檢索日期：2013.09.27，取自http://www.tid.gov.hk/tc_chi/cepa/tradeservices/av_cinema_picture_lib.html。

34 同註8，頁246。

場的門檻比較低，同時片商能享有較高的票房分賬比例，所以大部份港產片商也選擇「合拍」的製作模式。

儘管CEPA實施後令香港電影更容易進入內地市場，但由於任何電影於內地發行放映前仍須經過國家電影局的審查，因此銀都並沒有因為CEPA等措施而失去了作為中港「合拍片」中介公司的優勢。銀都較了解內地政府部門對電影業的措施和審批要求，因此能繼續充當香港電影公司的「內地顧問」，向香港業界闡釋國家電影審查制度的要求。銀都與香港的電影公司合作時，會根據國家電影審查制度的標準給予意見，與合作的公司討論影片的故事大綱和對白，先把有可能觸犯國家電影審查規定的內容修改才送檢，以確保影片能通過電影局的審查。³⁵ 加上銀都的基地設在香港，對於不少香港的電影公司而言，合作上較內地的電影機構便利。而且銀都比大部份內地公司更了解香港電影業的運作，因此很多香港的電影公司尋求「合拍」的機會時，也會首選銀都這個「相對安全」的機構洽談。香港專業電影攝影師學會會長兼導演劉偉強指出，銀都為香港影人與內地電影界建立了重要的溝通橋樑。當香港影人製作「合拍片」時遇到難題，他們都能通過銀都與內地溝通。³⁶

然而，香港電影人在創作上常常遇到很大問題。香港導演陳慶嘉指出，香港電影人製作「合拍片」時，由於一些香港影人擅長製作兼賣座的電影題材(例如：黑幫電影、鬼怪驚愕電影、警匪片等)難以通過內地電影局的審查，使電影製作

35 銀都機構(2010a)〈國家電影審查制度〉，載於銀都機構編，《銀都六十》，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頁532。

36 劉偉強(2011)〈「銀都」六十感懷〉，《當代電影》，第178期(2011年第01期)，頁25。

人感到自己的創作受到內地電影審查制度的限制。³⁷ 陳慶嘉更指出，如要通過當局的審查，電影的內容不可能詳細地描述罪案發生的過程，更不可設定警察為奸角。片中的「壞人」不能來自中國大陸，而且一定要被繩之於法。³⁸ 如果警察是奸角，導演也必須標明是以1997年回歸前的香港為背景。³⁹ 在這些限制下，不少香港導演認為製作「合拍片」需要在政治和創作之間找個平衡，實在困難。

2009年麥兆輝與莊文強合作執導的《竊聽風雲》正好說明這一點。該電影講述三名香港警員知法犯法，利用竊聽得來的情報買賣股票，最終招致殺身之禍。按中國電影局的審查標準，《竊聽風雲》涉及敏感題材，故事內容必須大幅修改。然而這部電影經由銀都機構與香港的「無限映畫有限公司」和「百姓電影有限公司」合作拍攝，並與中國的「博納影業集團」共同出品，因此銀都在電影的製作過程中利用它對內地電影局審查標準的認識，在劇本創作初期與該片的監製爾冬陞和方平、導演麥兆輝和莊文強等討論人物設計和故事情節。到電影完成拍攝後，銀都就影片提供可行的修改建議，為製作人員「把關」，⁴⁰ 好讓影片能夠順利通過中國電影局的審查，成功把一部看似不太可能在內地發行放映的「合拍片」進口大陸市場。

37 林錦波(2008)〈電影製作兩極化之因由及隱憂〉，載於卓男編，《2007 香港電影回顧》，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頁 27。

38 朗天(2008)〈香港電影的曲線文化〉，載於卓男編，《2007 香港電影回顧》，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頁 63。

39 朗天(2007)〈談笑論香港電影十年與香港回歸的關係〉，載於卓男編，《2006 香港電影回顧》，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頁 31。

40 同註 31，頁 30。

此外，銀都每年有份參與製作的電影中，約10部享有等同國產片在內地發行的待遇，⁴¹ 此優勢吸引不少香港的電影公司與銀都合作拍電影，當中不少是香港觀眾看過或曾經聽聞的電影，例如：《少年阿虎》(2003)、《戀上你的床》(2003)、《忘不了》(2003)、《戀之風景》(2003)、《雙雄》(2003)、《六壯士》(2004)、《戀情告急》(2004)、《魔幻廚房》(2004)、《柔道龍虎榜》(2004)、《旺角黑夜》(2004)、《鬼馬狂想曲》(2004)、《A-1頭條》(2004)、《重案黠仔Gun》(2004)、《做頭》(2005)、《韓城攻略》(2005)、《童夢奇緣》(2005)、《早熟》(2005)、《喜馬拉亞星》(2005)、《頭文字D》(2005)、《春田花花同學會》(2006)、《超班寶寶》(2006)、《妄想》(2006)、《最愛女人購物狂》(2006)、《傷城》(2006)、《森冤》(2007)、《男兒本色》(2007)、《色，戒》(2007)、《天堂口》(2007)、《生日快樂》(2007)、《十分鐘情》(2008)、《證人》(2008)、《金錢帝國》(2009)、《竊聽風雲》(2009)、《殺人犯》(2009)、《線人》(2010)、《槍王之王》(2010)、《七十二家房客》(2010)、《打擂台》(2010)、《月滿軒尼詩》(2010)、《翡翠明珠》(2010)、《B+偵探》(2011)、《單身男女》(2011)、《我愛HK 開心萬歲》(2011)、《勁揪福祿壽》(2011)、《竊聽風雲2》(2011)、《車手》(2012)、《桃姐》(2012)、《大追捕》(2012)、《寒戰》(2012)、《盲探》(2013)、《掃毒》(2013)、《風暴》(2013)、《竊聽風雲3》(2014)等。

除了與其他香港電影公司合作拍電影外，銀都也自資或以合資的方式製作了多部電影，包括：《星願》(1999年，與

41 同註 13，張燕(2010a)，頁 342。

嘉禾和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合資拍攝)、《非常警察》(1998年,與東方電影出品有限公司合資製作)、《極度重犯》(1998年,與豪保國際有限公司合資出品)、《戀之風景》和《少年阿虎》(2003年,與星皓娛樂有限公司合資製作)、《老港正傳》(2007年,與西部電影集團、西影股份有限公司和西安曲江影視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合資拍攝)、《一代宗師》(2013年,與澤東電影公司、博納影業集團、廣東雅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盛唐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一壹影視文化投資基金、時代華娛影視傳媒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藍色游標傳播集團和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合資製作)等。

儘管銀都與香港的電影公司「合拍」或合資生產的電影數量繁多,但根據前銀都董事長兼總經理宋岱所指,銀都必定為每一部合作拍攝的電影「把關」,為每一間合作的電影公司充當「內地顧問」。如果銀都發現電影有可能不獲中國電影局批准進口,會立即提出修改建議,協助製作人員在政治和創作之間取得平衡。⁴²

為內地影人開拓海外市場

除了為香港電影業界服務外,銀都也為內地影人開拓海外市場。例如:在八、九十年代,銀都為一些被內地當局封殺的影人提供資金完成作品,並為他們開拓海外市場,讓這些影人有機會得到國際的認同。最成功的案例是張藝謀在1992年執導的《秋菊打官司》。事情的由來可追溯到八十年

42 同註 31, 頁 30。

代初，當時張藝謀在中國大陸拍攝的兩部電影《菊豆》(1990)和《大紅燈籠高高掛》(1991)均未能獲電影局批准在內地上映，事業受到重挫。此時銀都主動與他聯絡，洽談合作。結果張藝謀在1992年為銀都製作了《秋菊打官司》。銀都覺得電影若然能夠代表中國參加國際電影展，很有可能問鼎國際殊榮。可是，任何電影如要代表中國在國際電影節參展必須得到中國電影局的批准。以當時張藝謀與電影局的關係，成功獲批的機會不大。因此，時任銀都機構副總經理兼該電影的監製馬逢國特地由香港飛往北京，與中國電影局商討。馬逢國把《秋菊打官司》的影片帶到北京，邀請當局負責人看看這部電影。⁴³此行打動了中國電影局的負責人，當局願意發出許可證讓影片代表中國到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參賽，但條件是銀都必須為這部電影找一間內地的電影製片廠「冠名」合作。最終，銀都借用了北京電影學院青年電影製片廠的名義，共同出品《秋菊打官司》。該電影在第49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奪得最佳影片金獅獎和最佳女演員獎，在國內的第13屆金雞獎和第16屆百花獎皆獲得最佳影片等殊榮。⁴⁴

發行、放映

「製片」是電影產業鏈的「上游」，但拍得再好的電影也需要「下游」的「發行」和「放映」配合，才有機會被觀眾欣賞，成為一部成功的電影。銀都除了製作電影，也從事

43 馬逢國(2011)〈「銀都」六十感懷〉，《當代電影》，第178期(2011年第01期)，頁19。

44 同註3，頁9。

電影發行和戲院的業務，而且表現出色。探討銀都發行電影及其戲院業務的歷史時，總離不開在香港街知巷聞的「雙南線」。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由十多間戲院組成的「雙南線」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院線之一。縱使現時大部份「雙南線」的戲院已經結業、拆卸或給業主收回經營權，但它們的足跡已成為香港戲院史最重要的一部份。

非主流的先驅——「雙南線」與影藝戲院

「雙南線」的組成源於南方影業公司。南方影業公司(簡稱：南方公司)於1949年成立，1958年之前直屬於中國電影公司(簡稱：中影公司)，主要負責在香港代理發行中影公司擁有的國產電影。⁴⁵南方公司其後成為銀都機構的一部份。據前南方公司董事長馬石駿所指，凡是中影公司持有版權的國產片，南方公司都可以在香港發行，而且電影拷貝、宣傳海報、畫冊一概由中影公司免費提供。影片落畫後，南方公司可以先從票房收入報銷發行費用，再與中影公司「五五分賬」。⁴⁶

作為在香港規模最大的中國電影發行機構，⁴⁷南方公司多年來積極參與國產影片在香港的發行工作。⁴⁸可是南方公司成

45 參見：許敦樂(2005)《掣光拓影》，香港：MCCM Creations。

46 馬石駿(2011)〈「銀都」六十感懷〉，《當代電影》，第178期(2011年第01期)，頁20。

47 除南方影業公司外，在六十年代「華文影片公司」和「鴻圖影業公司」也曾經在香港發行中國電影，並製作國語電影(《香港經濟年鑑1966》，香港：中國生產促進會香港分會，頁129)。

48 銀都資料室(2010b)〈2006年銀都基本狀況〉，載於銀都機構編，《銀都六十》，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頁485。

立之初並沒擁有任何戲院，也沒有固定的放映場地，只能借用或以短期租賃戲院的方式來放映影片。⁴⁹ 直至六十年代，南方公司得到多位「愛國華僑」的經濟支持，在港九不同地區覓地興建戲院。在這個情況下，銀都戲院(1963)、珠江戲院(1964)、南華戲院(1966)、南洋戲院(1966)相繼落成，加上收購得來的高陞戲院及租賃經營的普慶戲院，⁵⁰ 共6家戲院(簡稱：「六院」)。這「六院」以位於旺角的南華戲院和灣仔的南洋戲院為「龍頭」，⁵¹ 因而命名為「雙南線」。

直到1972年，高陞戲院拆卸改建作僑發大廈，銀都因此託管剛落成的新光戲院，繼續經營「雙南線」。除了傳統「六院」外，銀都和南方公司也曾租賃和收購其他戲院，包括：元朗樂宮戲院(1986年租賃至1998年結業)、沙田新藝戲院(1988年租賃，2000年交還)、南昌戲院(1987年購入，九十年代轉售予「香港聯藝機構有限公司」)和最受關注的影藝戲院。

原址為灣仔新鴻基中心的影藝戲院於1988年7月9日開業，是香港早期的迷你戲院，座位較當時其他戲院寬闊。影藝戲院除了放映南方公司發行的電影外，還播放日本、歐洲等地區的非主流藝術電影。在百老匯電影中心仍未投入運作時，⁵²

49 許敦樂(2010)〈南方建立院線〉，載於銀都機構編，《銀都六十》，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頁150。

50 普慶戲院在七十年代以放映美國荷里活電影及從歐洲進口的電影為主。

51 「龍頭」戲院泛指每條院線中票房收入較高，並有首輪放映安排的戲院。在數字電影拷貝仍未普及的年代，影片以膠片拷貝的制式在戲院放映。由於膠片拷貝的體積比較大、成本較高，所以每部電影製作的膠片拷貝數量有限，導致部份戲院在影片首輪放映期間未能獲派拷貝。在這個情況下，電影發行商或院線負責人一般也會先向「龍頭」戲院分配電影拷貝。當影片播放完畢或在播放中段，「龍頭」戲院便會把完成放映的拷貝交給院線的其他戲院播放，俗稱「走片」。

52 百老匯電影中心在1996年開業，位於油麻地眾坊街駿發花園，主要放映

影藝戲院被喻為在香港極少數的非主流影院。此外，影藝戲院曾經舉辦多個專題影展，包括：「影藝經典回顧」、「影藝國際影展」、「日本電影展」、「西安優秀電影選」、「長、鳳、新、銀都優秀電影展」等，也曾經與香港國際電影節聯合放映參展的影片。⁵³

影藝戲院受到影迷的歡迎主要是因為它為主流電影以外的觀眾提供一些「另類」的小眾電影。⁵⁴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當時為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大部份院線以午夜場首映和上映首週的票房數字來決定影片的檔期長短。因此部份較為「另類」或「慢熱」（即：需要較長時期積累觀眾的口碑才有機會增加票房收入）的電影難以生存。⁵⁵ 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中，當時位於灣仔的影藝戲院給予這些較「另類」和「慢熱」的電影一個生存空間。較經典的例子是《92黑玫瑰對黑玫瑰》。該電影於1992年在主流院線上映時，因首輪票房欠佳而落畫，其後在影藝戲院作次輪放映，映期長達133天。結果口碑甚佳，票房收入不跌反升，最終能夠在主流院線重新上映，前後總共放映了175天（由1992年7月2日到12月23日），收2,280萬元，⁵⁶ 成為一時佳話。由此可見，影藝戲院為首輪上映時票房成績欠佳的香港電影提供了一個繼續放映的機會，在當時的商業環境實屬罕見。

非主流或藝術電影。

53 銀都機構(2010b)〈影藝戲院的光影十八年〉，載於銀都機構編，《銀都六十》，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頁397。

54 主流電影範指以類型片(feature films)為主的商業電影。

55 同註32，頁445。

56 香港電影資料館(2013)《館藏目錄搜索》，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檢索日期：2013.09.25，取自<http://ipac.hkfa.lcsd.gov.hk:81/ipac20/ipac.jsp?profile=#focus#focus>。

除了本地製作的電影外，影藝戲院也成為一些非主流的進口電影的主要放映渠道。當大部份在香港的戲院也首選放映較受歡迎的荷里活電影，一些較冷門的歐美文藝片和其他國家的小眾電影便難以得到上映的機會。這些電影一般只能在每年一度的香港國際電影節，或在一些民間組織的電影學會活動(例如：第一映室、火鳥電影會舉辦的活動)中亮相，放映場次甚少。⁵⁷ 在當時影碟及互聯網仍未普及的年代，影藝戲院為非主流的「另類」電影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放映平台。當中受惠的電影包括：《搶錢家族》(由1990年12月20日放映至1992年5月27日，共 524天，票房收入約1,020萬元)、《五個相撲的少年》(1992年，上映了313天)、《情書》(1995年，上映了約200天)、《濃情朱古力》(2000年，上映了288天)。⁵⁸ 對於一些連上映機會也沒有的小眾電影而言，如此放映長度實在難能可貴。

可是在九十年代，影藝戲院與「雙南線」的其他戲院紛紛結業。1989年，原屬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物業的南洋戲院拆卸，重建為南洋酒店。南洋酒店於1992年重建後內設兩廳迷你戲院，由銀都繼續接管，於1997年交還業主。珠江戲院於1994年拆卸，改建成住宅大廈，現址為海悅豪庭。新光戲院則在1988年由「香港聯藝機構有限公司」接管經營，其後用作演出粵劇及曲藝藝術用途。此外，銀都在2005年以7,500萬出售自置物業南華戲院。⁵⁹ 經營了18年的影藝戲院也因業主中

57 同註 32，頁 445。

58 同註 3，頁 9。

59 崔顯威(2010)〈銀都機構資產概況〉，載於銀都機構編，《銀都六十》，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頁 520。

止租約而在2006年11月30日結業。⁶⁰ 2008年，銀都戲院被政府納入舊區重建範圍，經營至2009年7月8日，⁶¹「雙南線」正式畫上句號。儘管「雙南線」已經不再存在，銀都機構於2009年3月租下原本位於九龍灣淘大的百老匯戲院，裝修後易名為影藝戲院，「新」影藝戲院於同年7月30日開業。⁶² 但基於商業考慮，該戲院放映的電影已經與其他主流戲院類同，營運模式與昔日主要上映非主流、小眾電影的灣仔影藝戲院相差甚遠。

放映隊

儘管「雙南線」已停止運作，影藝戲院也不再一樣，但已成為銀都體系一部份的南方公司仍繼續為香港市民提供一些非商業性質的「影像資訊」。自八十年代，南方公司的「戶外放映隊」一直在香港的基層社區放映國產電影。南方公司的放映隊員會攜帶電影器材和影片，前往學校和社區會堂放映電影，目的是向香港市民介紹中國，通過電影推廣國民教育。⁶³ 在1986年9月成立至12月的4個月間，南方公司的放映隊已放映了54場國產電影，至1987年已放映270場。⁶⁴ 2002至2003年，放映隊在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廣場為香港國際電影節提供戶外放映活動。2003年放映隊在黃大仙騰龍墟提供31

60 同註 53。

61 同註 59。

62 同註 29，頁 441。

63 林雲華(2010)〈細說南方放映隊〉，載於銀都機構編，《銀都六十》，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頁 522。

64 同註 63。

場放映活動；2006年協助中西區文化藝術協會在中環遮打花園舉辦名為《中國電影百年——香港篇》的中國電影百週年紀念活動。2010年5月，放映隊在山頂廣場展覽以《香港電影》為主題的圖片。⁶⁵

默默地撮合兩岸三地的電影人

銀都除了在香港的電影發行和戲院業務，早在八十年代已嘗試與中國大陸及台灣影人一起「開通」兩岸三地的電影市場。1987年台灣宣佈解除戒嚴令，逐步開放兩岸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可是「自由總會」的運作依舊，台灣電影局也繼續排斥香港的「左派」電影機構。因此，銀都運用不同策略嘗試突破台灣的封鎖。例如：銀都以子公司的名義與邵氏的子公司及其他台灣公司合作，成功把劉家良執導的《南北少林》在台灣發行。⁶⁶此外，銀都出資支持一些電影人在香港自組製片公司，並加入「自由總會」。這些電影公司製作的影片不會掛上「銀都出品」的名字，反之以該電影公司的名義出品。⁶⁷為求讓影片成功進入台灣市場，參與這些影片製作的工作人員甚至改名換姓，以隱瞞其「左派」的背景。

在這個情況下，出現了很多以銀都為幕後主導的電影，當中包括：映之道製作公司出品、銀都發行、劉國昌執導的

65 同註 63，頁 523。

66 同註 13，張燕 (2010a)，頁 338。

67 輯錄自前銀都機構副總經理馬達國的話，參見香港電台《百年夢工廠》系列節目之《香港電影無國界》；引自：張燕 (2010a)〈銀都的成立與開拓〉，載於銀都機構編，《銀都六十》，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頁 345。

《廟街皇后》(1990)；影幻製作公司出品、張之亮執導的《玩命雙雄》(1990)和《籠民》(1992)；同樣是影幻製作公司出品、銀都發行、由李志毅執導的《婚姻勿語》(1991)；華映製作公司出品、鍾敏強執導的《馬路天使》(1993)；巨龍電影有限公司出品、銀都發行、冼杞然執導的《西楚霸王》(1994)等。

結語

一直以來，凡屬於銀都體系的電影公司皆被列為「左派」機構，可是它們的存在並非僅為政治目的而已。銀都機構的身份特殊——它既有「左派」的背景，也與一些親台灣的香港電影人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在「左、右」夾縫中掙扎求存。作為香港歷史最悠久兼仍然運作的文化機構，銀都及其前身「長、鳳、新」自上世紀五十年代成立至今一共製作了400多部電影，發行了近千部國產影片，多年來在華語電影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是促進整個產業融合的「中堅份子」。

隨時代變遷，銀都的角色也有所改變。從八十年代改組後成為香港「新浪潮」導演的搖籃，並為非主流電影提供寶貴的放映平台；到九十年代中國電影市場改革開放後默默地撮合兩岸三地的電影人，銀都由一間曾經是大部份香港電影人避而遠之的機構，搖身一變成為香港回歸後各大電影公司爭相合作的對象。千禧年後，銀都繼續為香港影人與內地電影機構建立溝通渠道。在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簡稱：中聯辦)及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簡稱：廣電總局)的支持下，銀都每年都舉辦國慶酒會和《中

國電影展映》等活動，以加強香港影人與內地業界的聯繫。⁶⁸此外，在CEPA第六份補充協議落實前，銀都曾經多次向中聯辦和廣電總局反映香港電影業界的訴求，⁶⁹為香港影人爭取權益、協助香港的電影公司進軍內地市場。由此觀之，無論在任何年代，銀都等「左派」電影機構對華語電影產業鏈也有重要的貢獻，對香港社會和電影業界影響深遠。

68 同註 29，頁 440。

69 銀都資料室(2010a)〈08年總結及09年計劃〉，載於銀都機構編，《銀都六十》，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頁 510。